

第二辑

河北革命回忆录

河北人民出版社

河北革命回忆录

第 二 辑

冀东革命回忆录专辑

冀东革命回忆录编辑组 编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〇年·石家庄

河北革命回忆录

第二辑

冀东革命回忆录专辑

冀东革命回忆录编辑组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6 1/4印张　155.000字　印数:1—3,700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6·516　定价:0.60元

前言

自古燕赵多征战，周知关山育英雄。回望半个世纪以来无产阶级的革命征程，在我们河北的土地上，有数不清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有说不尽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话；有写不完惊天动地的光辉业绩。对于这些，需要回忆——记载——保存——流传，颂扬革命前辈，教育子孙后代。从这点出发，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河北革命回忆录》丛书。

当年，曾长期领导、指挥晋察冀广大军民对敌斗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同志，对革命回忆录的出版工作十分重视和关心，并欣然挥笔为我们写了书题："河北革命回忆录"。这对我们的出版工作是极大的关怀、鼓舞和推动。

在我们编的这套丛书中，所收文稿的原则要求是：从时间上，写抗战以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事迹；从范围上，写在河北省境内的革命实践活动；从内容上，忠于历史，事迹真实。

在硝烟弥漫、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里，同志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记载领导的、战友的、自己的战斗生活。全国解放后，我们党很重视革命回忆录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一九五八年河北省委曾发出了有关撰写革命回忆录的指示，随之有不少同志写了回忆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把在民主革命时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革命同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把写革命回忆录，诬蔑为"涂脂抹粉"、"树碑立

传”，迫使写回忆录的同志投笔十年之久，在这段文化史上回忆录成了空白。

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面目得到恢复，神州百业获得重兴。在这个历史春天里，我们殷切希望曾在河北战斗过的同志以对革命史料“抢救”的姿态，以对革命后代负责的精神，重新执笔，忆写当年。用我党的光荣传统激励人们在新的长征中，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目　　录

英勇的斗争　伟大的胜利（代序）

——忆冀东人民的革命斗争

李运昌　李楚离　张明远　李中权

冀东人民的革命斗争同全国各地一样，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发展和取得胜利的。这本来无须特别提出来。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原冀东地区我们的党组织竟却被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诬蔑为“叛徒党”、“国共合作的党”；冀东被诬蔑为“黑冀东”；冀东的许多好干部也被诬陷成“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并受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其中，有不少当年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好同志，在林彪、“四人帮”的棍棒下含冤死去。连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和其他革命先驱者也不能幸免：被骂成是“变节分子”或“错误路线的殉葬品”！林彪、“四人帮”一伙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竟到了如此卑鄙无耻的地步！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对冀东党组织和人民的长期斗争做一简略回顾，以澄清史实，总结经验，缅怀先烈，教育后代。

冀东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早在一九一九年，这里就留下了革命先驱者的足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之一李大钊同志、中国早期革命家江浩同志都出生在这里，并在这里活动过。一九一九年李大钊同志亲自参加并领导的“五四”运动，曾在这里引起过巨大的反响。当时，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和以邓培为代表的唐山工人阶级都曾动员起来，勇敢地同反动的北洋军阀卖国政府进行斗争，声援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李大钊同志立即着手在北

方建党。在唐山首先吸收邓培等八名革命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吸收邓培等同志入党。一九二二年夏天，中共唐山市委正式成立，邓培同志任书记。

一九二二年九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王烬美同志到京奉铁路（即北宁路）山海关铁工厂（桥梁厂的前身）工作，组织工人运动。接着，又派邓中夏同志到唐山指导工人的革命斗争。从此，京奉路、山铁、开滦矿、秦皇岛港等处都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斗争。由于工人们不堪忍受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以，一经组织起来，就显示出巨大的力量，给了反动当局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

一九二四年，李大钊同志派共产党员回冀东发展农村党的组织。这一年的八月，冀东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在李大钊同志的故乡——乐亭县诞生了。一九二五年夏，江浩同志带着京、津等地的一批进步学生，回到他的故乡——玉田县，利用全县教师暑期讲习会，传播革命思想。一九二六年，中共北方区（即北方局）农民委员会又派张明远、杨春林等同志回冀东活动。在北方区的直接领导下，玉田、遵化、丰润、迁安等县也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这些地方的党组织一经建立，就积极开展农民运动。那时，灾难深重的冀东人民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加上军阀混战，倍遭蹂躏，本来已经苦不堪言，反动政府又变本加厉，增加了各种名目的税捐，特别是强制推行"旗地变民"，逼着农民拿出很多的钱买回本来属于自己耕种的"旗地"。这样一来，闹得民怨沸腾，无数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玉田的党组织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及时地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反"旗地变民"斗争，并获得了胜利。其后，遵化、迁安等县也发动了类似的斗争，同样获得了胜利。在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中，先后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和京东各级农民协会，积极领导农民抗捐、抗税等斗争。这一系列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反动政府的统治，显示出党的领导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威力，

为尔后发动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一期间，李大钊同志不仅以极大的努力发展北方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而且对制定和实现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一九二四年，他代表我党同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扩大左派力量，打击右派势力，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样，就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大大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促进了“五卅”运动及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并于一九二六年开始了北伐战争。但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开始抬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与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相勾结，在全国范围内镇压革命，制造白色恐怖。李大钊同志就是在这一年的四月二十八日被杀害的，同时在京遇难的还有另外十九位革命志士。那天下午两点，大钊同志第一个走上刑台，慷慨激昂地作了他平生最后一次演说。他指出：“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并且高呼三声“共产党万岁！”他就这样在敌人的绞刑架上从容就义了。

李大钊同志的牺牲和成千上万共产党人的惨遭杀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一九二七年七月以汪精卫为头子的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后，革命虽转入低潮，但斗争并未就此终止。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发动了南昌起义，开创了在我党独立领导下工农武装革命的新纪元。同年八月七日在瞿秋白同志主持下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就是在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一步明确了土地革命和开展武装斗争，以武装的

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在南方，毛泽东等同志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秋收暴动。在北方，王荷波同志（北方局书记）也亲临玉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指示县委要领导玉田农民举行武装暴动。

玉田暴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举行，参加暴动的农民万余人。暴动开始以后，很快就攻克玉田县城，解除了城内反动武装，并准备成立革命的县政府。但这时，京东特委书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叶善枝慌忙从遵化赶来。他一来到就指责玉田县委“胡来”、“蛮干”，下令解散农民自卫队，强令农民自卫队撤出县城。

针对这一情况，中共顺直省委作出了成立京东人民革命军和以玉田为中心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决议。同时派省委组织部长于方舟同志带一批军事干部到玉田，加强对暴动的领导。

在于方舟同志的主持下，暴动队伍整编成京东人民革命军，杨春林同志任司令，刘自立同志任参谋长。革命军整编后，有三百多人，第一次打出“土地革命”的红旗，从遵化向玉田进军，沿途打土豪、夺取反动武装。在鲁家峪宿营时，由于缺乏经验，被数倍于我的地主武装包围。经过激烈战斗，我军伤亡、被俘数十人，于方舟、杨春林、解学海、刘自立等同志突围后，又与敌人遭遇，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们威逼利诱，施以种种酷刑，但他们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一个严冬的深夜，都壮烈牺牲。

为时两个多月的玉田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冀东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武装夺取政权的先声，在冀东人民武装斗争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同时，它也为以后的斗争提供了经验和教训。玉田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在农民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党组织并未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它们克服种种困难，继续坚持斗争，使自己逐步地得到恢复和发展。一九三〇年夏，举行了第二次武装暴动，在李立三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这次暴动又遭到

了失败。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军炮轰我沈阳北大营，公然发动侵华战争。在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避免冲突”、“绝对不抵抗”的卖国政策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寇很快就占领了我东北三省。

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日寇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次年一月，攻占我山海关，三月，开始进攻冀东长城各口。当时驻扎在喜峰口的第二十九军，在地方义勇军的配合下，参加了对日作战，这就是“长城抗战”。但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抗战部队孤立无援，终于被迫撤退。接着，日寇很快就占领了长城沿线和热河及滦东地区，直接威胁我华北腹地。

为了制止日军继续入侵，把侵略者赶出中国，一九三三年秋天，冀东党组织在迁西县发动了农民武装抗日起义。这次起义也是为了配合中央苏区反对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斗争。起义后，反动政府立即组织地主武装合力围剿、镇压，起义的农民终因经验不足，寡不敌众，被敌人打散，几十名同志被捕。

迁西暴动的失败，使党的工作又一次受到损失。但是，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被敌人的残酷镇压吓倒的。王平路、魏春波、韩东征等同志在白色恐怖下，仍然顽强坚持斗争，恢复并发展党的组织。

冀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前仆后继，是可歌可泣的。但是，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各地的暴动都没有成功。这说明，要想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没有一条正确路线是不行的。

在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之后，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工农红军不得不开始战略转移，进行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错误路线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领导，尔后才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挽

救了党和红军，从此，革命走上了正确轨道。

在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举行长征北上抗日，决心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却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卖国的“何梅协定”。汉奸殷汝耕在日寇的操纵下，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日寇把侵略中国的战火扩大到华北，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一战即溃，日寇很快占领了平、津及华北广大地区。这就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抗日情绪日益高涨。

“七七”事变以后，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派八路军挺进华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具体提出建立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热边区抗日根据地，开展冀热边的游击战争。根据这个决定，八路军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先成立了以聂荣臻同志为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随后于一九三八年又成立了以萧克同志为司令员的冀察热挺进军，开辟了平西抗日根据地。为了发动冀东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秋，中共北方局派红军干部李润民、孔庆同二同志到冀东工作。那时，王平路同志已经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滦县举行了京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冀东人民武装抗日自卫会，发动冀东游击战争。会后，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首先建立了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支队，王平路任司令员，史贞、李润民任正、副政委，孔庆同任支队长。这一年的十二月三十日，王平路同志在带队夜袭长城外的青河沿日本据点时，不幸壮烈牺牲。后来，这支队伍在魏春波同志的支持下，在彭夫、高存等同志的领导下，克服了困难，继续斗争，又增添了滦县来的新生力量张鹤鸣、张振宇等十八位同志，重整旗鼓，去兴隆县打下了药王庙等伪满警察据点。而后分散为

游击小组，打击汉奸、特务和捣毁日鲜浪人开设的赌局、白面儿（毒品）馆，收缴敌伪及地主武装。这些斗争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为以后的大暴动提供了经验，准备了一批军事干部和武器。

冀东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战争有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一九三八年有二十万人参加的抗日大暴动。

一九三八年春，中共河北省委曾派人到北方局汇报并两次派人到平西和晋察冀军区与八路军联络，约定在八路军挺进冀东时，冀东举行起义，以迎接八路军东进抗日。

三八年六月八日，宋（时轮）、邓（华）支队从平西出发，挺进冀东。中共冀热边特委为了发动这次起义，在党作出决定之后，又和当时抗日同盟者国民党人洪麟阁、爱国民主人士杨十三等，在丰润县的田家湾子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通过党提出的成立抗日联军司令部和冀东抗日联军行动纲领，决定组织抗日联军六个总队，确定起义的日期为七月十六日。为了扩大暴动规模，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党派李楚离同志来冀东指导洪麟阁部，王仲华同志指导高志远部。

田家湾子军事会议以后，各部分头准备起义。这时，打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中的朱欣陶同志（在伪政府中担任警务科长）为我们提供了两条极为重要的情报：一是八路军宋、邓支队已于六月二十八日进入冀东平谷县靠山集一带；二是日寇马上就要收缴散布在冀东各县的二十三万支民枪。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配合宋、邓支队东进和赶在日寇收枪之前，轰轰烈烈的起义就提前于七月七日前后举行了。

冀东抗日联军原来打算成立六个总队，但起义后，抗日的工农群众如潮水般涌来，参加暴动的总共有二十多万人，编成了抗日联军三十九个总队和四个开滦煤矿区工人抗日救国总队，共有全副武装的战士十万余人，其中我党直接领导的有二十五个总队、四个大队、两个区队。当时暴动的范围，西起通县，东至山海关，

北起兴隆、青龙县，南至渤海湾，到处红旗招展，杀声震天。声势之大，威胁平津，震撼华北，惊动世界。冀东的敌人惶惶不可终日，不敢轻举妄动。在七月至十月的整个暴动期间，敌人一直龟缩在各个据点里面，死守待援。而工农为主体的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则到处积极进攻，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摧毁了敌人经营多年的反动统治基础，配合八路军攻克了七座县城、开滦矿和绝大部分村镇。并攻克了古冶洼里车站，使北宁路半月不能通车。

冀东大暴动震惊中外，是在我党领导下，在敌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伟大壮举。它的特点有二：一是规模大，是全民性大起义，有几十万人参加；二是工农密切配合，开滦矿区的工人阶级与广大乡村农民密切配合行动。

党领导下的抗日联军主力第四总队和第五总队，首先在腰带山的岩口和滦县的港北起义。第四总队在遵化玉皇庙一仗歼灭了遵化县伪保安队，俘虏了八十多人；第五总队在滦县杨家院一仗，消灭了滦县伪保安队三百多人，并活捉了队长刘涛。这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加上八路军挺进冀东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大鼓舞了抗日联军的士气，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胜利了，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父送子、妻送夫参军的动人景象，群众踊跃献枪支、弹药支援部队的热烈情景，到处可见，光丰润县火石营一个村就出来五百人参军参战。

一九三八年八月，八路军和抗日联军在遵化铁厂会师，召开了铁厂会议。会议决定建立冀察热宁军区，统一指挥所有抗日部队，公推宋时轮、邓华二同志任军区正、副司令员，下设五个分区。但可惜这个决定未能实现。以后九间房会议决定八路军和抗日联军全部西撤整训，只留下包森、陈群、单德贵三个支队坚持冀东。抗日联军全部六、七万人，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向平西进发。由于部队是刚组织起来的，缺乏军事骨干，又未经过训练，在蓟县、密云、潮白河，连续遭到日寇和地主武装袭击时，队伍

大部分被打散了，只有一千多人到了平西，六千人返回冀东，整个部队损失了十分之九。

冀东抗日联军西进，受到了严重挫折，返回冀东后，又碰上日寇秋后大扫荡，又散了一部分。当时，部队士气低落，濒于瓦解。为此，抗联司令部在迁西县的柳沟峪召开了干部会议，分析了形势，重新作了部署，稳定了军心，并着手恢复地方工作。

一九三九年春，包森部队的几名战士以巧妙灵活的方式，在遵化北捉住日寇池本宪兵大佐，打击了侵略者的威风，鼓舞了冀东军民的士气。

一九三九年秋，冀东抗日联军三个团又开到平西整训，并正式改编为八路军第十三支队，李运昌同志任司令员，李楚离同志任政委，包森同志任副司令员，曾克林同志任参谋长，刘诚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到一九四〇年，冀东的游击战又活跃起来了。这一年的一月，在遵化阎老湾召开了地委会议，参加者有李运昌、包森、刘诚光、周文彬、李子光、王少奇、丁振军等同志。会议决定冀东工作的重点是：巩固丰滦迁老根据地，开辟盘山、鲁家峪两个新根据地。在丰滦迁老区方面，由周文彬、刘诚光、丁振军、卢企明、江士林同志率五、九两个总队，以肃清土匪、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组织青年报国会和报国队等群众组织为主。在扩大新根据地方面，由包森、李子光同志率领二支队主力和蓟县游击队，开辟以盘山为中心的西部根据地；由李运昌、徐志、耿玉辉同志率七总队，开辟以鲁家峪为中心的丰玉遵中部根据地。从这时起，冀东地区的革命工作完全由我党统一领导，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东部和西部两大块根据地也很快连成了一片。

一九四〇年夏，到平西整训的十二团返回冀东，先在盘山与十三团配合打了几次胜仗，消灭了一批日伪军。而后由盘山返回东部，攻下丰润县老庄子和玉田县鸦鸿桥及赵各庄煤矿等十三个

据点。前后共打了二十多个胜仗，大大鼓舞了冀东人民的斗志。包森副司令员率领的第十三团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在地方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肃清了盘山地区六百多名土匪，建立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随着军事上的胜利，根据地的扩大，成立了以焦若愚同志为专员的冀东专员公署，全区的地方政府也相继建立起来，并初步建立了财粮制度，克服了经济工作中的紊乱现象，保证了部队供给，壮大了我经济力量。不久，我军又一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开辟了平原大片新区，进一步鼓舞了冀东军民的斗志。这时，日寇声称要进行最大规模的扫荡，随后冀东军民展开了一场艰巨的反扫荡斗争。

日寇对冀东的大扫荡，是从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开始的。这次扫荡前，敌人耍了个花招：一面宣传要用最大的兵力来扫荡，一面只用小股武装与我周旋，造成一种虚张声势而并无实力的假象，借以迷惑、麻痹我军和人民。然而，却远距离集结重兵，形成大包围圈，搞所谓的"铁壁合围"。这次，日军出动两个旅团、六个联队，加上他们在冀东的守备队和伪军，号称"十万精兵扫荡冀东"。他们先从西、北、东三面山地向我压来，企图把我压缩到玉田、蓟县平原地带加以消灭。由于我军侦察工作做得不准确，所以没有及时识破敌人的阴谋，打了一场被动仗。

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十三团在玉田杨家套、杨家板桥与敌人激战一天，第二天转到十棵树、六道街子继续激战。战斗结束后，第一营连夜转到盘山、平北及兴隆一带，另外两个营和教导队，被迫化整为零，分散转移出去，保存了实力，但损失了部分枪支。

十二团三个营加青英部队两千多人，在陈群团长的带领下，自六月二日起，在丰润、玉田连续同敌人打了几次恶仗。六月十二日，陈群同志在玉田孟四庄被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身经百战的长征干部到冀东以后，身先士卒，英勇作战，深受冀东军

民的拥护和爱戴。他的死是我军的重大损失。陈群团长牺牲以后，十二团又同敌人打了几次恶仗，有相当大的伤亡，智勇双全的第一营营长杨作霖同志也牺牲了。但部队斗志依然旺盛，在新任团长曾克林同志率领下，继续英勇地与敌人作战。

在这次大扫荡后，我们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等扫荡一过，在敌人洋洋得意，认为已经把冀东八路军统统消灭了的时候，我们则立即返回原地，集结部队，积极活动，迅速恢复地方工作。

一九四一年夏，冀东党委举行了大张屯会议，决定用全力开辟热河山区根据地，以扩大部队回旋区，同时，加强老根据地内部的锄奸防特工作。会后，先派高敬之、周治国等同志带武装工作队到口外伪满敌占区探路，而后派遣十二团和十三团深入热河山区，以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并带去热河人民所急需的生活日用品（火柴、剪刀、布匹、食盐等），发给当地人民。部队吃老百姓粮食后开条，随后就由地方政权按条付现款，以建立政权威信。这样，很快取得了热河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为了不惊动敌人，暂时不打据点，对伪军、伪组织则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共同抗日”为口号，争取他们和他们的家属，使他们不向日军报告我军消息。与此同时，进行铲除汉奸的工作。这样做，使我军在热河的工作进展极为迅速，很快就开辟出从都山到雾灵山之间的广阔的游击区。

就在我们调兵遣将全力开辟热河时，伪治安军二十三个团共三万多人开进冀东。他们企图先以团营、后以连排为单位，分散驻守在我冀东根据地内，妄想把我们的根据地吃掉。这就是敌人吹嘘的“三次强化治安”运动。为了蛊惑人心，与我争夺地主阶级上层人物，他们还胡说什么“治安军是中国人的军队”，散布“曲线救国”论，使一些接近我们的地主上层人物开始动摇，一部分基本群众也迷惑不解。针对这种情况，冀东军区负责同志李运

昌、包森、曾克林连续召开了驸马寨、傅家城两次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发动一场打治安军的战役，以保卫冀东抗日根据地。

打治安军战役是冀东第二个抗日高潮，意义极为重大，是巩固扩大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大战役行动。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十二团和十三团各一部，在遵化四十里铺伏击由三屯营向遵化县城移防的治安军第三集团军第六团，共歼灭敌人两个营和一个团部。这是打治安军的第一仗。然后，我两个团一鼓作气，连续打了双城子、刘备寨、梁子河、西旧寨、牵马岭、果河沿等几个漂亮仗，整营整团地消灭了敌人，并攻克了杨店子大据点。我军在战斗中做了优待俘虏、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的工作。这个战役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胜利结束，三个月的时间，作战二十三次，共消灭治安军五个团，重创两个团，瓦解一个团，缴获长短枪六千多支、轻重机枪六十余挺、山炮两门（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缴获的武器尚未计算在内）。

打治安军战役的胜利，不仅粉碎了敌人以治安军代替日军驻守冀东的计划，牵制了日军兵力，而且壮大了我军，改善了部队装备，提高了作战能力。这不仅对于巩固冀东根据地有重大意义，而且为开辟北宁铁路南和滦河东两块新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打治安军战役结束后不久，我们就派十二团去滦河东，一区队去北宁铁路南开辟工作。在丁振军、张鹤鸣、张振宇、王晓生、高小安等同志的积极努力下，一区队很快开辟了北宁铁路南这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地区。在曾克林、高敬之、曾辉、欧阳波平等同志的积极努力下，十二团也很快开辟了滦河东地区。到一九四三年夏，这两个地区都建立了专署，并建立了八个联合县政府，使冀东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增加了一倍。这样，不仅使冀东根据地扩大到渤海边，与胶东相望，而且进逼山海关，打开了到辽西的通道，大大改善了冀东的战略地位。

在我们打败了治安军以后，包森同志就准备率领部队惩罚不

断猖狂进犯我冀东解放区的伪满洲军。他先带少数部队到长城线上进行侦察。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遵化县野户山同日、满军的一次遭遇战中，包森同志不幸被敌人的冷枪击中，为抗日战争光荣地献出了他的宝贵生命。包森同志有勇有谋，敢打敢拚，是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他忠诚党的事业，努力奋斗，为开辟冀热边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死，是冀东党组织、冀东军民的一个重大损失。在包森牺牲以后不久，在遵化铁厂附近的甲山战斗中，深受军民爱戴的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团政委，老红军刘诚光同志也壮烈牺牲了。这是我冀东军民的又一重大损失。

包森、刘诚光、陈群三位卓越的军队领导同志的牺牲，引起冀东军民的巨大悲痛。为了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给烈士报仇，一九四二年六月，冀东部队在热河王厂沟召开了追悼、誓师大会。李运昌同志作了慷慨激昂的战斗动员，号召全军奋勇作战，消灭日寇，为牺牲的烈士们报仇，为受难的人民雪恨。于是，在这一年的夏季，轰轰烈烈的“复仇战役”开始了。这次以打击日军为主的战役，从七月开始，共与日军作战二十余次，消灭了近两千日军。我军在战斗中进一步发展壮大，部队的武器装备进一步得到改善，战术水平和战斗能力都大大提高了。一九四二年夏“复仇战役”胜利后，为加强冀东部队的军事建设，冀察热挺进军肖克司令员派彭寿生同志任冀东军分区参谋长。接着我们新组建了第十一团，由赵文进同志任团长。当年秋，敌人又开始进行“五次强化治安”运动。这次我们总结了一九四一年反扫荡的经验，采取了敌人进攻我根据地，我进攻敌人后方的方针。为了保存实力，我军主力在敌人扫荡一开始，就转到外线作战，开辟新地区，想把敌人调动出去。敌人挖空心思，实行了所谓“沟壕碉堡政策”，从山东、河南、冀中等地抓来十多万民伕，在大批日伪军的监督下，在冀东挖了东西三道、南北四道，几百里长的大壕沟，沟宽二丈，深一丈五，三至五里设一碉堡，实行所谓“碉

堡政策”和“清剿剔抉”、“清水摸鱼”、“烧光、杀光、抢光”等灭绝人性的血腥政策。在长城沿线及热河南部东西七百里、南北三百里的区域内，则制造了“无人区”。敌人妄图用这种方法切断我军和人民的联系，以达到孤立我军，“清水摸鱼”限制我部队活动，破坏我地方工作的目的。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晋察冀军区于一九四二年秋派来李中权同志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提出政治整军任务。于是，从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春进行了政治整军运动。通过这次政治整军，部队有了显著进步，巩固了部队，加强了部队纪律，改善了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奠定了冀东部队以后大发展的基础与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信心。政治整军还与军事练兵相结合，提高了军事技术。

在整军的基础上，我们从一九四三年三月开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恢复冀东基本区战役，这是冀东抗日战争的第三个高潮。当时我军以三个团的主力和地方武装分三路进入基本区，经过南坨、芦各寨南山、九百户几次大仗后，粉碎了敌人的“沟壕碉堡政策”，恢复了基本区。到一九四三年夏，冀东根据地更加扩大了。战役胜利后不久，晋察冀中央局决定：把冀东地委改为冀热边特委，设立五个地委，成立冀热边区行署，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加强了对敌斗争，扩大了部队和根据地。到一九四四年冬，已有十万党员、三万军队、二十万民兵、二十五个联合县和县支队，建立了有五百六十万人口的解放区。为了适应根据地大发展的形势，中央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决定建立冀热辽军区（与冀晋、冀中、冀察军区同时建立），成立区党委和行政公署，李运昌同志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同时，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还派来大批军政干部到冀热辽工作，如詹才芳同志任军区副司令员，张明远同志任行署主任，苏林燕同志任区党委组织部长，何能彬、李雪瑞、曾雍雅、任昌辉、李道之、肖全夫等同志任军分区正副司令员或团长，黄文、林茂源、唐凯、曾辉、程露天等同

志任军分区副政委或主任。组织形式的变动和领导力量的加强，就更利于冀热辽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

从一九四五年起，伪冀东行政长官铁杆汉奸姜鹏飞提出军、政、会一体化和“总体战”的口号，伪满洲国兵也倾巢涌入冀热辽区，向我军挑战，敌总兵力有十余万人。

冀热辽区党委和军区率领全区军民，进行了猛烈反击，保卫了冀热辽根据地，保卫住了这个解放东北的前进阵地，并为解放热河全省、挺进东北准备了力量。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我全国解放区军民对日寇举行大反攻。冀热辽军区奉延安总部命令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先后调出去八个主力团和一个营，共一万三千余人。东路由曾克林、唐凯同志带十六分区部队四千人打先锋，先解放山海关，于九月六日到达沈阳；中西两路由舒行、赵文进二同志带十四分区和十五分区部队共三个团、一个支队五千余人，于九月中旬解放了热河；李运昌司令员率军区前方指挥部和三个团、一个营共四千五百人出山海关，经锦州，于九月十六日到沈阳与曾克林部队会师。三路出关部队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了热河、辽宁全境和黑龙江、吉林西部广大地区，接管了热河及东北几十座中等城市，缴获了大批武器、物资，迅速地扩大了部队，建立了十二个新旅、两个炮兵旅和十个独立团、一个飞行大队。当时随部队出征的党政负责同志还有李子光、徐志、李海涛、焦若愚、朱其文、李荒等同志和两千五百名地方干部，他们负责接管城市，建立人民政权。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末，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已被苏联红军和我军肃清，沦陷十五年的东北人民重见了天日。当年十二月，由于形势变化，在东北执行任务的冀热辽部队返回热河时，交给东北局部队有六个旅十个团，总人数达五万以上，以后分别编入东北主力部队，其中有冀东四个老团（十二团、十五团、四十六团、四十七团），约六千余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我冀东地区

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境内除北宁路沿线之秦皇岛、唐山二市和昌黎、滦县、宁河、武清以及京郊之通州、顺义、密云等几座县城外，广大城乡都已为我军收复。东起山海关，西迄平津，南从渤海，北至长城，包括五个专区、二十六个县、六百多万人口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周围并与冀中、冀察、东北各解放区紧密相连，完全摆脱了抗日战争时期四面环敌、孤悬敌后的困难处境。解放区广大人民，在饱尝战争痛苦之后，渴望着实现国内和平，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毛泽东同志在重庆与国民党签订“双十协定”后，冀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清算汉奸、恶霸的斗争，并着手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当我冀东解放区人民正在欢庆胜利重建家园时，国民党反动派却背信弃义，把魔爪伸进了冀东。他们除命令驻守在冀东的敌伪军政人员不得向我解放军投降外，还对那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汉奸、特务委以重任，昔日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和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今日成了趾高气扬的国民党大员，继续统治、压榨人民。同时，在美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助下，国民党反动派从海上、从空中调来大批军队，不仅占领了全部敌伪代为看守的城镇据点，还到我解放区城乡进行侵扰。

那时，全国的形势也同冀东一样变得复杂了，紧张了。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这种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指出：一方面根据国内外有利于和平的因素，有出现国内和平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没有和平诚意，还存在着严重的内战危险。提出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抓紧完成减租、生产、练兵三大任务，以壮大人民力量，应付最坏的可能。对美蒋的武装进犯，要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

冀热辽区党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总结了反攻受降工作，讨论了战后的形势，明确了今后的方针和任务。会议决定，必须立即对全党、全军和

广大群众进行一次广泛的思想教育，肃清和平麻痹思想；揭露美蒋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制造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反革命阴谋；各级党委都要根据需要和可能组织干部学校、训练班，或用开会等方式训练各级干部，使干部、群众认清形势和任务，并为之斗争；在发动群众方面，要坚决领导农民实行减租减息、退租退息，实行合理负担，进一步恢复和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号召群众参军、参政，以保卫解放区；对军队，也要抓紧练兵，准备随时消灭入侵之敌。

根据上述方针和决定，我冀热辽军民对于美蒋勾结，蓄意违犯协定、破坏和平的行径，除了从政治上进行揭露以外，还“针锋相对”，在军事上坚决地给进犯之敌以沉重打击。

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停战令”开始生效，到同年七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在这个所谓的停战期间，我军共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大小战斗一百四十九次，歼敌五千九百七十五人。其中以保卫承德的战役和香河战役最为激烈。

在进行解放区保卫战的同时，冀东区党委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从减租减息斗争逐步发展到土地改革运动，清算汉奸、恶霸，斗争地主、富农，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实行土地改革。到一九四六年九月，全区农民就从地主手中收回近二百万亩土地。这一系列的运动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坚定了保卫胜利果实、打败一切入侵之敌的信心。在此期间，全区党员发展到十二万人，自卫军发展到三十六万人，还有成千上万的青壮年踊跃参军参战。

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日，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十一战区及“东北行营”所属之十六个师约十三万人，向我冀东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企图以四倍于我的优势兵力四面配合，迫我主力与之决战。我军则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主动撤出县城和部分集镇，以广大乡村为基地，广泛开展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敌

人则不断分散兵力，占据城镇，背上一个又一个包袱。在这种形势下，我军开始集中优势兵力，对分散驻守之敌展开广泛的进攻。两个多月的时间，共进行大小战斗八十二次，歼敌七千余人，收复乐亭、宁河、宝坻、青龙四座县城及广大农村地区。

一九四六年底，国民党"全面进攻"宣告失败。后来他们又改为"局部进攻"、"重点扫荡"、"全面蚕食"，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重点扫荡"中，敌人对解放区翻身农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大肆烧杀抢掠，反动地主富农也成立了还乡团借机反攻倒算。解放区群众遭受了一场严重的洗劫。

为了打退蒋匪军的这次"重点扫荡"，我军采取了"敌进我进"、"内外配合"、"避实攻虚"的作战方针，取得了辉煌战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主力部队就歼灭入侵之敌五千余人，攻克通州、武清，直接威胁平、津，对全区军民是个莫大的鼓舞。到一九四七年四月底，国民党为增防平、津，救援保（定）南，继续从冀东抽调兵力，留下的三万多人防守城市据点。他们的"局部进攻"、"重点扫荡"也全部告吹。与此同时，我边沿地带的反"蚕食"斗争也取得重大战果。当时，全区武工队和民兵共与敌人交战一千五百多次，杀敌两千三百多名，同时瓦解蒋军、伙会八千六百九十多人。冀东部队当年五月为配合我军在全国范围的"夏季攻势"，发动了滦东战役。我十旅、十一旅于五月十八日拂晓，第一次攻克昌黎县城，全歼守敌，同时，攻克留守营等车站和据点，切断了北宁路。迁安、抚宁两县守敌不战而逃。到二十六日，整个滦东攻势结束，我军共歼敌三千四百多人，缴获大批武器，使滦东大部分地区得以收复。全区其他各地的武装也相继出击，先后收复遵化、蓟县、平谷等县城。这样，蒋匪军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守。我军则获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九月底，我军共消灭蒋匪军两万六千余名，攻克、收复县城十七座。

一九四七年九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并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同其他地区一样，冀东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平分土地运动，同时，进行了整党整军运动。

随着全国战争形势的发展，我军转入全面进攻，冀东主力部队第九纵队编入东北野战军，直接参加了辽沈战役。在战斗中，冀东人民踊跃支前，保障了前线部队的后勤供应。地方部队为了配合我东北、华北的大反攻，也主动出击，经过激战，攻克敌军许多据点和县城。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山海关、秦皇岛、滦县守敌望风而逃，唐山的敌军也逃往天津。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冀东全境已获解放，六百万人民无不为此欢欣鼓舞。他们一面欢庆胜利，一面不分昼夜地为支援平津前线的几十万大军而紧张地工作着。

在支援我东北几十万大军入关解放平津的战役中，冀东人民贡献了大量人力，物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抢修了全境纵横交错的公路数千里，架桥数十座，筹集了供应入关大军的粮食二亿多斤，以及大量油、肉等副食品。各种军需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方，真是车水马龙，日夜奔流不息。冀东全境呈现一片军民欢欣鼓舞、团结对敌的热烈局面和“一切为了前线”的动人景象。东北入关大军从指挥员到战斗员，对冀东人民的支前工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称赞。

在解放战争中，冀东解放区还动员了十多万青年参军，先后向东北和华北野战军输送了十个师的部队，这些部队在解放全国的战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冀东还输送出两批地方干部到东北和中南地区，他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总之，冀东的党组织、冀东的子弟兵和人民，对解放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冀东的党政军民经过艰苦的奋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冀东地区，处在伪“满洲国”、渤海、平津的包围之中，是日寇从东北到华北的咽喉要道，日寇要实现并

吞中国的野心，就必须占据冀东。冀东地区是抗战的前线、敌人的后方。这种形势就决定了冀东抗日战争的艰苦和残酷的特点。但是冀东的党组织、冀东的党员、冀东的军队和人民，坚贞不屈，前仆后继，终于从胜利走向胜利，在我国的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

回顾过去的战斗历程，我们应当把这个伟大胜利归功于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关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央对冀东的工作极为重视，通过电报，经常直接给以指示，使冀东的党组织能够领导冀东军民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中央派来了八路军，对冀东人民的武装起义是个巨大的鼓舞和支持。在我们需要领导干部的时候，上级党派来了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把红军的战斗经验和优良作风，带给冀东军队，这是冀东人民取得胜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冀东党组织，忠实坚决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按照上级"巩固平西、开辟平北、坚持冀东"的方针，在战斗中求坚持，在坚持中求发展。抗日战争中期，我们提出"巩固老根据地，开辟新根据地"的口号，使冀东的战斗力量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冀东的党组织和部队，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给日寇、伪军以及国民党军以大量杀伤。

冀东的共产党员，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很多同志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为共产主义的理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一九二七年的玉田暴动中，我们失去了于方舟、杨春林、解学海、刘自立等同志；在一九三八年大暴动前夕，我们失去了王平路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们失去了包森、刘诚光、陈群、周文彬、田野、丁振军、吕光、李杉、魏春波、节振国、张志超、王崇实、陈获、曾辉、才山、杨作霖、严祖高、欧阳波平、姜林、何宜之、王正军、钟奇、苏然、江士林、苏连存、蓝小川、王子仪、廖峰、杨大章、阎国珍（女）、耿玉辉、耿玉华、

卜庸、石光、卢企明、孟贞、王季安、于沐之、阎锡九、常云卿、阮务德、高佩之、李润民、高小安、姚铁民、魏国臣、苏林燕、王平民、王克如、孟受天、白砥中、谭志诚、关旭、高进忠、高存、胡里光等优秀的党员同志。这些同志在战斗中，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革命的尊严，换来了革命的胜利。

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干部刘诚光同志，在率部转战中被三千多日伪军包围在铁厂附近的甲山上，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战斗，打到弹尽粮绝，杀伤了大量敌人，最后，刘诚光政委率众砸了枪支，集体跳崖，以身殉国。

一九四四年十月，在杨家铺战斗中，周文彬、丁振军同志率领少数部队与敌人独八旅团数千人作战，为掩护机关干部突围二百余人壮烈牺牲，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

一九四七年，在热河柴火栏子，冀东区党委组织部长苏林燕、军区政治部主任李中权同志，带领冀东党的代表团从冀察热辽分局开会回来，与国民党匪兵遭遇。在数十倍于我的敌人面前，他们庄严决定：要么冲出重围，要么为党牺牲，决不当俘虏。他们同敌人进行了顽强搏斗，除李中权等同志冲出重围以外，苏林燕、孟受天、王克如等同志，都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东人民，在战争中也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仅在抗日战争中，就牺牲了二十二万五千多人。革命的人民同样是英勇战斗，不可征服的。

一九四一年一月廿五日，丰润县的潘家峪，被数千敌人包围，遭到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一千二百三十人被杀害，造成震惊中外的大惨案。但是，活着的人们，掩埋了亲人的尸体，擦干了身上的血迹，组织起有二十多名青壮年参加的“潘家峪复仇团”，走上战场，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冀东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凝聚着千千万万烈士们

的鲜血。可以说解放了的冀东大地，都是用革命军民的鲜血染红的。

冀东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冀东党的组织一建立，就同冀东的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关系。在战争中，党的各级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投身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工作中来。冀东的人民群众，向部队输送了大量的战士，提供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参加了艰苦卓绝的支前工作，冒着生命危险，保卫了我们的干部和战士。

除正规部队之外，在冀东还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游击队、武装工作队、报国队、村游击小组和民兵，这些地方武装配合正规部队开展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锄奸捉特，扰乱敌人，割断敌人电线，破坏敌人交通，在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人民群众在战争中表现了无畏的革命精神，也显示了丰富的创造才能。他们为了战争需要，创造了“人力电讯网”，发明了“消息树”，制造了各式各样的地雷、土炮等很有杀伤力的武器，挖了数不清的隐蔽洞和地道。

人民同党、同部队的关系，真正是鱼水关系。人民，是冀东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由于有了人民的基础，冀东这个敌人的咽喉要道，就可以有广阔的作战回旋余地，除了根据地、游击区之外，还建立了若干隐蔽根据地，把我们的工作伸入到敌人的据点去。

抗战初期，村办事员、武装班长、交通站、侦察网的设立，起了组织人民、巩固扩大根据地、锄奸反特的巨大作用。

冀东地区的斗争，是以武装斗争为主的，但冀东党组织一开始就重视了政权的建设。县政府是建立在几个县的交界区，名为联合县，这样就可以利用敌人的弱点开展工作。各级政权在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从事抗战勤务、保证供给、组织群众性的武

装、保守军事机密、锄奸防特、瓦解伪组织、扩大根据地以及保护人民利益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各级政权对于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和减租减息政策，实行合理负担，广泛地动员人力物力支援战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级政权都同部队作战行动密切配合，巩固、发展了根据地，也为保卫农民的生产劳动作了大量的工作。部队经常组织护耕、护秋的战役和战斗，各级政权组织人民劳武结合，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亦农亦兵，既打击了敌人，又发展了生产，因此，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保证了军需民用，有吃有穿。这是夺取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冀东人民用血写下的革命战争史是可歌可泣的，是动人心弦的。冀东的党组织，冀东的人民，尽管经历了不少的挫折和失败，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他们始终是顽强不屈的，他们从没动摇过，从没后退过，他们总是沿着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勇往直前。

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都曾对冀东的革命斗争作过正确的评价，给冀东党组织和革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中共晋察冀分局也曾指出："冀东党在根据地各种建设上，主要成就是，建设了有战斗力的党和军队。冀东党是在战斗中壮大起来的，他是群众性的大党，具有顽强的战斗力。"但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却诬蔑冀东党组织是"叛徒党"，是"国共合作的党"，诬蔑冀东是"黑冀东"，这岂不是别有用心、颠倒黑白吗？

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现在，全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进行新的长征。我们应该从走过的道路中汲取经验教训，学习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精神，紧跟党中央，夺取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忆父亲李大钊

李星华

"惟知跃进，惟知雄飞！"这是我父亲李大钊生前警策青年们的一句铭言，也是对他自己一生的最好写照。

父亲的一生，确是"惟知跃进，惟知雄飞"的一生！

我父亲生于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是冀东乐亭县大黑坨村人。在他生前不久，我爷爷李任荣就在一次大地震后受惊病故，我奶奶也在他出生刚几个月就去世了。他从小孤苦伶仃，靠七十多岁的大祖父抚养成长。他幼年上了四年私塾，十六岁到永平府（现卢龙县）上中学，没等中学毕业，又考进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学校里，他发愤读书，决心寻找一条救民救国的道路。因此，在家境日益窘困的情况下，他靠我的母亲赵纫兰在家中典当挪借，坚持苦学了六年。随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一九一三年秋又到日本留学三年。

父亲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期间，就参加了辛亥革命，曾写下《隐忧篇》、《大哀篇》等针砭时弊的政治论文，还写了"慷慨思投笔"那样一些抒怀言志的诗句。他曾对辛亥革命寄予极大希望，但这次革命，赶走了一个封建皇帝，却引来一个窃国大盗袁世凯。我父亲对于袁世凯之流十分愤慨，在《大哀篇》中写道："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他就在广大贫民百姓处在"刀兵水火，天灾人祸"之中的情景下，忧心如焚，出国学习了。临去日本前，他曾满怀深情，到离自己故乡不远的碣石山重游，正碰见日寇屠杀我国五名路警。他对日寇的

这种无理暴行，异常愤慨。他说：山盟海誓，不能忘记这个弥天的耻辱。他到日本后，进了东京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系。

在三年留学期间，父亲勤奋攻读，而且细心钻研了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先驱者幸德秋水、堺利彦、河上肇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受到不少启发。当袁世凯和日本秘密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在报上公布以后，他更加痛恨袁世凯，带着满腔怒火，奔走呼号，联络在日的留学生，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通电国内，誓死反对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在抗日倒袁的运动中，他写了《告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书》、《青春》等气势磅礴、鼓舞人心的文章，还编了《国耻纪念录》。在这些文章中，他发出"前进而勿后顾，背黑暗而向光明"的口号，提出要把古老的旧中国变成"青春的中国"。他还同逃亡日本的我国革命党人来往，成立了反袁的秘密团体"神州学会"。这时他已经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了。

一九一六年初夏，父亲中途辍学回国，到上海参加讨袁运动。随后又来到北京，创办了《晨钟报》。他要敲起警钟，把人们从梦中唤醒。但他只当了三个月的总编辑，就因工作不顺利而自动退出编辑部了。不久，他又受聘到《甲寅日刊》去当编辑。在为期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了近六十篇文章。他无情地批判旧势力，并密切注意俄国革命的发展，热情地介绍了被军阀反动政府诬蔑为"洪水猛兽"的"过激党"——苏联共产党。从父亲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断寻求真理，不断向前跃进，不断向上雄飞的革命志士形象。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父亲首先为这一伟大事变而振臂欢呼。他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正是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条道路。他说：我们在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到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光明，努力前去，

为人类做点有益的工作。"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一九一八年一月，父亲被北京大学聘为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所在地——"红楼"，从此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革命策源地。父亲在课堂上、报刊上和与青年们的交往中，积极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培育了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期间，他在《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上，连续发表了许多篇介绍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在这些文章中，他明确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他自己也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时的父亲，革命热情高涨极了，在创办《每周评论》时，亲自下工厂去校对，直到天快亮了，才回到家里来。

父亲不仅热心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革命经验，还团结和组织进步力量向革命的方向走。他在学术界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大学指导和帮助一部分进步青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帮助和指导组织学生救亡活动等等。他提倡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号召青年们"到民间去"。

一九一九年，欧战双方在凡尔赛召开巴黎和会，帝国主义的外交家们在会上不但对我国的正当要求置之不理，反而把德国在我山东省的特权利益"一概让于日本"，这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当时父亲经常同北大学生会的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人和其他进步青年一起讨论研究山东问题。《每周评论》也常以极大的篇幅报道巴黎和会的情况。北京学生要求"拒绝凡尔赛和约"、"惩办卖国贼"的一场反帝爱国运动，终于象火山一样爆发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四"运动。当时，父亲对运动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和口号，即著名的三大信誓："改造强盗世界！""不承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他一面大声疾呼，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一面积极参加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

学生们在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以后，有几十个学生遭到逮捕。北大的进步教授们成立了教职员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一起营救被捕学生，父亲被推选为教职员的代表。五月四日下午，学生代表曾到“红楼”向他汇报游行情况。运动扩展到全国以后，各地代表也纷纷赶来，在“红楼”图书馆的主任室里交流运动情况，研究进一步坚持斗争的办法。在斗争紧张的时刻，父亲连星期日也不回家，总是守在他的办公室里。后来他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同志分赴各大城市去进行宣传。邓中夏等同志先后到上海发动领导了“六三”罢工、罢市。从此，学生运动就发展成罢工、罢课、罢市的群众运动了。

“五四”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那时起，中国革命运动就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了。“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并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五四”过后不久，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这年夏天，父亲从昌黎五峰山写出一封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给胡适，驳斥了胡适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谬论。父亲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反对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一九二〇年一月，陈独秀被捕出狱后，由父亲雇骡车护送他到天津乘船去上海。三月，父亲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在他的“红楼”办公室里会见，讨论了中国建党问题，之后，他又介绍维金斯基去上海见陈独秀。这时，他在北京各校秘密发展社会主义研究小组，作为建党的准备。九月，他在北京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杭州等大城市相继成立了。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党成立后，父亲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后又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书记。一九二二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

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他的领导下，北方的建党工作、工人运动发展都很快。一九二三年，他和邓中夏一起，领导了“二七”大罢工。他又代表党到上海与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问题。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父亲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从广州回来以后，他领导北方国共两党的工作。由于北洋军阀政府下令通缉他，他不得不再次去昌黎五峰山避难。六月上旬，他接到中共中央通知，率领中国代表团去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他参加会议，参观访问，在东方大学讲学。大约过了半年时间，到初冬，他满怀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化装成商人回到了北京。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父亲团结在北方的国民党左派，同违背孙中山先生遗教的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后，又亲自领导了有几万人参加的关税自主问题的游行示威。北方的群众运动，发展迅速，有力地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帝国主义看到中国革命这样迅速发展，大为惊恐。于是，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日本帝国主义派出两艘军舰，掩护奉系军阀张作霖进攻驻天津塘沽的国民军。国民军为了自卫，开炮还击。日本帝国主义竟借口国民军不应开炮，与东交民巷公使勾结起来，援引所谓“辛丑条约”，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中国在大沽口的一切防御工事，并限期答复。这个“通牒”，引起北京市民的极大愤慨。三月十八日，父亲亲自参加并领导了北京学生、工人和市民的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出发，到铁狮子胡同的北洋军阀执政府请愿时，卖国贼段祺瑞竟下令开枪，屠杀请愿群众，造成了震动全国的“三·一八”惨案。父亲当时在执政府门外的影壁跟前，从容镇静地指挥群众撤退。在撤退中，他被挤倒在路边的小沟里，额上受了轻伤。在他站起来时，卫兵

要向他开枪，一个警察连忙喊："捉活的！捉活的！"这位警察跑到他跟前，却往东一挥手，让他快走，他才最后一个离开发生惨案的现场。

"三·一八"惨案以后，军阀政府把领导请愿的人诬称为"危害治安"的"暴徒"，又下令通缉父亲。他便转入地下，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运动。那时他所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市党部也都转入地下，住在东交民巷街的一个大院里。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头几年，父亲仍以教书为职业，著书立说，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阐发、解释党的政策。同时，他集中精力领导革命群众运动。他不但亲自参加和领导了北京的学生运动，很早就领导了北方的工人运动，而且于一九二五年冬，就在京东七县组织了农民协会，还领导了山西一些县份及内蒙呼和浩特等地的农民革命斗争。他特别注意冀东地区的革命运动。

早在"五四"运动以前，他就写了关于唐山开滦煤矿工人生活的报道，提出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口号。一九二二年，他派王烬美同志到京奉路工作，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不久，又派邓中夏同志到唐山指导开滦五矿三万工人的同盟大罢工。那时，在北方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唐山已成立了以邓培为书记的地区委员会。

一九二四年，父亲先后从北京派原籍冀东的地下党员回到乐亭、迁安一带活动，组织农民，建立了党的组织。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他把冀东很多青年革命知识分子送往苏联和广东黄埔军校或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李运昌、张明远等同志就是在那个时期送出去的。后来，这些同志回到冀东，成为直接领导冀东革命运动和武装斗争的骨干。

父亲在隐蔽期间，把全部精力都用在领导北方革命群众运动和对于北伐军的支援上。在北伐军节节胜利，不断向北方推进时，他身处敌后，在敌人的心腹中活动，对敌人威胁很大。所

以，北洋军阀政府把他看成“心腹之患”，时刻企图谋害他。但他却镇定自若，一直不知疲倦地工作。

军阀张作霖从奉天进关以后，首先下令逮捕我父亲。京师警察厅的侦缉队和东交民巷帝国主义的间谍们勾结起来，对革命党人进行了长时期的侦察跟踪。在环境越来越险恶的时候，父亲如果愿意离开北京，他是可以走的。许多朋友也都劝他走，但他都婉言谢绝，说北方的工作需要他，不能离开。他安排一些同志化装疏散，而自己却和一部分同志留下来坚守岗位。虽然环境万分险恶，但他的态度始终是那么镇静和乐观。他和同志们作了应变的一切必要的准备，烧毁了重要文件，每天练习打手枪，准备必要时同敌人搏斗。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清晨，北京的反动政府调集了警察、侦探和奉天宪兵共四、五百人，在日、美等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配合下，包围了我们在东交民巷的宿舍，逮捕了我的父亲。在这以后的一个星期内，蒋介石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乌云一时笼罩了全中国的天空。

父亲在监狱里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但他坚贞不屈。在敌人的法庭上，他声明自己是信仰共产主义的，过去所做的，完全是挽救民族危亡的行为；至于党的秘密，他只字未露。他的入狱，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他的声望、学问、道德，连反动报纸也不能不表示敬佩。学生群众、教育界名流、学者，各方都设法营救他。尤其是北方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计划劫狱营救他。但他知道了消息以后，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监狱在敌人严密警戒下，劫狱是一种冒险行动，事实上是不会成功的。他说：“我个人为革命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冒险，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力量……”党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反动政府的谋士们献策：对父亲这样

一个学者应“宽大处理”，以收买人心。据说张作霖也曾想采纳这个建议，对他实行“长期监禁”。这时，蒋介石派人北上与北洋军阀张作霖勾结在一起，蒋还来电：“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于是，反动军阀政府不顾社会的舆论，组织特别法庭，对父亲进行了秘密的“军法会审”。

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点，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突然匆匆忙忙开庭会审，以所谓“宣传赤化”、“意图扰乱公安”、“颠覆政府”的罪名，宣判了父亲和十九位革命志士的死刑。当天下午两点钟，他们就被解押到京师地方看守所的后院。在惨绝人寰的绞刑场上，父亲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他象平日一样，仍然穿着他那件灰色棉袍，态度非常镇定从容。他走上绞刑台以后，慷慨激昂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说。他指出：“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父亲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在祖国实现共产主义，坚贞不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我父亲是在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国民党蒋介石勾结英、美、日帝国主义侵略者三方的阴谋策划下牺牲的。到现在，他虽然已经牺牲半个多世纪了，但他“惟知跃进，惟知雄飞”的革命精神没有死，它依然在警策着我们和广大青年朋友，为了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勤奋学习、英勇战斗。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

大钊同志送我上军校

李运昌

一九二四年我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我十七岁），乐亭县党组织就派我和一个同学到苏联去学习。党的负责人把一封介绍信交到我手里，说："到北京去，找李大钊同志！"

听说要去找李大钊同志，我心里非常高兴。多熟悉的名字啊！他的家大黑坨村离我的家木瓜口村只有八里地，他每次回家，都要到我们村去看望他的两个要好的朋友李秀峰和岳泽普。再加上他在我们那一带相当有名，我小的时候就听过许多有关他的故事。他从小失去父母，靠老祖父抚养；他四、五岁开始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少年时就才思敏捷，能文善诗；他出国留过学，是个大学者，大教授。我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后，又知道他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心中更对他十分景仰。

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县里来了两个人：一个叫王岑伯，一个叫王佩环。前者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后者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他们是李大钊派来的，在县里办起了一所中学——乐亭中学。王岑伯任校长，王佩环教英文。一九二三年，我考入了这所中学。

这是一所完全新型的学校。在学校里学的是白话文，老师们自编自印讲义，彻底抛开了过去孔孟那一套。从北京来的两位老师对学生很好，既不打，又不骂，上课时讲的是过去从没听说过的新鲜道理，下课后，还经常和学生在一起交谈，谈五四运动，谈李大钊同志。从他们口中，我进一步知道了李大钊同志是

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共产党人。同时，对我们这些中学生有着很大吸引力的，是他们带来的那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书刊，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主义浅说》、《社会革命》、《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劳农政府》、《政治生活》、《新青年》、《向导》、《先驱者》等。这些书刊，犹如温煦清新的春风，吹进了千百年沉闷的县城，也吹进了我们的心里，掀起层层波澜。

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光彩。在课余，在假期，在白天，在晚上，一群年轻的学生，常常围着老师，听那些东方曙光一样的理论，或者几个人聚在一块读进步书刊。就是从这些书刊中，我们读到了大钊同志不少脍炙人口的文章。一次，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李大钊同志写的《青春》那篇文章。李大钊同志在文章中首先提出了宇宙无尽、青春无尽及其发展变化的宇宙观，进而又提出了"青春"的人生观。文章气势磅礴，一下子抓住了我们的心。他那"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的呼声，他那"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的呐喊，他那"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的号召，真如一声声响亮的鼓角，回荡在人们耳畔，给我们指引了光明的前途。大家朗读着，谈论着，受到巨大的启发和鼓舞。以后，同学们又将这些书刊分头送到各小学里去，广为传播。我负责发售《唯物史观浅说》、《马克思主义浅说》，还有个同学负责发售《向导》周报。这些书刊，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根据学校的布置，我们还走上街头，宣传孙中山先生北上，宣传召开国民议会，举行募捐、示威，声援上海、青岛等地参加"五卅"运动的工人。每当我们做着这些工作的时候，就感觉到是在实践大钊同志在《青春》中所说的："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就是在这些运动中，我逐步认清了道路，确立了信仰，加入了社会主义

青年团。现在，组织上又派我去苏联学习。所有这些，都是受到李大钊同志的影响和感召的结果啊！是他传播的新思想，是他派来的人，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经过一番准备，我们两个人瞒着家里的人，以到天津去开学联会为借口，坐了七十里地的骡马大车，赶到昌黎火车站。从那里改乘火车，来到了北京，先在前门找到一个小旅馆住了下来。

第二天，我们按着介绍信上的地址，找到了翠花胡同。大钊同志及我党的北方区委住在这里，国民党的北方执行部也住在这里。狭窄的胡同内，人来车往，熙熙攘攘，非常拥挤。国共合作之后，大钊同志当选为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此时，他既是共产党的北方区书记，又是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主要负责人。几年前曾被通缉的李大钊，已经以半公开的身份出现了。

我们走进大钊同志办公的地方。这是一个象教室又象会议室的普通房间，屋内放着一些桌椅、板凳。大钊同志正在接待来访的人。他身穿灰色夹袍，圆圆的脸上，架一副眼镜，留着两撇浓浓的黑胡须。因为来找他的人太多，我们只得坐在一边等着。在等的时间，我们仔细地注视着大钊同志。他态度和蔼，平易可亲，和人说话时，声调不高，语音沉洪，还带着很重的乐亭口音，使我们这两个他的同乡，听着格外亲切。

轮到我们了，我恭敬地递上县党组织的介绍信。大钊同志迅速看过信之后，又抬头打量了我们一下，连声说："你们来了，很好很好！"他把信放到桌子上，说："不过不巧得很，你们来晚了，两天前，赴苏联的船已经从天津开走了。"

听到这话，我们象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顿时凉了半截子，一路上的奔波，一腔的热切盼望，一下子全落了空。

大钊同志象个慈祥的长辈，深沉的目光凝视一会，作了一番考虑，用商量的口气说："现在黄埔军校有人在北京招生，你们两个去投考吧，怎么样？"

关于黄埔军校，我们听说过，知道办这个学校还有大钊同志的一份贡献呢。大钊同志根据我党第二次、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合作的精神，多次代表党和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接着，大钊同志又帮助孙中山、廖仲恺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黄埔军官学校，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开办的。但是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学习，学校是个什么样子，去了学些什么，一时又不清楚。

大钊同志好象看透了我们的心思，温和地说：“去吧，学学军事也好。我们党要抓军队，没有军队不行啊！”接着，他介绍了黄埔军校的情况，告诉我们，那里有许多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和教官。他又讲了学习军事的重要意义。他怕我们还不明白，又举例对我们说，长期的军阀混战，把国家搞得乱糟糟的，不成个样子，老百姓可遭殃了。我们党要建立革命军队，进行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非常需要懂军事的人。最后，他深情地勉励我们说：“到了那里要好好学习！”

这些话说得多深刻，多明白，我们一句句记在了心里。尽管一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抓军事的全部道理，但大钊同志所举到的军阀混战的例子，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因为那时直奉战争刚结束不久，我们亲眼见到了那些军阀的队伍，是如何欺压老百姓的。后来我才知道，大钊同志为我们党能有一支军队，已经做了许多工作。早在直奉军阀混战之际，他就开始联络冯玉祥。后来，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回师北京，将清朝最末一个皇帝赶出故宫，搞垮直系军阀吴佩孚，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召开国民议会，并将所部改成国民军。在这一期间，大钊同志曾多次亲自对冯玉祥作工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并担任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由于李大钊同志在北京未能到职，总政治部主任由刘

伯坚同志代理，一直到大钊同志就义后)。他还派共产党员到冯的军队中去，担任政治工作或其他职务，在军官和士兵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些工作，在以后的武装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表示愿意去投考黄埔军官学校后，经大钊同志介绍，我们找到招生的人，经过体格检查和政治、数学考试，我们两人都被录取了。这一年的十一月，我们从天津乘船，经上海，到了广州，成为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的学生。

虽然离开了大钊同志，离开了他所领导的北方区，但他对我们说的期望和鼓励的话，却一直响在我们耳边，成为激励我们克服困难，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到了军校以后，生活是紧张的，也是艰苦的，但我想到李大钊同志的期望和鼓励，就咬紧牙关，坚持继续学习。毕业之后，我被党组织留在广东，组织训练农民自卫军。在发动农民、组织农军的工作中，我常常想，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大钊同志，一定要好好向他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可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大钊同志就离开了我们。记得那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当我正在广东普宁县组织农军暴动的时候，从报纸上看到了李大钊同志被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惨杀的消息，非常悲痛。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继承大钊同志的遗志，为建设一支革命的军队，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而努力奋斗。

几十年来，我从接触到的人中陆续知道，大钊同志不但派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广州农讲所、武汉农讲所学习政治，还派人到列宁格勒军事学院，黄埔军官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昌分校、西北军干部学校去学习军事，为我们党培养了很多建党的人才，也培养了很多建军的人才。他是我们党早期就开始注意抓军事工作的领导者。他那时抓军事工作播下的种子，在大革命、土地革命，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钊同志想得多深，看得多远呵！

冀东早期的农民运动

——兼忆江浩、于方舟、杨春林三烈士

张 明 远

一九二六年秋，我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后，中共北方区（即北方局）农民运动委员会任命我为农民运动特派员并分配我到玉田工作。不久又派杨春林来玉田。于是我与杨春林和另外一名党员就组成了由中共北方区直接领导的特别支部，开始按着党的指示和南方的样子搞农民运动。首先，我们通过进步的小学老师办农民夜校，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介绍南方成立农会闹革命的情况。号召他们组织起来，抗捐抗税，打倒封建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十二月初，我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旗地变民”斗争。“旗地变民”是军阀政府掠夺农民钱财的一种手段。“旗地”本来就是农民自己的土地，在清兵入关后，王公贵族跑马圈占农民的土地作为他们的“采邑”，设皇粮庄头，收农民的租税。辛亥革命后，改由政府征收租税，将租金列入田赋。军阀为了筹款打内战，就把“采邑”土地的所有权说成不是农民的，强迫农民以高价重新买回自己的“旗地”，这美其名曰把“旗地”变为“民有地”，宣布过期不交买地款，即将地没收归政府拍卖。这样一来，广大农民都面临着倾家荡产的危险，于是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对。我们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经过宣传动员，先召开了一次有二十多村参加的农民代表会，号召大家齐心合力，抗拒交纳买地款，并以南方农民组织农会，取得各种斗争胜利的事例鼓舞他们。经过开会动员和宣传，代表们心情振奋，决定组织农会，

分头到各村串连，吸收会员，扩大组织，并规定了几条纪律：如坚决不交“旗地变民”款；一人有难，大家支援；保守秘密等。会后，我们会同代表分头下乡，踏着一尺多深的大雪，经过半个多月紧张的工作，在一百多个村子里建立了农会组织，正式签名入会的会员达数千人（一人代表一户）。在这个过程中，春林同志针对群众思想上的顾虑、怀疑，通俗生动、深入浅出地进行说明和鼓动，使他们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旧历年关迫近，政府催交税款日紧，我们召开了第二次农民代表会，决定利用腊月初八县城的大集，发动全体会员和赶集的一些农民，要求县政府和县议会（当时它经办“旗地变民”，从中提成分赃）缓办“旗地变民”，并做了具体部署。届时，有组织的群众数千人到县议会交涉，县议员们已逃避一空。群众非常气愤，烧了县议会，接着列队直奔县政府。这时近万名群众强烈要求县长出来答复。县长出来后，施展欺骗、拖延等伎俩，最后竟指使其爪牙鸣枪恫吓群众。群众更是怒不可遏，一片喊打声涌入县政府。县长被群众打伤，爬墙逃窜，县衙门被捣毁。时到傍晚，我们召开群众大会，鼓舞斗志，并通知次日在麻山寺村开各村代表大会，商讨下一步斗争计划。就在次日的大会上，县农会正式成立了。我们还向京津各大报投新闻稿，发呼吁书，造舆论。对于敌人可能的镇压，也作了准备。当时，我北伐军节节胜利，敌军前方吃紧，军阀政府害怕激起更大的民愤，对其更加不利，就借口县长办事不当，将其“撤职”，以暂息民愤。对“旗地变民”这项苛捐也不敢再催征了。至此，轰轰烈烈的反抗“旗地变民”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次斗争的胜利，大大促进了农会的扩大和各种斗争的开展，同时，我们还从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

一九二七年一月，我到北京向北方区汇报玉田县的建党情况和农民反抗“旗地变民”斗争的情况，要求将党的特别支部改为县委。北方区书记李大钊同志同意了我们的要求，肯定了我们的

工作，并指出中国是农业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鼓励我们要把农民都组织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根据李大钊同志的指示，我们成立了玉田县委，我任县委书记，杨春林任宣传委员，李立元任组织委员（以后退党）。三、四月间，我和春林去遵化开辟工作。我们吸取了玉田的斗争经验，以反"旗地变民"为号召，很快组织了数十村的农会，并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遵化县的党组织。在时机成熟后，我们发动了数千农民，手持各种武器，不顾敌人的鸣枪恫吓，包围了县城并游行示威，反抗"旗地变民"，这次斗争也取得了胜利。接着，我们又在丰润、蓟县等地区开展了工作。

一九二七年五月间，在北伐军进军河南，北方军阀行将崩溃之际，春林同志肩负党的重托，到冀南邯郸、大名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在那里争取并领导了农民参加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红枪会"和其他农民组织抗捐抗税，反抗当时统治河北的奉系军阀，扰乱其后方，袭击其军队，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

在春林去冀南的几个月里，玉田、遵化等地的农民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玉田，除开展各种抗捐抗税斗争外，还开展了清算豪绅地主隐瞒土地、逃避负担、贪污公款的罪行和实行累进的合理负担，夺取村政权等斗争。在斗争中，以退赃和罚款等方式，把豪绅地主手中的枪支掌握在农会手中，成立了农民武装自卫队。八、九月间，春林又回到玉田，和县委一起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取消"警察捐"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斗争的胜利，显示了农民武装自卫的力量，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的气焰，把玉田县的农民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一九二七年九月，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同志来玉田，传达党的"八七"紧急会议决议，号召我们响应"八一"南昌起义，举行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当时，由于国民党叛变革命，有些同志思想混乱，听了传达以后，方向明确了，精神振奋了。县委根据中

央精神，对暴动的准备工作做了部署，主要有：一、提出暴动纲领，在党内和农会中宣传动员，做好思想准备；二、加强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吸收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三、扩大农会，继续以清算、退赃和罚款等方式，从豪绅地主手中夺取枪支，加强农民武装自卫队；四、十月十日，以纪念"国庆"为名，在县城东关高搭讲台，召集全县农会（包括靠近玉田的遵、丰、蓟部分农会）会员大会，进行武装检阅、示威游行；五、以玉田、遵化农会为基础，筹建京东农民协会。

会后，春林同志负责去遵化传达会议精神，并做筹建京东农会的工作。荷波同志在玉田亲自到几个支部了解情况，传达动员，鼓舞群众斗志，并参加了十月十日的检阅示威大会。大会后，他对玉田的工作给予很高评价和鼓励，使同志们受到极大鼓舞。

十月十日的群众大会，有一万多人参加。县委针对当时斗争形势和群众要求，做了战斗动员，群众情绪激昂。城内的反动当局惊恐万状，下令紧闭城门。上万群众便高呼口号绕城游行。这次大会，为武装暴动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增强了群众对武装暴动胜利的信心。

顺直省委为了加强京东工作的领导，派叶善枝（以后叛变）为特派员来遵化。不久，成立了党的京东特委，由叶善枝、杨春林和我组成，叶任书记。特委以省农民协会的名义，在城子峪召开了玉、遵、丰、蓟四县农会代表会，成立了京东农民协会，杨春林当选会长。会后，特委召开了干部会议，对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进行了检查和研究。正在干部会议进行期间，玉田来人报告说，玉田反动当局正加紧对农会镇压，每天下乡抓人，县、区农会干部已有七、八名被捕。特委研究了这一动向，认为应利用这个时机，举行武装暴动，决定派我和县委书记解学海同志立即返回玉田，并授权我为总指挥，负责组织暴动。我们回县后，马上召开县委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暴动，并向各村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

体会员和自卫队员各持武器，分别在玉田城东行宫和城西三里屯两处集合。

通知发出后，仅一昼夜的时间，就集合了携带各种武器的会员约两万人，其中持步枪的自卫队员约三百人。在集合群众的过程中，我们又召开了农会干部会，讨论决定了暴动的纲领、口号、指挥部的名单及入城后的措施和纪律等。这些决定的主要内容有：一、打倒压迫人民的政府，成立农民自己的政府；二、取消警察，收缴一切欺压农民用的武器，成立农民革命军；三、逮捕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由农民政府审判；四、实行土地革命，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财产，分给农民；五、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旗地"无条件归农民所有；六、入城后严守纪律，听从指挥，公买公卖，不准擅拿公私财物。

队伍集合后，指挥部宣布了以上决定，进行了战斗动员，得到热烈的拥护和响应。

十月二十二日上午，暴动队伍分东西两路攻城。此时敌人已将城门紧闭，城墙上也早有警察、保安队守卫。当我西面攻城队伍与城上敌人交战时，东门已被我攻入，随即接应西边的队伍进城。我们解除了警察、保安队的全部武装，缴获枪百余支，并很快占领了县政府、县议会、警察所、税务局等机关。县长、警察所长、土豪劣绅等已逃匿一空。

暴动队伍入城后，指挥部立即宣布戒严，派出警戒，召开群众大会，宣告战斗已初获胜利，并颁布了即将实行的纲领。群众听后，无不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入城农民队伍纪律非常好，一切行动听指挥，对居民、商店秋毫无犯，深得人心。

为了肃清逃匿的反革命分子，指挥部的同志连夜带人在城内搜索，击毙尚广清、击伤吴殿三等土豪、恶霸。按照计划，我们准备次日出布告，成立农民革命政府，实施各项纲领。正在这时，杨春林同志率领遵化数千武装群众前来支援。叶善枝也赶来

了。叶善枝一到玉田，就被暴动的大好形势吓坏了。他不问情况，当着广大群众就指责我们“胡闹”、“蛮干”，逼迫我们立即退出县城，解散队伍。他恐吓我们说：“唐山、马兰峪都驻着大批敌人，很快就要来到，你们天亮以前不走，就一个也跑不了啦。”他一通胡说，把大伙闹得莫名其妙。我和春林、学海等都不同意他的意见，提出“暴动的目的就是推翻反动统治，建立革命政权，实施革命纲领；如这样匆忙解散队伍，放弃县城，更易遭受敌人镇压。”但叶善枝一意孤行，以省委代表身份硬逼着我们解散队伍，退出县城。

我们被迫退出县城，但未解散队伍，而是通知群众到城北郭屯宿营，次日开大会安排下一步行动。由于撤退突然，许多群众又听到了叶的恐吓，已自行散去不少。到郭屯后，我们立即要求叶召开特委、县委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叶在会上，又发表了很多谬论，说什么革命斗争是“此起彼伏”，“敌人来了，你就躲开，等到别处起来暴动，敌人去那里镇压时，你就起来再干，使敌人疲于奔命。”他还让我们遣散群众后，隐藏起来，待机而动。他讲的这一通“妙论”，遭到我和春林及到会同志的一致反对。我们提出：要向群众解释退出县城的原因；号召乘胜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财产，实行土地革命；将配有枪支的农民自卫队改编为农民革命军；收缴警察、反动民团的武器，扩大农民军。叶支吾其词，不明确表态，借口向省委汇报，就连夜跑回天津。我和春林按以上意见又做了具体部署，决定春林去遵化，加强那里的领导和斗争；我和解学海率领农民军百余人在城东北部开展斗争；县委其他同志各率一部农民军到各区执行上述任务。拂晓，我们先后召开农会干部会议和群众大会，向他们做了传达、动员，会后，分别按计划行动。

春林同志去遵化，一面宣传玉田暴动的胜利，发动群众同豪绅地主进行斗争，一面深入遵化北山一带，做争取土匪的工作。

当时北部山区，盘踞土匪多股，约二、三千人。绝大多数是破产农民，他们的头目，则成份比较复杂。在当时，他们对扰乱和破坏地主阶级的统治，有一定作用，但有时不分贫富，肆意烧杀抢掠，也给广大农民带来很大灾难和不安。根据群众要求，在夏季，我和春林曾对他们进行争取教育，特别是春林同志数次深入其内部，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与他们达成不滥烧杀，不危害农民利益，共同反对官府和土豪劣绅等协议。有几股还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的领导，改邪归正，听从我们的调遣。玉田暴动后，拟进一步争取他们成为革命的武装。

我和解学海同志率农民军在玉田东北部，开展收缴反动武装、打击土豪劣绅、分其土地财产、扩大农民军的活动。我们的第一次行动，是攻克吴庄子。大土豪吴殿三的家在这个村。我们在城内将他击伤后，这次去抄他的家。他儿子率民团二十多人负隅顽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被我们打败，俘虏团丁数人，缴获一部分武器，吴子逃窜。我们当即召开附近各村群众大会，宣布吴的罪状，群众争先恐后地控诉他的罪行，当场将吴的家产财物等没收，分给群众。这次战斗的胜利，给群众以很大鼓舞，附近很多村的群众纷纷向我们控诉本村豪绅地主的罪行，要求我们前去惩处，有的还带枪前来参军。我们的第二次行动，是到果各庄逮捕了大劣绅王文，缴获了长短枪数支，没收和分了他的财产。

为了加强玉田暴动的领导，省委派组织部长于方舟同志率领一批军事干部到达遵化城北王爷陵，通知我和解学海同志率部队去那里进行整编。

当我们见到于方舟时，他亲切热情地向我们慰问，同我们交谈。在听了春林和我关于玉田暴动的汇报后，他说，叶善枝向省委作了一些不真实的报告，并且个人表功、隐瞒错误，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给暴动造成严重损害。并说要把这个情况报告给省

委。

根据省委关于成立京东人民革命军的指示，我们决定以原有的农民革命军为骨干，尽快与分散在玉田各区的农民军取得联系，动员失散、离队的人员迅速归队，扩大革命军。杨春林任总司令，刘自立任参谋长，于方舟带来的其他军事干部分别担任营长、连长、参谋等职务。经过几天的整顿和扩军，队伍发展到二百多人。人民革命军的行动计划，是以玉田为中心，开展附近各县的土地革命战争。第一步是以再次夺取玉田县城为目标，并在向玉田进军的过程中，收缴沿途的反动武装，打击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动员群众参军。

在整编期间，我们还做了一面绣有镰刀斧头、上写“土地革命”四个大字的红旗和指战员佩戴的红袖章，并准备了传单、标语等宣传品。

十一月初，人民革命军向玉田进军，首战打下了平安城子，毙伤警察数人，缴获了该镇警察、民团的全部武器。集日，召开了群众大会，会场高悬红旗，臂缠红袖章的人民革命军战士，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我和春林同志在大会上讲话，宣传玉田暴动的胜利、人民革命军的宗旨和土地革命的纲领，号召农民起来斗争，成立自己的政府，不再向反动政府交粮纳税，动员青年参加革命军。会后，群众奔走相告，到处宣传，部队很快扩大到三百多人。

平安城战斗之后，我们进军至鲁家峪。这里有大小十几个村庄，其中东峪村有个恶霸地主刘玉梨，拥有团丁二十多人。群众对他早已恨之入骨。我们根据当地党支部的意见和群众的强烈要求，当即派部队去逮捕他，并准备收缴他的武器。但这个家伙早有戒备，据墙堡顽抗，而我们地形不熟，天色又已晚，所以激战将近一小时，未能攻入，当晚撤出战斗，计划于翌晨再战。不料刘玉梨竟伪称“鲁家峪窜来少数土匪”，连夜串联周围的反动民团

和地主联防武装两、三千人，于拂晓前将我们包围。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们又缺乏战斗经验，指挥失当，没有及时组织突围，致遭重大损失，伤亡、被俘三、四十人。营长李桂林（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遵化县农会委员萧林清（中共党员）、连长郭柱（中共党员）、区农会干部郭其玉等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敌人误将李桂林同志当成我，竟将他的头悬挂在玉田城门上"示众"，大肆宣扬他们的"胜利"，同时对群众施展更加疯狂的阶级报复。

于方舟、杨春林、解学海、刘自立等同志突出重围后，又困又乏，走到丰润县沙流河附近时，与当地民团遭遇，不幸被俘。被转押到玉田后，反动政府对他们施以种种酷刑。但他们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特有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在狱中，他们还对犯人和看守人员进行争取、教育，并想尽办法同党组织联系。

我们得悉他们被俘，心情非常沉痛，在多方营救无效，准备武装劫狱时，敌人竟在一个严寒的深夜，把于、杨、解、刘四同志押赴刑场，提前行刑。在赴刑场途中和临刑时，他们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慷慨就义。

鲁家峪战斗后，我们突围出来的同志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在玉田北部黄花山一带收集失散的干部、战士，继续坚持武装斗争。部队又逐渐发展到一百人左右，在玉、遵交界地区打垮了一些反动武装，镇压了几个土豪、恶霸。敌人把我们视如洪水猛兽，怕我们发展壮大，在一个月内，就派兵进行了两次"清剿"。第二次，敌人以两个团的兵力，在当地地主武装配合下，突入我驻地。经过激战，我死伤和被俘三十多人。我带领十数人突围脱险，其余均失散。敌人在平安城将我伤、俘人员全部杀害。

事后，我们向省委请示。省委根据新的情况认为玉田暴动已经失败，暂时失去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要我们转入地下活动，

恢复组织，团结群众，采取其他形式进行斗争。不久，北方局书记蔡和森同志（当时王荷波同志已被捕）到唐山召开冀东的干部会议，总结了玉田暴动的经验和教训，对以后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遭受严重挫折的玉、遵一带的党组织和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又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玉田暴动是“八一”南昌起义后，在北方由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农民武装起义。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于配合当时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以后冀东农民武装斗争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在回顾冀东早期农民运动的时候，使我更加怀念为这一运动作出重要贡献而牺牲的同志，特别是江浩、于方舟、杨春林三位同志：

江浩同志没有亲身参加冀东农民运动，但他却是这一运动的最早播种者，在冀东农民运动史上首先应该写上他的名字。

江浩，字注源，一八八〇年出生在河北省玉田县刘家桥村。一九〇八年，他留学日本，参加了“同盟会”，跟随孙中山先生，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后，他被选为国会第一届参议会议员。一九一五年，他不顾袁世凯的威胁利诱，坚决反对其称帝复辟，因而遭到通缉。他愤而奔走沪、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他潜心研究社会主义学说，从此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后来，江浩同志成为北方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在我党成立前后，江浩同志还曾到保定从事教育工作，和国民党左派的一些党员积极联系，在育德中学和保定第二师范学校传播革命思想，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这两个学校有许多学生走上革命道路，这与江浩同志的革命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

一九二三年，江浩同志与曹锟贿选总统的丑恶行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充分表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坚持正义、刚直不阿的硬骨头精神。

一九二四年，在我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改组了国民党。江浩同志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第一届候补监察委员。国共两党合作后，我党派江浩和于方舟等同志一起，到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工作。他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资格和威望，努力争取和团结国民党的左派分子，并发展其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共产党。由于江浩和于方舟等同志的出色工作，直隶省的革命群众运动有了很大发展。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义愤填膺，奋不顾身地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

这年夏天，他带领玉田县在京、津等地读书的一些进步学生回到家乡，利用全县小学教师暑假讲习会，传播革命思想。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江浩同志的。记得在讲习会上，他给我们百余名教师讲“五卅”惨案的经过，号召我们深入农村，向群众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军阀的道理。他讲话慷慨激昂，激动人心，使很多教师深受感动。

我在当时，还是一个不满十九岁的青年，由于身受国家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之苦，深感救国有责而报效无门，社会黑暗而变革无方。正在苦闷彷徨之际，听了江浩同志的讲演和另外几次谈话，阅读了他给的一些革命书刊，思想上犹如云消雾散，豁然开朗。在他的启发下，我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讲习会期间，江浩同志不顾酷暑炎天，紧张地工作。在他的启发教育下，发展了三个共产党员和一批左派国民党员，积极开展了革命活动。他还帮助成立了小学教员联合会，支持他们要求增加工资和撤换保守的教育局长的斗争。这些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讲习会结束后，江浩同志返天津，与我建立了通信联系。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我不时将遇到的问题写信向他请教，他都及时复信指导。当我对国民党与“三民主义”产生一些疑问，并且渴望了解俄国革命、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情况，写信向他请教时，他托人给我带来一本《共产主义ABC》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小册子。在当时秘密环境下，我真是如获至宝，经过反复阅读，大大启发了我的阶级觉悟。我当时虽然对共产党的认识还很肤浅，但非常向往加入共产党的行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这年冬天，我去天津找他，向他提出入党要求。经他与另一党员的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我入党前，他跟我谈的一席话，我是终生难忘的。那一次，他现身说法，向我介绍了他入党前十多年的历程。讲到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他怎样追求真理而不断碰壁，心情怎样苦闷、彷徨，怎样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光明，甚至怎样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最后，他感慨万分地说：“摸索了十多年呵，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我才懂得，只有马列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呵！”

一九二六年春，我在广州毛主席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江浩同志受党的派遣，也来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政府，搞统战工作。毛主席曾请他为我们作报告。报告之前，毛主席向学员们介绍时，称赞江浩同志是一位象松柏那样长青的革命元老。

当时的广州，正值北伐战争开始。一方面，革命气氛很浓厚；另一方面，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气焰也很嚣张。邹鲁、谢持、张继等组成的“西山会议派”和以孙科为主拼凑的“孙文主义学会”，在蒋介石的卵翼下喧嚣一时。特别是在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和五月的“整理党务案”中，蒋介石开始暴露了他的反动面目。

在这种情况下，江浩和我党许多革命先驱者一起，向国民党右

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巩固了当时的革命大后方，使北伐军得以顺利进军。

记得那时，我和其他同学常去找他，经常谈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他一谈起国民党右派大搞反共活动的罪行来，就非常气愤，痛恨不已。江浩同志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是十分坚决的。张继原是他在国民党中的挚友，后来，张继参加了“西山会议派”，江浩同志便断然与他绝了交。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打到武汉以后，江浩同志在那里任革命裁判所所长，主要是搞镇压反革命。他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坚决、认真、卓有成效的。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江浩同志遭到他们的通缉、迫害，于是，党把他派往苏联。在莫斯科，他抵制和反对王明的宗派主义活动，遭到残酷打击，被弄到远东海参威的一个学校里去教书，终因积劳成疾，于一九三一年逝世。

江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与一切邪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一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不断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历尽曲折和艰辛，终于找到了马列主义这个革命的真理。他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锻炼成为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漫长的岁月里，从华北、华中到华南，到处都留下他革命的足迹。特别是在天津、保定、冀东等地，他很早就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为我党早期的革命运动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冀东早期农民运动中壮烈牺牲的于方舟同志，也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的好同志。

我初次见于方舟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冬在天津江浩同志的寓所里。那时，我入党不久，学习了党章和党的其他文件后，带着一些问题向江浩同志请教，在那里见到了于方舟同志。当时我只知道他是“五四”运动天津的学生领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国

共两党合作后，他是国民党直隶省（即河北省）党部的主要领导人（后来知道他那时担任中共北方区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做国民党的工作）。这次见到他，觉得他平易近人、亲切热情，谈话观点鲜明。当时他提出并解释了共产党为什么比国民党更革命，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他简明地阐述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肩负着消灭一切阶级剥削、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国民党现在是代表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组织，有左派也有右派，左派中也有摇摆的和投机的。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就是要帮助和影响它，使它真正成为各阶级的革命联盟，按照我们共产党的主张前进。如果我们不加入，不从国民党内部影响它，它就可能被右派掌握，变成反革命的党。关于我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领导权问题，当时虽然没有象后来提的那么明确，但他确是抓住了这个问题的实质。这同陈独秀那时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我党是在野政党，只能参加和帮助，而不应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的机会主义观点，恰成鲜明的对照。

于方舟同志就是根据以上思想，抓住当时倾向国民革命的冯玉祥的军事势力控制了直隶省大部地区的形势，运用国民党这个组织，公开半公开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使国民党和工农学生等群众运动在我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发展；同时也在运动中发展了我们的党。一九二六年三月初，在于方舟同志主持下，召开了国民党直隶省的代表大会，完全按照我们党的指示，通过了开展工农妇青等群众运动和国民党党务工作的决议，选举了主要由共产党员组成的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会，于方舟被选为主要领导人（当时他也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这次大会，有力地推进了直隶省革命运动的开展。

于方舟同志在一九二七年玉田农民暴动之前，虽然没有直接领导我的工作，但从我们多次接触和共同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

革命友情，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是宁河县俵口村人，名兰渚，字方舟，在天津南开中学时与周恩来同志同学，在那时即怀着满腔救国热忱寻求革命真理。"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参加了周恩来同志组织的觉悟社。一九二〇年一月，在天津反帝爱国运动中与周恩来同志一起被捕，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迫使反动当局将他们释放。他为了探求马克思主义真理，还同周恩来同志邀请过李大钊同志座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党成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共产党。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勇挑重担，作风艰苦朴素，能密切联系群众，亲自参加和领导了天津的学生、工人革命运动。在革命洪流中，他锻炼成为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解放后周总理第一次会见我时，就问到方舟同志的情况，对他过早的牺牲，表示深切怀念。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各派势力联合向革命力量进攻。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败退，直隶省的形势日益恶化，我党领导的国民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敌人对革命者实行野蛮的屠杀，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有李大钊、陈乔年、李季达、江震寰、辛朴田、武述文、安幸生、苏泽、王紫树等二十多人先后牺牲。

就在这样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方舟同志肩负着中共北方区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顺直省委常委和组织部长等重任，无所畏惧地坚持斗争，利用北伐革命战争在南方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战胜重重困难，直接间接地领导了各地反帝反军阀、工人争取政治权利和改善生活、农民抗捐抗税等斗争，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北伐战争。我党在直隶省几十个县的党组织，大部分是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直隶省的国民党在我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也发挥了它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有

不少的国民党员，在我们党的教育下，加入了共产党。

这一时期，方舟同志虽然没有亲自来冀东领导工作，但是冀东的工、农、青等各种革命运动以及党的建立和发展，都得到了他的关怀和指导，冀东各项工作的成就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智慧。

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共北方局和顺直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我党参加国民党的同志退出国民党，并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揭露；同时，解散了我党领导下的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及其所属组织；动员很多国民党员也退出国民党。一九二八年夏，国民党统治了北方后，它对直隶省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进行了登记审查，不少的人因“态度暧昧”、“亲共嫌疑”等被清洗。也有一些受过我党教育和影响的国民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最困难的年代，加入了共产党，或给我党以各种支援。从这方面也反映了于方舟同志在国共合作时期对国民党工作的成就。

一九二七年十月，我党京东特委和玉田县委领导的以玉田为中心，包括遵化、丰润、蓟县部分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受到挫折后，省委为了加强对暴动的领导，派于方舟同志率领一部分干部来玉田。他到达后，在遵化召开干部会议，传达省委指示，初步总结了暴动的经验，批判了叶善枝的错误，整编了队伍，成立了京东人民革命军（当时尚无红军称号），打出土地革命的红旗，计划以玉田为中心，开展京东的土地革命战争。于方舟同志的到来和这次会议，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在向玉田进军途中，不幸被俘。在狱中，于方舟团结同志，鼓舞同志们的斗志，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他牺牲以后，我听从狱中出来的人讲，他在狱中还写了一本书，可惜这本书的内容和下落不明。这是难以补救的损失。

杨春林同志是冀东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河

北省丰润县杨义口头村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幼年时代，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清朝政府的残酷压榨，他的家和千千万万个农民家庭一样破了产。从十几岁起，他不得不进开滦赵各庄煤矿当井下工人。那牛马不如的生活，繁重不堪的劳动，包工大柜的盘剥和工头的皮鞭、棍棒，在杨春林的心里深深地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在十几年的矿工生活中，他养成了耿直、刚正、不畏强暴、见义勇为的性格。为了工人们的利益，他曾多次领头向煤矿的吸血鬼们进行斗争，因此，深受矿工们的爱戴。

一九二五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前后，在老一辈革命家邓中夏、赵世炎、唐山市委负责人何孟雄等同志的指导下，组织和领导了赵各庄煤矿工人的数次罢工斗争。

"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响应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开滦矿工人进行了反对压迫、争取政治权力、建立工会、改善生活等各种斗争，赵各庄矿再次举行大罢工。敌人派来大批军警施行血腥镇压，并四处搜捕杨春林等罢工领导者。杨春林无法继续在开滦工作，一九二六年秋，党组织派他到冀东做农民运动的工作，任农运特派员，化名李震之。

在并肩战斗的几个月里，我深深感觉到，春林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家。他性格爽朗、斗争勇敢，加上讲话旗帜鲜明，说服力强，富于鼓动性，所以，群众和同志们多称他"李大炮"。在他经常活动的玉田、遵化一带，妇孺老少都知道"李大炮"。他虽然是个文盲，但是，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强。党的文件或是党的会议，他听了以后，便能领会精神，融会贯通。在宣传我党的政策和主张时，他从不夸夸其谈，总是针对群众的生活和思想实际，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向群众解释宣传，能讲到群众的心坎上。在他常去的村庄，群众一见他来，就围在他身边，说长问短。不仅谈论工作和生活，甚至群众之间的纠纷，家庭中的不和睦，都向

他诉说，把他当作自己的贴心人。

杨春林同志在玉田一带工作期间，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牺牲是冀东地区党的一个重大损失。

于方舟、杨春林等同志牺牲后，当地群众十分悲痛，发出“誓为死难烈士报仇”的誓言。因为春林同志在玉田活动的时间较长，所以影响大，群众对他的感情深，对他的怀念也就尤为深切。当时群众用各种方式悼念他，有的全家老少抱头痛哭，有的在夜间偷偷焚香遥祭，为他祈祷，以寄哀思。

在回忆当年的斗争和回忆江浩、于方舟、杨春林三位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革命先烈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来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星城　圣洁　整理）

回忆冀东抗日大暴动

李运昌

冀东抗日暴动，是抗战时期我党在敌后组织的一次有二十万工农群众参加的大起义。是党中央、毛主席开辟敌后战场、开展冀东游击战争方针的胜利，是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使工人和农民结合、部队和地方结合、争取同盟者，实行统一战线的胜利。现在回想起来，我好象又看到起义时在那漫山遍野摇动红旗和刀枪的生龙活虎、憨厚可爱的战士。特别是那些和我朝夕相处、共欢乐、同艰苦的战友，好象就在眼前。他们有的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了，有的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含冤死去。王平路、胡锡奎、王仲华、包森、周文彬、苏林燕、李子光、丁振军、魏春波、刘诚光、陈群、节振国……这些在冀东战场上流过血流过汗，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同志，不论是生存下来的还是已经牺牲的，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了不白之冤。那时，冀东党组织被打成"叛徒党"；冀东暴动被诬蔑为"土匪暴动"；冀东抗日武装被骂成"大杂烩"、"豆腐兵"、"地主武装"。所以，凡是参加过冀东暴动的同志自然也就成了历史的"罪人"，不是称谓"错误路线的殉葬品"，就是诬蔑为"叛徒党的黑干将"！为此而被立案审查的冀东干部就达二千二百余人，其中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就有八百人！许多同志被揪斗、被监禁、还有些同志活活被整死。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死去的战友已经成了彪炳日月的英雄，我们幸存的人还要继续奋斗，还要用当年战争年代那股劲，来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使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江山永不变色。

一

在我党领导下，冀东举行过大大小小许多次暴动。如一九二七年的玉田暴动。一九三三年的迁西暴动等。最大的一次就是一九三八年七月的遍及冀东全境的抗日暴动。

冀东是华北通向东北的咽喉，它北据长城，南濒渤海，西控京津，是北国的战略要地，所以，这里历来是民族战争的重要战场。著名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都曾在这里横枪跃马，挥师征战过。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后，为实现其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自然要首先强占冀东，并把它作为进一步侵华的跳板。我们呢，为了驱逐日寇、解放全国，也十分重视冀东，下决心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后方，打乱敌人的部署，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牵制敌人的兵力，支援全国抗战。这样，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的情况下，我八路军挺进冀东和发动冀东人民武装起义就是势在必行的了。

在冀东发动武装起义是有条件的。首先，这里有坚强的富有斗争经验的党组织，有经过战争锻炼的干部群众。“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们冀东不仅地势有利，而且“人和”，革命干部、群众及其同盟者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是团结的。团结抗日，是起义成功的先决条件。

冀东南有平原、北有群山，物产极其丰富。起义军不仅可以在这里纵横驰骋，而且可以在这里休养生息、隐蔽活动。特别是这里的民间有大批枪支弹药。据当时的伪政府统计，冀东二十二个县就有民枪二十三万支。这样多的枪支对于武装起义军，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在冀东发动暴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工业发

达，有一支较大的觉悟高、战斗力强的开滦矿工人队伍。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在这里建立并开始工作了。工人运动，在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中共北方区的领导下，在王烬美、邓中夏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日益高涨。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北宁路罢工……而每次罢工都影响到农村。因为工人大都来自农村，他们同农民有着天然的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斗争不仅得到农民的同情，而且影响了农民，使农民的斗争觉悟逐渐提高。

从各方面的条件看，在这里发动起义，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行的。一九二六年，我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曾在毛主席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在彭湃同志领导下工作，并组织过广东普宁县的农民万人暴动。因此，我到冀东后，就想尽快开辟冀东战场，驱逐日寇，解放家乡。我出席了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在这期间，我听了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了新时期的新任务，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在讨论白区工作时，我介绍了冀东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我还给《解放周刊》写了一篇题为《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冀东人民》（署名鹿鸣）的文章。

彭真等同志对冀东的情况是了解的。彭真同志一九二六年当过唐山市委书记，一九三六年代表河北省委巡视工作时曾在京东特委所在地古冶住过三个月，所以对冀东情况及在冀东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意义是十分清楚的。这样，党中央毛主席就从各种渠道了解了冀东。

“七七”事变后，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全国抗战的形势和在冀东开展的抗日游击战的问题，并在八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提出：利用敌人的弱点，派遣红军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和放手发动群众，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创造敌后根据地的任务。会议根据毛主席关于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以雾灵山为中心进行游击战争的意见，作出了在冀热边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

根据洛川会议上的决定，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华北，一部分进驻五台山区，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样一来，冀中立即出现了抗日热潮，组成一个个游击队，同日伪军展开顽强而又灵活的斗争。原国民党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在共产党员吕正操同志的率领下宣布“团结抗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主张，并组织了人民抗日自卫军。到一九三八年一月，人民自卫军和地方游击队已发展到六万九千多人，创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这对冀东人民奋起抗日是个很大的鼓舞。

一九三八年，以聂荣臻同志为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成立后，毛泽东同志立即指示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具体作好组织部队挺进冀热边区的准备。指示说：“以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且是独立作战之区域，派去干部应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党政领导人需要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应作好充分准备。”遵照这一指示精神，晋察冀军区立即从八路军中抽调了一支队伍与一部游击队合编，成立了以宋时轮、邓华同志为正副司令员的八路军第四纵队，首先着手开辟平西，取得前进基地，作为挺进冀东的第一个步骤。

除军事上的准备外，中央还指示河北省委，立即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当时我任河北省委书记。为了发动冀热边区的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十月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亲笔写信指令我速回冀东，任冀热边区特委书记。随后，又派胡锡奎同志到冀东北宁路南，组织京东特委，开展路南工作，以便同冀热边互相配合。我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秘密回到冀东的，胡锡奎同志是十一月到达北宁路南的。不久，北方局又派来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李润民（团政委）、孔庆同（营长）分别到路南和路北协助我们举办游击队干部训练班，为发动游击战争准备军事骨干。这时冀东各县都有保卫团，人数很多。这些保卫团虽受地主的役使，但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拥护抗日或同情抗日的。这是一

股潜在的抗日力量，如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对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在暴动前，我们加强了对保卫团的争取和教育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七七”事变后，日寇在冀东不仅搞得民不聊生，而且危害到地主、资本家的利益，因此，大多数上层人物亦有抗日倾向。根据上述情况，遵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们成立了“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会冀东分会”。原来在天津的冀东人、国民党员洪麟阁、教育界知名人士杨十三和滦县民团头目高志远等都参加了“冀东自卫会”。各县也相继成立了分会，进行争取士绅、乡保长、民团的工作。另一方面则以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救国会、齐心会、工会、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等组织作基础，广泛吸收各阶层的会员，壮大抗日力量。同时，大量印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标语、传单，传播八路军对日作战的胜利消息，深入揭露日寇的暴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激发群众的抗日情绪。经过党的宣传教育之后，冀东人民纷纷加入了“自卫会”。“自卫会”发展很快，仅丰润、玉田、迁安（包括迁西）、遵化、昌黎、滦县、蓟县、乐亭等县自卫会员即达一万五千余人。参加者除基本群众外，有教员、学生和地主、商人、乡保长、民团领导人等。至此，冀东暴动在思想、组织、军事等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上完成了，就象一出大戏，剧本、导演、演员和乐队都有了，剩下的就是排练和开台了。

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冀热边特委决定召开京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同时决定在散会后立即由我党首先发动游击战争。月底，冀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在滦县的多渔屯举行，到会代表二十余人，会议由我主持。会开得很热烈，大家的心情都很激

动。会上除讨论了继续加强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外，还提出立即开展游击战争。各县都作了分工，并指派了负责人。会议决定由特委军事部长王平路同志负责组织一支队伍，先在迁安、遵化、兴隆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如果顺利，高志远、洪麟阁便以他们掌握的民团在滦县、丰润起来响应。另外，对游击战术、游击队的纪律及锄奸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和安排。

在这次会议以前，王平路、刘永丰等同志在迁西，马荫南、田心等同志在流沙河，丁振军、张鹤鸣、张振宇等同志在滦县，高小安等同志在沿海，高存、高昇等同志在兴隆，已经分别组织了游击小组。他们昼伏夜出，开展打击汉奸、特务、日鲜浪人的活动。会后，王平路同志立即调集了党员和自卫会骨干，把他领导的游击小组扩编成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游击支队。他任司令，史贞任政委，李润民任副政委，孔庆同任支队长，刘永丰任副支队长。支队成立后不久，王平路同志便亲自带队夜袭长城外伪满洲国的青河沿据点。在战斗中，王平路同志不幸负伤，因抢救无效，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平路同志临终前，嘱咐部队去找“老寿星”——魏春波，以便在他的指导下继续战斗。

在王平路司令员牺牲的情况下，史贞同志动摇了。他认为在冀东发动抗日游击战的条件还不成熟，主张解散队伍、埋藏枪支、等待时机。这一错误意见理所当然地受到魏春波、孔庆同、刘永丰等同志的批驳。魏春波同志坚决主张继承烈士的遗志，把武装斗争继续下去。史贞在这种情况下便离开冀东了。由于魏春波同志的支持，支队在孔庆同、彭夫、高存等同志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斗争。后来又增添了从滦县来的张鹤鸣、张振宇等十八位同志，这样，就重整旗鼓，连续出击，曾到口外兴隆县打下药王庙等伪满警察据点。以上这些斗争虽未取得重大成果，却为尔后的大暴动提供了经验、培养了干部、准备了武器。它实际

上就是冀东暴动的一次预演。

一九三八年春，中共河北省委两次派人到平西和晋察冀军区与八路军联络，约定在八路军挺进冀东时，冀东举行起义，迎接八路军东进抗日。八路军挺进冀东的时间，初步定在当年的六月，这样暴动就迫在眉睫了。

开滦三万五千人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到五月持续五十天的同盟大罢工和乐亭两千雇工要求长活价（工资）的斗争，成为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的先声。

开滦大罢工发生在三八年的三月。那时开滦工人在日、英帝国主义压迫下，生活日益恶化，加上伪政府大量发行伪钞，使物价飞涨，工人们挣来的那点工资，连自己一个人的生活也不能维持。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英国资本家还借口因战争，煤的销路减少，决定取消工人的抚恤金，并减薪，减年终“花红”等，并以解雇工人、关闭厂矿相威胁，企图把工人多年争得的福利一笔勾销。为了生存，许多工人不得不打连班挣钱养家。可是，矿上又施行了“井下记工制”，设立了牌子房，不准工人打连班，而工人们为了排队领工牌，还得搭上一两个小时。因此，工人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三月十五日，赵各庄矿务局强行设立井下牌子房。工人们不干了，他们扔掉工牌，捣毁牌子房，开始怠工。三月十六日夜间，他们宣布罢工，提出取消井下记工制，每日增加工资一角二分，不准开除一个工人等三项条件，并成立了罢工委员会，组织了武装纠察队。第二天早上，罢工工人包围了公事房，同“矿司”面对面地进行说理斗争。矿务局保安队蛮横镇压，公然开枪射击。工人们忍无可忍，呐喊着扑向矿井保安队，展开激烈地肉搏，最后，夺来步枪数十支，打散了保安队。工人们也为此付出了鲜血，有几十名工人负伤或献出生命。几天后，赵各庄全矿罢工，揭开了五矿同盟大罢工的序幕。

三月二十四日，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林西、马家沟矿相继罢工。唐家庄矿资方为了防止本矿罢工，收买了一批国民党工贼，成立了“护矿队”，对工人进行控制和镇压。赵各庄矿工纠察队，积极援助唐家庄矿工人。在节振国领导下，数千名工人，手持斧头、大镐直奔唐家庄矿，经里应外合共同战斗，击溃了“护矿队”，于是，唐家庄矿宣布罢工。唐山矿是敌人统治最严的一个矿，但经过斗争，终于也宣布罢工。这样，开滦五矿三万五千多矿工，就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统一步伐、统一口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经过五十多天的斗争，取得了大罢工的胜利。

在工人罢工的影响下，当年六月乐亭、滦南爆发了雇工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那正是麦收时节，三千多名雇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联合起来罢工，要求长活价。组织起来的雇工还喊出了“青纱帐起来抗日”的口号。

开滦罢工和农村雇工罢工先后呼应，此起彼伏，打乱了敌人的统治秩序，取得了胜利，鼓舞了冀东人民的斗志，对全冀东的暴动是一次极大的促进。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年五月京东特委与冀热边特委合并，唐山市工委也与冀热边特委合并，为的是便于全面发动工农暴动。

冀东暴动的另一个推动力量是八路军挺进冀东。

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央将原在晋西北活动的宋时轮支队调来平西，与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同志任司令员，邓华同志任党委书记、副司令员，李钟奇同志任参谋长。吴晋南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准备挺进冀东。六月八日，四纵队六个大队（团）由平西出发，浩浩荡荡开向冀热边区。经过充分动员和教育的正规部队，情绪饱满，士气高昂，大有猛虎下山之势。他们分两路进军，一路由邓华同志率领，途中连克敌人的许多据点。沙浴一战，全歼日寇一百余人，使沿途敌军大为恐慌。另一路由宋时轮同志率领，东渡潮白河，进及平承路后，大踏步进入冀热边境。

六月二十八日，八路军主力到达蓟县靠山集、将军关、下营一线。

由于没有无线电等通讯联络设备，又处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之下，因此我们不知道八路军挺进冀东的确切情况。所以在六月末，召开田家湾子军事会议时，未能将八路军到达靠山集一带的情况考虑进去。田家湾子会议是大暴动的预备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我党的负责同志外，还有同盟者洪麟阁和高志远的代表。会议通过了起义行动纲领，决定了起义队伍的名称是“冀东抗日联军”，番号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总队。“冀东抗日联军”共分三路：一路是高志远，辖第六总队（滦南）；二路由我任司令，胡锡奎任政治主任，辖第三（蓟县）、第四（丰、滦、迁）、第五（滦县）三个总队；三路是洪麟阁，杨十三为政治主任，辖第一、第二两个总队。为了加强党对同盟军的指导，河北省委还委派共产党员王仲华、李楚离二同志以“华北自卫会”委员的身份，分别指导高志远部和洪麟阁部，会议确定在七月十六日起义。

田家湾子会议以后，形势发展大大出乎原来的意料。首先，八路军第四纵队已经打到蓟县、兴隆交界处，冀东的日寇、伪军、民团慌忙进行堵截。伪军、民团从四面八方赶来时，还未见到八路军的面就自相惊扰起来。他们谈虎色变，惶恐异常，纷纷逃回原地。在途中，他们传出“八路军来了”的消息，群众听了，奔走相告，越传越神。有的人绘声绘色地形容八路军如何神出鬼没，如何飞檐走壁，如何锐不可当。有的说：“是时候了，该报仇了！”当时的情况是，人民的抗日勇气倍增，而汉奸、恶霸、伪职员虽故作镇静，实际上早就心惊胆战了。伪军、民团士气低落，敌伪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动荡，加上晋察冀军区所属各地区八路军、游击队为配合冀东暴动广泛出击，牵制、吸引了敌人的兵力，进一步鼓舞了冀东党组织和人民的斗志。这样，一场席卷冀东的大风暴就到来了。

三

一九三八年七月初，我从打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担任警务科长的朱欣陶同志那里得到了这样的情报：(一) 我八路军第四纵队已于六月二十八日进入靠山集；(二) 日军马上要收缴散在冀东各县的二十三万支民枪，以防暴动；(三) 冀东即将暴动的消息已经泄露，日寇正四出捕人，准备全力镇压。因为情况十分紧急，我们不得不提前起义。

七月六日，滦县县委的高培之和李润民、张鹤鸣、张振宇等同志发动当地农民起义。那天夜里，三百名经过秘密组织的骨干队员齐集港北村，宣布起义，成立了"冀东抗日联军"第五总队，下设三个大队。李润民任总队长，高培之任政治部主任，张鹤鸣任参谋长。天亮后，部队按原订计划，四出活动，进行宣传、收缴民间枪支、摧毁伪政权等方面的工作。这些举动，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所以，纷纷起来响应，有的带枪入伍，有的为起义队伍烧水做饭，呈现出一派革命胜利景象。

当时，冀热边特委和"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都设在迁西县西庄村。这个村子既在山区又是魏春波同志的家乡，群众条件非常好。在魏春波等同志的努力下，仅在西庄一带就组织了一个暴动大队。暴动时，我和胡锡奎、苏林燕、孔庆同等同志就住在这里。在"七七"事变一周年的那天，我发出立即集合的命令。西庄、铁厂、王官营、新集等地的四百多名基本队员一齐拥向岩口村，在腰带山下打出一面起义的大旗。这支起义军编为第四总队，由孔庆同任总队长，阎锡九任副总队长。

在起义那紧张而兴奋的日子里，胡锡奎、苏林燕、魏春波等同志都白天黑夜地工作着。记得胡锡奎同志亲自抄写司令部、政

治部的布告，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还坚持一笔一划地抄写。尽管他眼睛熬得通红，情绪却非常乐观。群众的情绪就更不用说了。起义前，他们赶做红旗、袖标，起义后，又为我们烧水、做饭、送信、贴标语和布告，连小孩子都跟在我们前后跑来跑去。

港北、岩口起义后，各地抗日健儿群起响应，遍地是红旗，遍地是赶来参军的群众，歌声、笑声、口号声，夹杂着零星的枪声，真令人激动呵！

起义开始后，就攻下了铁厂镇。敌人妄图扑灭这映天红火，七月八日，遵化县伪保安队步和骑兵一百三十多人扑向铁厂镇。四总队闻讯后，在孔庆同带领下，赶到铁厂北玉皇庙迎击敌人。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歼敌大部，俘虏八十余名，余敌溃逃，吓得遵化敌人紧闭城门，再也不敢出城。接着，起义军又攻克兴城镇。兴城北面的重镇三屯营伪警察巡官宣布起义，并派代表欢迎抗日联军进城。迁安、遵化、丰润、兴隆边境的起义群众，一齐向这里集中。在几天的时间里，四总队就扩大到一千四百多人。

四总队从三屯、兴城开到丰润的王官营，平息了那里的民团叛乱，又掀起了一个入伍抗日的高潮。仅王官营一个镇就参加了五百多人，许多人都是带着枪支入伍 许多地主上层人物也主动捐款献枪。民团团丁、伪警察自动来投的很多。所以队伍很快就增到四千多人。后来，实在容纳不下了，便将在丰润刘家营一带起义的刘锡彤，谷云亭部扩编成第十三总队。这时，丰、滦、迁、遵各地党领导的起义，有如山洪爆发，一齐奔涌而出。在迁西洒河桥一带共产党员叶田和张秉东、程铁军等退伍军人发动起义，组成第十二总队；在新集、杨店子一带，韩东征、陈汉民组织的起义军编成第十四总队；在遵化西部，李子华、马子敬成立了新五总队；在遵化南部，石林、甄凤阁成立特务一总队；在唐山北，刘锡纯、岳武成立了第十五总队……

在昌、滦、乐方面，李润民、高培之率领的第五总队于七月八

日过北宁路，安各庄警察局长率全体警察和民团起义响应。起义后与于振忠领导的昌黎起义军合编为第九总队。随后又有铁局寨、商家林一带起义队伍赶来集合，几天内就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

七月十五日，起义队伍转向北宁路南，驻扎在糯米庄、杨家院一带。滦县伪保安队三百多人赶来镇压。李润民同其他总队领导人高培之、张鹤鸣、张振宇等同志商量，决定打伏击，歼灭这股来敌。这天上午八时许，敌人排成一字长蛇阵，耀武扬威直奔杨家院而来。当他们刚刚进入半拉山口，我事先埋伏好的部队突然开火射击。敌人除骑兵外全部被歼，伪保安队长刘涛被活捉，两个中队长被击毙。这一仗共缴获轻机枪两挺，其他长短枪二百多支。

在部队南下到茨榆坨时，高小安同志率领一千多人的起义队伍赶来会合，编成第十三总队。队伍开到司各庄，又分出一部分扩编成第十四总队，在倴城与高志远的第六总队会合后，共同东进攻进乐亭县城。攻克县城后，乐亭县委负责人阎达开、李振华、黎巨峰、田自修、张其予等同志立即在县城四周率众起义，配合五总队攻下胡家坨，编成第十总队。在我党的策动下，乐亭沿海的盐警队起义，成立第三十九总队。打下汤家河据点后，部队发展到三千多人。此外，在滦县的砧山，王静安、李永玺的队伍发展到二千余人又扩编了特务第一、第二总队和一个独立大队。

在蓟、玉、遵方面，由于八路军第四纵队已进入蓟县边界，东部起义的消息又不断传来，所以，各地党组织不约而同地提前领导了起义。在王崇实、李子光、王少奇、商香阁等同志领导下，以蓟县为中心，开始大暴动。七月十四日，他们突然袭击了邦均伪警察局，活捉伪警三十多名，当即成立了三总队和十六总队。这就是“邦均暴动”。七月十五日，暴动队伍乘胜拿下上仓。这时白砥中、郝希武率众在下仓宣布起义。石门镇警察二十多人也在胡光、朱少清率领下起义，队伍扩大到数百人，编为第十七总队。遵化平安城子一带王济川、廖化一率领七百多人起义，编

为第十八总队。到七月底，这方面的起义部队共成立五个总队两个区队，总人数已达五千余人。

七月十六日夜间，我部抗日联军为策应开滦矿工起义，派出五个总队、一个特务大队，由榛子镇出发，怒潮般涌向北宁铁路，占领洼里、古冶两个车站，把唐山至昌黎间二百多里铁路截成数段，破坏了交通，使北宁路停车半月之久。当我第四总队接近矿区时，赵各庄几千矿工在周文彬、胡志发等同志的领导下，于七月十八日起义，起义后首先攻进赵各庄警察局。伪警闻风丧胆，四处散逃。

矿工起义的第三天，一部日军从天津赶来，他们配合当地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工人起义军进攻。工人队伍被迫撤出矿区。日寇走后，工人起义部队又回到赵各庄，并袭击了唐家庄包工大柜和当地民团。攻下唐家庄矿以后，成批工人入伍，林西矿工一千余人在陈德礼率领下起义，部队很快就扩大到七千多人。在这支工人武装转向农村，准备同我第四总队会合时，受到日本侵略军的截击。经过数小时的激战，刚刚组织起来的工人，被打散了。周文彬同志带着五百多名骨干转入农村。那时节振国也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他在榛子镇加入抗日联军，任工人大队的队长，后来，节振国的工人大队与第四总队并肩作战，成为一支纪律严明、勇敢顽强的模范部队。

起义中出现了很多奇迹。如卢龙师范学校校长高敬之，由于不满伪政府的统治，不愿当亡国奴，也组织几百农民举行了起义。他们起义后，打联庄会，剿土匪，后来高敬之带队攻打卢龙城。在关闭着的城门前，他大骂伪县长，列述伪县长的罪行，命令伪军打开城门。他凭着自己的威望和抗日的义愤，使城里的伪军乖乖地打开了城门。卢龙解放后，高敬之的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两千多人，编成第二十三总队，高敬之任总队长，共产党员阮务德任政治部主任。

在党的统一部署下，同盟者也发动了起义。滦县民团头目高志远和联庄会头目陈宇寰在多渔屯、小陈庄一带成立了十来个总队，约万余人在王仲华同志的指导下，他们活动在滦县南部、乐亭一带。

高志远是多渔屯的地主，因为和滦县伪保安总队队长、大汉奸刘佐周不和，受到排挤，他就联合陈宇寰等，反对刘佐周。他在地主上层人物和民团中有影响，动员他起义是有利的。陈宇寰是小陈庄人，家里穷，他为人公正，打仗勇敢，也有些威信。我党派去的王仲华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曾同姚依林、黄敬、蒋南翔、陆平、李昌等同志一起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是一个热情高、魄力大，非常干练的好同志。他在高志远陈宇寰部做了大量的工作，威望很高，他帮助高部整饬纪律，维系军心，并争取了陈宇寰等许多干部。

由高志远下委任状而他又指挥不了的，有丁万有部队三千人，占着昌黎县的南部。在抗日联军起义的影响下，杨二部队也拉起来了。他们活动在兴隆、遵化一带，打日本很坚决，他有两千多人，曾打到平安城子，后来被日本鬼子包围，抓住后，杀掉了。鬼子还把他的头挂在遵化城上示众三天。

国民党人洪麟阁在遵化县地北头村起义，协助他的有杨十三。他在我党派去的李楚离同志的帮助下，成立了两个总队，约四千人。活动在玉田、遵化一带，在蓟县起义军的配合下，曾一度攻占玉田县城。

另外，在滦南县有曹致福等领导的起义队伍上千人，在丰润县南部有鲍子菁的起义队伍数千人。在丰润、玉田之间还有李介人、王风义、田心等同志领导的一千余人。

在大起义的波澜中，国民党中的“蓝衣社”分子也乘机而起，招兵买马，组织队伍。其中有原国民党蓟县党部负责人李维周搞的“蓟北抗日救国军”，五百人左右。有陈维藩搞的“中央直

辖忠义救国军"第七路军，号称十个师，约一万人。陈维藩是个有名的绅士，他的势力从宝坻、宁河、武清一直扩张到丰润县南部。还有一个王文（王天魔），也是"蓝衣社"分子，也搞了个所谓"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三千人左右，主要活动在玉田南部、宝坻一带。

"蓝衣社"属于"军统"，是反共的。他们借人民起义的怒潮，扩张自己的势力，成立了"忠义救国军"第七路军、第九路军后，便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他们借抗日之名，来争夺地盘、搜刮民财、欺压百姓，并不真正抗日。

至于杂牌军，就没数了。当时在冀东的一些散兵游勇，乘机在昌黎、滦县、玉田、兴隆等地发展。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自立旗号，自封官衔，借抗日之名，四处活动，在革命高潮中，这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形是难免的。

从七月六日港北起义开始，到七月十八日开滦矿工起义，抗日队伍在昌黎、乐亭、丰润、滦县、迁安、蓟县、玉田、遵化、卢龙建立了三个中心区域。那时，从农村到城市，从山地到平原，西起潮白河，东至山海关，北从青龙、兴隆，南到渤海湾，到处都是红旗，到处都是暴动的队伍，也数不清有多少人多少番号，群众形容当时的情况是"司令赛牛毛，主任遍天下！"

"抗联"原定成立六个总队，结果搞了三十九个总队，外加一些特务大队，仅"抗联"系统就有七万多人全副武装的部队。属于国民党和杂牌的有三万来人。当村，老百姓都管我们叫红军或便衣队，因为那时我们还没有军装。但我们抗日联军统一佩戴着红蓝两色的袖标。红色代表共产党，蓝色代表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底色是蓝的），是国共合作的意思。起义部队的成份比较复杂，以农民、工人为主，有各阶层人士，还有少数流氓、土匪，良莠不齐，连唐山附近买卖鸡鸭的小商贩也成立了"鸡鸭队"。一般地说，我党领导的队伍纪律好，洪麟阁是冯玉祥的旧部，他

领导的队伍纪律也不错，高志远的部队就差劲了。因为高没当过兵，在他们那里，党的骨干力量又极少。至于杂牌军就更差了。

“抗联”成立后不久，便破坏了北宁路，摧毁了铁路沿线以外的所有敌伪政权，配合八路军先后攻克卢龙、玉田、迁安、蓟县、平谷、乐亭等六座县城和几乎所有的重要集镇，使得敌伪军全无战心。伪军官兵有的摆脱日寇的控制，调转枪口，起义抗日；有的一哄而散，弃枪回家。地主分子也收起了昔日的威风，好的参加了暴动，有的捐款、献枪。广大人民群众欢喜若狂，他们支援部队，庆贺胜利，“抗联”所到之处，老百姓杀猪宰羊，慰劳部队热闹非凡。

八路军四纵队于六月下旬进入冀热边区后，沿长城线艰苦转战在兴隆、青龙一带。七月初，中央电示，要他们速向迁安、遵化、卢龙挺进，冲破敌人的包围，同“抗联”会合。由于四纵尚未与冀东党取得联系，对冀东实际情况不明，加上所处的地区山深、村稀、生活十分艰苦，而敌伪统治又较强，因此，一时很难摆脱敌人，不得不于七月中旬转向蓟县将军关一带。不久，其中的三十一大队和三十三大队向东挺进。途中，赶上了连绵的大雨，部队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八月，第三十一大队进入迁安县境，不顾疲劳，一举攻克迁安县城。第三十三大队开进遵化、丰润、玉田边境。建立了丰玉遵联合县政府，刘慎之同志任县长。很快，四纵领导机关到达遵化铁厂，与我冀东“抗联”胜利会师了。

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冀东连打下几个县城，威名大震。他们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给起义军树立了榜样。当时，各路起义军纷纷要求八路军派干部加强起义部队的领导。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致电冀热边特委并转抗日联军，电文说：“中共中央与中共北方局以十万分高兴庆祝抗日联军

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及与八路军纵队的会合，并向在起义中在前线上死难的烈士及其家属致以崇高的敬礼。”“我们相信这一支在抗战中新成长壮大起来的生力军，定能在冀东各党派领袖合作与正确领导下，继续胜利，创造冀热边新的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给日寇野蛮侵略军以严重打击。”“望你们继续团结，集中注意力，打破敌人对你们的进攻，扩大与巩固部队，组织民众，建立冀热边抗日政权，肃清汉奸，扩大与巩固你们的胜利，为驱逐日寇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一电报，给我冀东抗日军民以极大的鼓舞。当时我们这些处于领导地位的人更是十分激动，决心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坚持冀东，打出更好的局面来。

八月下旬，四纵党委和冀热边特委以及八路军和“抗联”的主要负责干部在铁厂开会。会议由邓华同志主持，我和李楚离都参加了。洪麟阁派杨十三为代表，鲍子菁和高志远也都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会议对冀东暴动后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充分肯定了大起义的胜利，指出队伍多、秩序乱，需要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加以整顿。同时，提出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决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下设五个军分区。由宋时轮任军区司令员，邓华任副司令员。还议定成立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以便统一政权领导。普遍建立各县抗日政权，负责筹粮筹款，建立抗日秩序、训练抗日干部、组织救国会等。

铁厂会议以后，我们信心百倍地准备着手建设冀察热宁抗日根据地。当时大家曾议论说：按铁厂会议方针建设根据地，冀东将变成坚强的抗日前哨，变成埋葬日寇的汪洋大海。

四

一九三八年九月初，冀热边特委在霍庄召开干部会议，贯彻

铁厂会议精神，布置建立丰、滦、迁根据地和整训部队、肃清土匪的任务。在会议进行期间，宋时轮同志从蓟县赶来，决定去热河都山建立根据地。决定“抗日联军”全部随四纵东渡滦河向都山进发。九月十二日，我带十几个总队两万多人开到桃林口、界岭口一带。部队驻包各庄、抬头营、双望镇等地。我到了孙罗寨，当时宋时轮正带小部队同伪满军的一个营作战。激战多时不分胜负，双方只好撤出战斗。宋时轮带队回到迁安县。伪满军不知我军已驻进包各庄一带，所以自投罗网，一下子走进我们部队的驻地。同志们见伪满军送上门来，就摆开阵势打上了。五总队从上面一压，节振国的工人大队从后面一堵，十二总队、十三总队也冲了上去，一下子吃掉敌人两个连，剩下的一个连退到山上顽抗。五总队继续进攻，用新缴来的迫击炮轰击敌人。为了尽快结束战斗，节振国同志带一个突击队闪电般冲上山顶。他们大喊：“缴枪不杀！缴枪不杀！”把那些军官和伪兵吓坏了，他们一个个战战兢兢，跪倒在地。

战斗胜利结束，节振国同志亲自把伪营长以下七名军官带到司令部，交我处理。那时，咱们的部队还不晓得缴他们的械呢，所以这些人见到我的时候还挎着东洋刀，背着手枪呢。我们的参谋长是原东北军的一个团长，他懂，一见被俘的军官，立即上去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一仗我们生俘二百多伪满军，缴获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四挺和其他许多军用物资。进军都山，首战告捷，部队士气高涨，对建立根据地充满了信心。

进军都山先行的八路军主力，因在抚宁、青龙边境连续遭敌阻击，退回滦河以西。当时，四纵一些领导同志倾向于把部队全部拉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整训。

九月二十六日，党中央、毛主席电示宋时轮和邓华：“有全国坚持抗战的有利形势，有华北普遍的游击战争，加以八路军远近距离的配合，有广大群众的掩护，有雾灵山、燕山、五龙山东西

千余里之大山脉便于回旋，地方党有相当基础。根据以上各种条件，创造冀热边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可能的。但是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革命的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原则，建立坚持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克服起义新军中不可避免的复杂严重现象。”接到电报后，邓华同志和我与胡锡奎同志在迁西新庄子村开会研究部队的去留问题。我和锡奎同志都认为部队可以坚持冀东。邓华同志也同意了。这时四纵一领导同志来电说：敌人要分七路大举进攻，蓟县、平谷、密云地区也站不住脚，要求邓华同志带队西撤。不久，在邓华同志主持下召开了九间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河北省委、四纵队及“抗联”的主要负责同志。决定八路军主力和“抗联”全部西撤，留包森、陈群等三个小支队坚持冀东。这三个支队共几百人，分散在基础较好的地区。地方上只留周文彬一个主要干部，任地委书记，负责地方工作。

十月初，西撤开始了。原计划分两路走，一路从遵化、蓟县、密云，过潮白河到平西；一路经丰润、玉田、香河、三河到平西。当时鲍子菁的队伍没动，国民党七、九路军和其他杂牌军不听调遣。总计西撤“抗联”部队五万人左右。

因为没有经验，五万人的大部队拉成一字长蛇阵，浩浩荡荡向西进发。前面的队伍开到潮白河，我们后面的还没动呢。这样走法，不仅走得缓慢（有时一天一夜才走十里路），老百姓也受不了。因为队伍走到哪儿就得吃到哪儿，群众哪支应得起呀！前面的部队勉强维持，后面的就没吃的了，只好自行觅食，把沿途的柿子、核桃等都吃光了。加上正值深秋，天气渐冷，战士仍穿着单衣，真是风餐露宿、又饿又冷！刚刚丢下锄头扛起枪杆的农民，在未经训练、没有严密组织的情况下，抛妻别子，远离故土，思想上本来就有了波动，加上环境一艰苦，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逃跑现象，而且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部队走进狭长的山路后，不断

遇到敌人的截击，就更无法控制了。

在蓟县，敌人截击了陈宇寰部。陈宇寰与邓华是先走的，随部队转移的还有地方上的一些负责同志。当敌人攻上来时，王仲华同志命令曹致福带队阻击，掩护领导机关转移。在转移时，陈宇寰被敌人的炮弹击中，不幸阵亡。曹致福带的阻击部队打得很顽强，牺牲了一百一十多人，完成了阻击任务。

中路洪麟阁部，在马伸桥北也遭截击。洪麟阁也被炮弹炸死，部队一下子跑散了。我带领的部队走在最后面，到了密云，部队怎么也走不动了，拉得太长呵！结果敌人在瓦罐头打了我们一下。我们上山，人家用炮轰。炮一响，新兵就慌了，往一堆扎，所以炸死炸伤许多人。这一仗损失很大。

前面过潮白河的高志远部队，连遭阻击，哗哗地往后退。在这种形势下，部队再也稳不住了，成批成批地散去。路南的三十九总队三千多人，原来挺有战斗力，但只一宿就都跑散了。他们还把出面制止逃跑的总队领导阎达开同志抓了起来，说阎达开骗了他们。我得知后，立即去了个命令，才把阎达开同志要了回来。当时，我们没有军用地图，没有电台等通讯设备，只得挨打。记得当时高敬之问我："怎么办？不能前进了！"我也意识到，继续西进是十分危险的，部队可能全跑光，所以，在平谷县北樊各庄召开了干部会议。经过认真地讨论，决定停止西进，返回冀东，坚持敌后游击战。会后，我带余部六千多人，经三河、宝坻、玉田回到丰润的左家坞和滦县的杨柳庄一带。

在我们东返时，日寇对武汉的进攻已告结束。他们乘我西撤，重新加强了冀东的"防务"，致使汉奸横行、伙会猖獗、土匪蜂起。原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七、九路军除逃散的以外，大部投敌，被编为伪军、伪警或变成地主联庄会武装。他们为虎作伥，杀害起义人员及其家属。我军回来后，又碰上敌人的秋后大"扫荡"。从武汉调回来的日军小林部队一个旅团，在当地日伪军

的配合下，对我军进行了疯狂的“围剿”。我军本来已经相当疲惫，经过连日苦战，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几万人的队伍除到达平西的一千多人外，冀东保存下来的已不足两千人，撤到迁西柳沟峪时，又有许多人自动离去，回家潜伏。到最后，我一清点司令部直属部队，仅有一百三十人了。

有一天下午，我看见一个叫梁天柱的战士，他正站岗。我问他：“你怎么没走啊？”他说：“我是党员！”一句普通的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是呵，我是党员，党员就要坚持革命，而且要坚持到底！所以我就召开了个军人大会，作了慷慨激昂的动员，号召大家坚定信心，学习红军长征精神，把抗战进行到底。会后，我们重新布置了工作，把张志超、王化一、杨文汉、谷云亭等同志派出去，恢复地方工作，并收容干部和部队。不久，我们便集合了一千四百多人，重新建立了总队。与八路军留下的一个支队及包森支队配合活动，坚持下来了。原来敌人说共产党、八路军都被斩尽杀绝了。我们呢，又干起来了！我们的游击队四处活动，神出鬼没，打炮楼、锄汉奸、炸军车……群众看到我们，高兴得很。他们说：“八路军还在呀！李司令还在呀！”于是又鼓起了劲头，全力支持我们，使部队稳步发展壮大。并开辟了盘山、鲁家峪等根据地，使党中央、毛主席所瞩望的冀东抗日游击战争越打越大，越打越强。到一九四四年我们就建立起有五百六十万人口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发展了十万党员，建立了三万人的部队，组成了二十万人的武装民兵，基本实现了一九三八年铁厂会议所制定的计划和目标。

（星城　圣洁　整理）

忆抗战初期的几位战友

李运昌

抗战初期，许多曾和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如今已经不在世了。他们有的战死疆场，有的累病身亡，有的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含恨离开人间……这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一想起来就难过，就惋惜。如果他们今天还在，我想他们一定会象当年闹革命、搞暴动那样，积极地、热忱地、没日没夜地去搞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他们是一些多么好的同志啊！

一

在我印象最深的战友中，王平路同志是牺牲最早的一个。他原名叫高永祥，系河北省迁西县（旧属迁安县）上梨树峪人，生前历任中共迁安县委书记、冀热边特委书记、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等职务。在冀东，是他率领游击队向日本侵略者打响了第一枪，是他代表党帮助、指导民族英雄孙永勤进行抗日游击活动。他对冀热边区的武装抗日战争是有着杰出贡献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奔袭青河沿日寇据点时，他身负重伤，因医治无效，光荣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和王平路同志接触是从一九三三年七月开始的。当时，我是京东御侮救亡总会（即抗日救国会）主任兼军事部长。那年中央苏区正进行着艰苦的反“围剿”斗争。为了配合这一斗争，上级党

组织决定在冀东搞武装起义。因此，京东特委派我到迁、遵一带组织、训练游击队。一九三三年六月，我悄悄地来到迁西地区。开始住在鸽子庵高永琛家的一个窝铺里，由樊同同志给我送饭，记得那是一个极偏僻的小山沟，名叫鸽子庵。不久，我便去上梨树峪，见到了王平路同志。

平路那年三十多岁，长得很英武：高个子，大眼睛，白净脸膛，看上去很精神也很和善。他父亲叫高富贵，为人刚正、热情，同情革命。他爱人和弟弟、妹妹都参加了革命。因此，这一家人对我们外来同志异常亲热，尽心尽力地照顾。当时山区的生活是很艰难的，但我们每次到他家去，总是受到盛情款待，不是烙饼摊鸡蛋，就是小米饭熬白菜豆腐。他们自己却节衣缩食，省吃俭用，过着艰苦的生活。

平路原来曾在哈尔滨中东铁路上做事，先当伙夫，后来当路警。中东铁路是帝俄投资铺设的，十月革命后改为中苏合办，铁路主要由苏联人管理，也有一些中国人参加。平路在铁路上工作时，受到苏联革命的影响，逐渐懂得了翻身求解放的道理。他痛恨旧社会，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尤为憎恶。所以，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眼见日寇侵略中国，东北的大好河山沦陷，人民遭到空前的蹂躏、涂炭，他异常愤慨，便毅然回到自己的家乡——迁西上梨树峪村，很快就在本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梨树峪大多数人姓高，又都是穷人，很抱团。平路在村子里很有威望。他有才识，有胆略，为人正直、忠恳，好帮助人，因此，在村子里很受拥戴，很有号召力。这样，选择他家做秘密开会和碰头地点是挺合适的。他家有两层房子，从后山下来，经过村长高永顺（地下党员）家，跳下一个土坎，便是平路家。他家常年腾出一层房子给外来同志住。

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们到他家开会，他父亲见到我，非常高兴，说：“来啦，大侄子，炕上坐。”然后就出去安

排儿媳妇做饭，他到外边放哨。那天晚上参加会的有特委书记李葆华以及樊顺、王平路、樊永春、孙才和我。会上传达了上级关于组织武装起义，配合中央苏区粉碎第四次“围剿”的精神；宣布樊顺为游击队的政委，樊永春为队长，孙才为参谋长；决定游击队的名字叫“京东红军抗日游击队”；确定了起义日期；并委托我起草、刻印“京东红军抗日游击队”的布告。记得布告上明确说明了游击队的宗旨和任务：“赶走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会后不久的一天夜里，附近的党员和觉悟了的农民悄悄集合在一起，由樊顺宣布起义，并讲了纪律和起义的行动计划。起义的头一天就拉起一百五十多人。起义队伍从郭庄户出发，经过后韩庄、二拨子、苇子峪，一面到地主家取枪，一面向青山口挺进，打算拿下青山口团局子，缴获团局子的十六、七条大枪。由于游击队的指挥员缺乏实战经验，在一未侦察，二不保密的情况下，大白天就拉着几百人的队伍（多是徒手的农民），浩浩荡荡沿着大路向青山口前进，使敌人很快得到了消息。于是，迁安反动政府慌忙调集附近的地主武装一千余人，事先埋伏在通往青山口大道两侧的山上。当起义部队走进包围圈后，他们就开火袭击。由于力量相差悬殊，未经训练的游击队被打散了。樊顺、樊永春、樊同、高永瑞、周治国等几十名同志被捕入狱，起义失败了。这样一来，迁西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处于瘫痪状态。

为了恢复党的组织，继续开展斗争，当年十一月，李葆华同志和我一起到迁西去找平路同志。当时，迁西一带山区都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我们不能直接到那里去，就先到滦县北榛子镇小学王大中同志处。恢复了榛子镇党组织，然后绕道去迁西。我们去的那天夜里下着雪，走到前韩庄时，迷了路，又听见不远的地方有野兽叫，只好在韩庄村外的松林里蹲了一夜。第二天拂晓到高永顺处探消息，知道王平路同志正好在家，就悄悄从后墙跳

了进去。平路一见我们的面，高兴得不得了。他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问寒问暖，就象失散多年的亲人重又团聚一样。然后，平路汇报了他在这一带继续开展工作，联络失散同志的情况。他讲到许多同志被捕，家属受到牵连，是很惨的。个别人看到这种情况，灰心了，失望了，不愿再干了。但多数是坚定的，他们现在正串联，准备再干。我们发现平路同志的情绪不仅没有低落，反而更高涨起来。确实，这次挫折使他更坚定、更乐观、信心更足了。在他同组织失掉联系的时候，在非常危险、艰苦的环境中，还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战斗姿态继续顽强地开展工作，他的心是多么赤诚呵！

李葆华同志肯定了他的工作，要他重新组织县委，由他任书记，并规定了今后同上级接头的地点：一是滦县赵玉清家；一是乐亭木瓜口和大黑坨村。这次我们还共同总结了起义失败的教训，决定进一步宣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这以后，平路同志就经常到滦县、乐亭来，有时就住在我家。

迁西暴动失败以后，河北兴隆县的革命志士孙永勤，揭竿起义。他打出"天下第一军、杀富又济贫"的大旗，率领"民众军"在青、兴、迁、承边界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孙永勤的带动下，兴隆苇子峪李连贵、柳河八卦岭张福义，蓝旗营年焕兴奋起响应，组织农民暴动，抗击日本侵略者。兴隆起义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举行的，到一九三四年，王平路同志根据我党"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亲赴茅山，在"民众军"军部与孙永勤接头，向孙永勤等"民众军"领导人，说明了我党抗日的政策和策略，指出抗日战争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孙永勤对共产党一向钦佩，这次又看到王平路这样有才干、有远见而又平易近人的党的领导干部，更加深了他对党的感情和信任。于是，他欣然接受了我党的主张，并愿意接受党的领导。这以后，"民众军"在我党的帮助下，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孙永勤

任军长。在战斗中，"救国军"打了不少胜仗，闹得敌人坐立不安。后来，由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暗中勾结，两路夹攻，"救国军"被迫孤军奋战于茅山，同一万五千多敌人经过三个昼夜的拼杀，死、伤千余人，千余人突围，孙永勤壮烈阵亡。一九三八年，冀东举行抗日大暴动时，"救国军"中的许多干部、战士都参加了，他们中的两个大队长年焕兴、何子乔参加暴动以后，还入了党。这些，当然是与平路的工作分不开的。

平路有一种特殊的团结人的本领。他走到哪里，就能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并受到群众的衷心爱戴和热情接待。他和善可亲，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从不唬人。他民主作风好，遇事和大家商量，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讲话也有水平，有时几句话就能鼓起大家的劲头来，他是我党富有宣传组织才能的干部。由于他革命热情高，工作能力强，又有威望，所以，一九三五年被任命为冀热边特委书记。

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平路在长城沿线的深山老峪里秘密活动。他深知枪杆子的重要性，就着手组织地下游击队。开始仅刘永丰、高永琛、高存等人参加。除平路有一支短枪外，其余几人用的都是大刀、扎枪。他们夜间活动，白天分散，后来又自己凑钱买了枪和子弹，使游击队逐步扩大。

"七七"事变后不久，中共北方局派红军干部孔庆同和李润民二人到冀东来。这两个同志经过长征，又在延安"抗大"受过训，所以，他们到冀东来对工作是很有利的。而他们来到冀东，是专为协助组织冀东抗日暴动，训练军事骨干的。他们来后不久，我就在滦县多渔屯主持召开了冀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会上宣布王平路同志领导的游击队为"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支队"，王平路任司令员，史贞、李润民任正、副政委，孔庆同、刘永丰任正、副队长。

游击队成立后，决定首先打当地群众所痛恨的青河沿日本

关税局子。这个关税局子盘剥民财，欺压百姓，无恶不做，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打关税局子，一受群众欢迎，便于宣传发动群众；二可以缴获枪支、弹药，既可以解决游击队的武器问题，又可以打击日寇的气焰，是一举两得的事。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平路同志亲自带领游击队夜间奔袭青河沿敌人据点。当他们冲进院子时，平路同志受了重伤，由于流血过多，不幸在两天后牺牲。他牺牲前，嘱咐部队立即去找地下党的另一位领导人外号叫“老寿星”的魏春波同志，以便总结经验，继续战斗。

平路同志英勇牺牲后，大家异常悲痛，深为惋惜。平路同志很有才能，又很干练，加上他对革命的赤诚，对人民的热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使得他果敢、坚定、不屈不挠。他是我党的一位很有才能、很有威望、很有气魄的好干部，他的死是冀东党组织的一个大损失。

王平路同志牺牲后，游击队员们掩埋了他的尸体，擦干自己的眼泪，决心把革命斗争推向前进，消灭反动派，打垮日本侵略者，为他和千百个死难烈士报仇。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冀东党加紧准备抗日暴动的工作，终于唤起了冀东成千上万的人民，在当年七月举行了冀东抗日大暴动，组成了十万人的全副武装的抗日队伍，解放了冀东大片土地。以后尽管又经历不少次挫折和失败，但我们还是把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坚持下来，而且抗日部队越打越大，越战越强，终于建成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二

王仲华同志逝世也是比较早的，并且是最令人痛心的，他是

在一九三九年治病时用错了药而死去的。

仲华是湖北圻春县人，原名董毓华，出身贫苦，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革命。一九三四年他来到北平，考入中国大学。他当时在学生中间威望很高，是进步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三五年，他同姚依林、黄敬、蒋南翔、陆平、李昌等同志一起，参加并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由于受到反动政府的追捕，他被迫废学，离开北平，到天津从事地下活动。主要是在天津上层人物中间做统战工作，他是当时"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是一个热情高、魄力大、能言善辩而又不尚空谈，才华出众而又质朴谦虚的坚强骨干。

仲华的活动能力很强，讲话不仅有条理，而且富于煽动性，群众都爱听他讲话。他讲话一下子就能抓住大伙儿的心，鼓起大伙儿抗日的勇气和斗争的热情。凡是他参加的会议，他都从始至终认真听取每个人的发言，抓住每个人讲话的中心和要点，进行分析、对比、总结和概括，所以，他的讲话不仅有针对性，而且又能在别人的基础上提高一步。由于他知识渊博，诚恳平和，还很受进步教授的欢迎和称道。所以，他在上层活动从容不迫，成效显著。

一九三七年，根据冀东形势，上级党组织决定建立冀东抗日武装部队，就先后派我和胡锡奎同志去组建党的武装，派王仲华、李楚离以自卫会委员的身份去指导同盟者的部队。仲华到以地主武装民团为主体的高志远、陈宇寰部队，楚离到爱国知识分子国民党人洪麟阁、杨十三领导的部队。

王仲华到高志远、陈宇寰部队后，积极工作，帮助该部在滦县马城、胡各庄一带组织了十多个总队。王仲华曾带领这支部队攻打乐亭县城，在我党直接领导的第五、第九、第十等总队的有力配合、援助下，经过三天激战，攻克乐亭县城。由于高、陈二人均为党外人士，民团出身，对革命道理和政策懂得很少，部队

纪律很坏，多亏有王仲华同志帮助，才基本上按着我党的政策行事。

在高、陈部队里，仲华同志充分发挥了他宣传鼓动的才能。在敌人飞机轰炸乐亭县城时，暴动部队受了损失，部队士气低落，不得不撤出乐亭县城。仲华立即进行宣传鼓动，讲了失败是胜利的先导，受挫后可以总结教训，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在他的鼓动下，军心稳定了，士气也恢复上来。

高志远系地主民团出身，他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的虚伪狡诈，唯恐仲华的威信高于他，所以，多方猜忌。但仲华当时仍以大局为重，耐心地做教育工作，赢得了高、陈部下绝大多数干部、战士的信任。后来终于把陈宇寰争取过来，跟党走。这在当时来说是很不容易的。那时，高志远部队的军事指挥权不在我党手里，但政治领导基本上在我党手里。在"抗联"西进时，高志远能够带一千多人到平西整训，是和王仲华同志的政治工作分不开的。

高志远到平西后，野心很大，他不甘心过根据地里的穷苦生活，就派其心腹大地主孙善交去北平与敌伪联系，企图把部队拉到北平投降。我驻平西八路军领导机关察觉后，立即把高志远逮捕、公审，然后处决了他，防止了高部的叛变，并改造了他的部队。改造工作是在王仲华、朱其文二同志领导下进行的。当时王仲华任平西抗联司令员，朱其文任政治部主任。经过改造，这支部队终于巩固下来了。后来，这支部队又同白乙华、王亢同志领导的抗日先锋队合并，编成八路军第十团，成为坚持平北抗日斗争的骨干力量。在坚持平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建设平北根据地，保持平西到冀东的通道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最令人难过和惋惜的，是王仲华同志没有看到抗战的胜利，就病逝在平西蓬头村了。那是一九三九年六月，仲华年仅二十八岁，正是他年富力强，更大发挥作用的时候。

王仲华同志是一个大学生，在民族危急、国家危亡的关头，他毅然到冀东参加了武装暴动，坚定地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并担任了武装部队的指挥员，为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和建立平西根据地作出了贡献。他是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也是青年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三

在冀东抗战初期牺牲较早的同志中，节振国是一位有名的矿工英雄。他的勇敢，他的豪爽，他的忠心报国精神，是人所共知的，我从第一次见面就开始注意他了。并且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

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冀东抗日大暴动以后，抗联司令部就设在滦县的榛子镇。一天，一个青年矿工突然闯进我的屋里来，指名道姓，一定要找我，说他是赵各庄煤矿工人，叫节振国，前来投奔共产党。

我立刻就被他的质朴、爽直吸引住了，于是，赶紧站起来握住他粗壮有力的大手，询问他的情况。他只简单介绍了两句，就急切地问："我要抗日，共产党到底收不收？"我看着他那着急的样子，连忙说："收！怎么不收?!"他惊喜地握住我的手，使劲摇了几下，眼睛里迸出了激动的泪花……

原来，在开滦五矿大罢工时，节振国担任了工人纠察队的总队长。因工贼夏连凤出卖，日本鬼子和伪警察赶到他家来抓人。当时，节振国不在家，鬼子就把他大哥节振德捆绑起来，进行拷打。节振国闻讯赶回，看到家里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哥哥、爱人和孩子都无端受到欺辱，忍无可忍，一怒之下，刀劈鬼子官，夺路逃走。他大哥逃走不及，被鬼子打死，爱人刘玉兰和孩子陷入

虎口。振国逃出赵各庄以后，躲在丰润县的一个朋友家养伤。伤好后，他利用自己和矿工的密切关系，在韩家梢一带组织了一支工人游击队，他任队长。队伍虽组织起来了，但他总感到自己人少力单，到平西解放区找共产党、八路军吧，又山高路远，人地两生。正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冀东爆发了抗日武装起义。他听到暴动的消息，高兴极了，立即找到他的朋友赵振威，并由赵振威引荐投奔洪麟阁。洪麟阁是国民党爱国人士，开始他看不起节振国这样的“窑花子”，还担心工人不好领导，就婉言拒绝了节振国的请求。满怀抗日热情的节振国并未就此灰心，他打定主意，去找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节振国，现在站在我的面前，请求党组织收留他。

我虽然第一次见到他，但对他早有了解，不仅知道他是山东逃荒过来的穷苦青年，是一个会武艺、孚众望的硬汉子，而且知道他是一个有民族气节、忘我革命的矿工领袖。开滦工人都知道他，信服他。矿上党组织的负责人周文彬、胡志发等都很信赖他。对这样一个满怀抗日激情的优秀工人，怎能不接收呢！所以，我当即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代表抗日联军司令部委任他为工人大队的队长，正式颁发了委任状，要他回开滦矿发展工人武装。

振国回去后，很快就拉起一支几百人的矿工队伍。这支队伍在他的领导下，战斗力很强，纪律也好，是当时深受群众欢迎和爱戴的一支部队。节振国在领导这支部队作战时，表现出非凡的机智和勇敢。记得在迁安孙罗寨战斗中，我军的第五总队在李润民、张鹤鸣、张振宇率领下，包围了伪满洲军的一个营。敌人占据山头顽抗。节振国奉命带一个突击队，象闪电一样突然出现在山顶，把众多伪军吓得面如土色，不知所措，一齐跪倒在地。节振国激于爱国义愤，向伪军慷慨陈词，晓以大义。敌人在我四面包围和节振国的说服下，缴械投降（只跑掉几十个人），俘虏伪满洲军营长等军官七人，缴获轻重机枪四挺、迫击炮两门。

三八年抗联去平西途中受挫后，节振国仍然能保持几十人的核心队伍，在榛子镇、王官营一带坚持武装斗争。他多次化装摸进敌人的据点，抓汉奸、锄特务，使敌人闻风丧胆。节振国虽不象敌人传说的那样会飞檐走壁，但他确实浑身是胆，智勇双全。他的武艺也十分出众，对打起来，三、五个棒小伙子到不了他跟前。所以敌人怕他，实在没办法制服他，就放出夏连凤这条恶狗来劝降，企图用拜把子的义气来软化他，拉拢他。节振国毫不迟疑地处决了夏连凤，粉碎了敌人的诱降阴谋。

三八年冬天，在迁西的洼子地村，节振国找我郑重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当时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他在人生道路上又迈出的重要一步，所以，鼓励了他，并委托政治部组织科长卞振东和代主任陈荻同志负责，对他进行帮助教育，尽快吸收他入党。

节振国同志是不顾一切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在那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他顾不上妻子、儿女，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战斗。他的妻子刘玉兰是个贤惠人，为了支持他革命，历尽风险，吃尽苦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后来我派人从敌占区把她们接了出来，秘密安排在华山峰、陈仓峪一带可靠的抗日堡垒村里。

一九三九年秋，节振国带着部队随陈群、苏林燕赴平西整训。为了进一步培养、提高他，党组织又特意把他送进中共北方分局党校学习。次年六月，振国学习期满，怀着再举钢枪、大干一场的决心，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冀东。当时，我们都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因为经过这一、两年的战斗和学习，他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相信他一定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但是，在尤各庄的一次战斗中，这个人民的忠诚儿子，工人的杰出英雄，不幸中弹牺牲了。他壮志未酬身先死，使我们深为悲痛，深为惋惜。

节振国同志是一位很有号召力、很有威望的工人干部和军事

指挥员。他的死，是冀东党和军队的损失，特别是开滦工人武装的巨大损失。他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浩然正气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一直到现在还鼓舞着开滦矿工和冀东人民投入新的战斗，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

在冀东，有一位深受同志们尊重和爱戴的“老寿星”，他的名字叫魏春波。

魏春波同志（原名魏长河），迁西县西庄人，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坚强干部。他生于一八九〇年，一九三三年入党，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在一次突围战斗中英勇牺牲。

我认识魏春波是在一九三六年，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同他接触较多，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魏春波家的生活水平相当于下中农，弟兄三人住在一个院。魏春波排行第二，他有几个女儿，他大哥和三弟下边有几个男孩子。一家人，日子过得很和睦。由于魏春波在外面作过事，经得多，见得广，又有文才，所以在家乡很受尊重，连哥哥、嫂子都听他的。

魏春波从小就生活在穷苦人民中间，受地主老财的压迫，所以他爱替穷人说话，好打抱不平。在帮助长工同地主打官司时，惹恼了本地大地主省参议员王连西，结果魏春波被诬陷，捕进监狱。在狱中，他受尽了摧残折磨，得了伤寒病，胡子、眉毛、头发几乎都脱光了，险些死去。他刑满出狱，从天津回到家里，决心同旧社会的恶势力誓不两立，死也要同土豪劣绅、达官显贵斗到底。所以，他的立场非常坚定，爱憎非常鲜明，斗争非常顽

强，革命非常彻底。他是带着他的全家，以破釜沉舟的姿态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的。

他是个大高个儿，长得很富态。由于毛发脱落了，样子又很慈祥，所以大家都管他叫“老寿星”。他性情豪爽，说话干脆，一接触就感到这是一个坚定、勇敢、稳重、果断的人。他不仅原则性强，办法也很多。当革命受到挫折，个别人垂头丧气的时候，他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和坚定。他坚信党的主张，坚信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必胜，并以我们党和毛主席领导长征、贺龙两把切菜刀起家的事迹鼓舞其他同志。我们当时总的感觉：他是我们的好同志、好干部、好参谋长，是我们党的中坚力量。我记得一九三八年一月，当王平路同志在打青河沿据点牺牲，游击队的某些干部垂头丧气不愿再干时，是他出来为游击战士打了气，又在他家重新集合起一支队伍，才继续斗争下去的。这支游击队终于打下了兴隆县药王庙敌人据点，并成为当年抗日大暴动的核心力量——抗联第四总队和第五总队的骨干。

平时，魏春波穿一身黑布衣服，出门时戴礼帽，穿长袍，俨然是个士绅。他交游很广，团结了一大批贫苦农民和农村中的勇敢分子，积极扩展革命力量。由于他能言善辩，坚韧不拔，加上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在迁西和丰润腰带山一带威望很高，连官府也惧他三分。

由于他结交广泛，外面来人不大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他家就成了党的可靠的联络站。我党的负责干部李葆华、我和胡锡奎及阎达开同志，都在他家里住过。三八年大暴动时，冀热边特委和“抗联”司令部都曾设在他们村里。他全家节衣缩食，招待外来同志，支持革命。其实，他家生活并不宽裕，常常靠借粮、卖地来维持。他曾担任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的顾问，后来又任丰、滦、迁联合县的县长，积极地、热诚地为部队筹粮、筹款，扩充枪支弹药以及发动群众锄奸反霸等。由于他懂得“枪杆子里

面出政权”的道理，所以对发展革命武装尤为努力。他开始投身革命时，就借钱买枪，后来发展了许多党员参加武装斗争。一九三八年冀东大暴动成立“抗联”第四总队时，光他那一带就拉起一个大队，由何文全当大队长。他和他的一家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

一九三八年冬天，魏春波的爱人徐桂芝同志不幸被捕，敌人对她严刑拷打，但她宁死不屈，最后英勇就义。他的哥哥、弟弟和侄子们也都先后牺牲。魏春波一家为了革命，献出了六个人的生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五

胡锡奎同志也是我结识最早的老战友，不过，他不是牺牲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而是惨死在林彪、“四人帮”控制下的监狱里。

胡锡奎同志是湖北孝感县人，生于一八九六年，一九二五年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九年回国后，曾任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秘书、北平市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等职务，在白色恐怖下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一九三一年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始终站在对敌斗争前列，保持了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一九三六年由党组织营救出狱。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河北省委秘书长、京东特委书记、冀热边特委书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长、晋察冀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对坚持抗战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热河省委书记、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社会部长。工作成绩卓著，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赞扬。解放后，他曾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九六三年

后，他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为西北地区的文教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心血。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陈伯达、“四人帮”之流为其篡党夺权的需要，恶毒诬陷和残酷迫害胡锡奎同志，攻击他是“叛徒”、“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以这些罪名把他捕入监狱，百般折磨。胡锡奎同志不幸于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在狱中被迫害致死。胡锡奎同志是我党的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宣传鼓动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在冀东工作的时间虽不长，但在组织领导冀东抗日大暴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的。

我和胡锡奎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九年初，那时我刚到顺直省委工作，胡锡奎同志也在省委工作。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河北省委为发动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建设冀热边抗日根据地，先后派我和胡锡奎同志到冀东工作。开始，他担任京东特委书记，我担任冀热边特委书记。按原订计划，首先在冀热边地区（长城内外）发动游击战争，京东特委所辖平原地区负责动员人力物力，支援我们。这样，我们来到冀东后，就紧密配合，分头工作。胡锡奎同志虽然是南方人，又是初到北方农村，但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毅力，克服了生活、语言和环境等方面的困难，很快就适应了，并且同本地的党员干部、抗日群众打成一片，经过努力，工作有了起色。

一九三七年秋后，北方局派来两个红军干部到冀东来，一个是李润民同志（红四方面军的团政委），一个是孔庆同（红四方面军营长）。他们来冀东后，李润民在胡锡奎同志那里，在路南滦县一带负责训练游击队干部；孔庆同同志分配在冀热边，负责训练游击队干部。这两个同志到冀东后，工作热情很高，和本地同志配合得也很好。

为举行抗日暴动、组织武装部队，我们分别举办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胡锡奎、李润民他们是在滦县大门庄办的，参加的学

员有张鹤鸣、张振宇等，锡奎同志亲自讲课。他结合形势，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冀东所处的环境和今后的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方法等等，使受训的同志心里透亮了，信心也足了。冀热边的训练班是在丰润县腰带山办的，由苏林燕、孔庆同负责，参加的学员有阎锡九、何文全等人。通过举办训练班，我们播下了武装革命的火种，为大暴动准备了干部。

一九三八年五月，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主要是开滦五矿三万多工人举行同盟大罢工，乐亭县三千多雇农进行长活价的斗争和全区各地游击小组运动的普遍开展，造成了一种群众斗争蓬勃兴起的大好局面。这时，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早已进驻晋察冀，在聂荣臻同志的领导下建立了晋察冀军区。军区建立后，积极推动、领导各地的武装斗争。当时，冀中人民在吕正操、程子华同志的领导下，抗日的武装斗争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因此，无论外部条件，还是内部条件，对冀东举行起义都是十分有利的。于是，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决定，在冀东全区发动人民抗日大暴动。为了统一对起义的领导，一九三八年五月，决定将京东特委与冀热边特委合并，由胡锡奎任冀热边特委书记兼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由我专任抗日联军司令员。

这年的六月下旬，由我主持召开了有同盟者洪麟阁、杨十三等参加的田家湾子军事会议，决定于七月十六日举行抗日大暴动（以后因八路军已到冀热边境，起义日期提前），迎接八路军东进抗日。开始，特委和司令部都设在迁西西庄村。记得胡锡奎同志不顾劳累，连夜起草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布告，布告由我们两个人签名（胡锡奎当时化名王瑞清）。在那一段紧张而又兴奋的工作中，锡奎同志眼里布满了血丝，由于整宿整宿不休息，他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还坚持安排工作，鼓动士气，使每个见到他的人都很感动。一九三八年七月六、七、九三天，全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当时参加暴动的工人、农民有二十多万人

（有许多是全家一起参加的），共成立了三十九个总队。开滦五矿暴动工人有七千多人，组成了工人抗日救国总队。国民党人也乘机在宁河、宝坻、武清一带成立了“忠义救国军”第七路军、第九路军。这样，冀东二十多万暴动群众就组成了全副武装的抗日部队十万多人。我和胡锡奎领导的部队，主要负责人都是中共党员或基本群众。从建军那天起，胡锡奎同志就为部队的政治机关配备干部，迅速开展工作，调了一批老党员如杨文汉、陈荻与卞振东同志担任组织科长、宣传科长、民运科长。他一再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想方设法抓紧部队的思想教育和纪律检查。暴动时，冀东共有九百名党员，除个别人外，几乎全都动员起来参加了暴动。几百名党员在几万人的大部队中虽不算多，但他们却发挥了了不起的核心领导作用，使我军纪律较为严明，战斗力也较强，一开始就打了几个漂亮仗，所以，部队的士气很高。这些，都是与胡锡奎同志的政治工作分不开的。

胡锡奎同志一生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在冀东的时间虽不长，但他的贡献却是很大的，他表现出来的积极负责、艰苦朴素、勤恳工作、任劳任怨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一九三八年以前就在一起工作的战友，还有周文彬、苏林燕、丁振军、孔庆同等烈士，他们都是我们队伍中极好的同志。今天，回忆起他们，心情是沉痛的。因为，我们解放了三十年的祖国还落后，用财力、生命支持和保护了我们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不高，烈士们“让祖国富强、让人民康乐，让社会主义的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的遗愿还没有实现。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拼命工作，努力在短期内把烈士们的遗愿化为现实，要不然，就不配作他们的战友！

（星城　整理）

抗日志士杨十三

连以农

杨先生原名彦仑，又名裕民，他在叔伯弟兄间排行是第十三，故名杨十三。提起杨先生的名字，我想起一段有趣的事：一八八九年杨先生出生在河北省迁安县杨团堡村，长大后在天津上学，毕业于河北省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为了深造他又赴美留学，靠给饭店洗碗等维持生活。据说因为耶稣的第十三个徒弟背叛了耶稣，所以一些美国人最忌讳十三。杨先生到美国后，偏用十三作名，美国人让他改名，他坚决不改。杨先生的为人就是这样，他耿直、有气节，民族自尊心极强，他经常念念不忘的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我认识杨先生是在一九二八年，那时他已是河北工业学院（原河北省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的教授了。因为他性情豁达，精明强干，院长非常喜欢他，委他为斋务科主任，管理学生们的生活。我当时还在法政工读学校读书，在新思想的影响下，我和洪麟阁等同学组织了千字课班，业余教工人识字。后来我们又义务协助医生给地毯工人看病，坚持天天为他们上药，以期治好他们的职业病（眼病）。杨先生知道这些事后，说我们够朋友，并聘请我和洪麟阁做工业学院斋务科的科员。从此我便跟随在杨先生左右，一直到他病故。

杨先生早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周恩来等创办的觉悟社。记得杨先生曾津津有味地讲起他和周恩来等同学同台演戏、热情宣传新思想的情景。在他从美国回来时，还带同一位不堪忍

受洋人压迫的华侨，并安排那个华侨在自己的老家落户。杨先生同情和帮助穷苦人的事例是很多的。在到他身边工作以后，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颇深。在旧中国，学校是为阔人子弟开的，学生上学要交很高的馐费。平民百姓的子女即使考上大学，由于交不起馐费，也还得退学。杨先生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就积极操办了一个简易食堂，让学生们自己动手，利用课余时间轮流做饭。这样不仅节约了资金还锻炼了学生，使馐费降到原来的一半。这件事深受家长和学生们的欢迎。

杨先生在工业学院里是有名的"话匣子"，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既联系实际，又生动有趣，我们都爱听他讲话。他对学生的教育也很认真，常说："大家都要在学校里养成勤劳俭朴的习惯。搞理工的不能怕艰苦。譬如学机械的，到工厂去不能怕油泥，不能怕冷，修火车要钻到车底下去，认真检查，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对生活困难的学生，他还常常解囊相助。因此，学生们都很拥戴他，各系的主任、教员也都敬重他，爱和他攀谈。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亡，杨先生激于爱国义愤，奔走呼号。他经常感慨地说："大丈夫宁死疆场之上，也不辗转床褥之死！"所以在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爆发后，他动员群众，声援在喜峰口对日作战的二十九军。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以后，又实现了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第一线。杨先生当时非常留心观察国共两党的举动，并且很快就得出了结论。有一天，他用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个"八"字，对我们说："我们要和这个（指八路军）联手。"又手心向下，用手指围成个"口"字（即"国"字），说："不能和他们（指国民党）联手。"他认为国民党靠不住，要抗日救国就得跟共产党走。所以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他让我回深县老家看一看，想去投奔八路军。正赶那年发大水，不通车，我在老家一直住到十月才得以返津，那时杨先生已经加入"华北各界人

民武装自卫会”了。记得李楚离、王仲华、朱其文、舒同、洪麟阁、高志远等都参加了自卫会。他们在一起开玩笑，用梁山泊聚义英雄的名字互赠外号，杨先生号“寨主”，朱其文号“花蝴蝶”……他们经常活动的地点是在法租界新华楼，有时在基台大楼开会。从那时起，杨先生和共产党的来往越来越密切。他除和“自卫会”的党员同志有来往，还和其他地下党的同志接头。有一个叫戴复华的女党员，到天津治病，在他家住了两年半。后来，李钟奇同志生病去天津治疗，也秘密住在他家。

一九三八年，共产党计划在冀东搞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暴动。“自卫会”积极支持这一主张，要洪麟阁、高志远等也去组织暴动武装。洪麟阁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担任过军法处长，他在冀东的熟人又多，所以，杨先生让他先去组织。到三月间，杨先生才携女儿杨效昭来到遵化，住在地北头村洪麟阁的家中。为了遮人耳目，他们自称是抽大烟的，来乡下避难。洪麟阁还弄来烟枪什么的摆在桌上。我负责联络工作，经常奔走于天津、唐山、遵化之间。在唐山有个叫马溪山的先生，他是唐山商会的负责人，还兼任唐山工商日报的理事长。洪麟阁与其交厚，曾在其报任总编，洪麟阁起事，马溪山积极支持，帮助买武器弹药。我过来过去也总住在他那里。具体帮助洪麟阁的还有共产党员李楚离同志。冀东总暴动订于三八年的七月十六日举行。在暴动前李楚离、洪麟阁和杨先生经常研究战局和社会上的动向。六月，敌人突然把洪麟阁的家抄了，起义的消息暴露了。于是我们立即动手，于七月初提前起义。起义队伍编成一个总队，下设三个大队，一个机枪连，洪麟阁任司令员。杨先生任政治部主任。在兄弟部队的支援下我们曾打下玉田县城，丰润县城我们也进去了，但很快又退了出来。当八路军宋邓纵队到达冀东后，杨先生曾诚恳要求八路军派干部来加强起义队伍的领导，没有干部派战士来也行，因为农民刚刚拿起武器，不会打仗，也不大懂纪律，所以

迫切需要军事骨干，遗憾的是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抽不出多少人来。

在"抗联"部队西撤时，我们截了日寇的五辆给养车，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打下给养车，李楚离同志提出立即转移，洪麟阁不同意，他说："队伍不少，不怕。"第二天，敌人来了，在猛烈炮火的进攻下，未经训练的队伍被打散了，洪麟阁也战死沙场，为国捐躯了。

我和杨先生听到洪阵亡的消息，将信将疑，杨先生让我去看一看。当时军队乱了，我一面给大家作揖一面说："司令待弟兄们不错，他今日遇难我们焉能不管？还有累大家去走一遭。"我请一个大队长带队，随我到出事地点。终于在一条河沟边找到洪司令的尸体。他身上有九处重伤。我含着泪，动员群众弄来一口棺材，把自己的这位老同学埋在一座庙里。

队伍被打散了，向西撤的路被切断。杨先生、马溪山和我共二十几个人，奉命从另外一条路线去平西。余部由李楚离、杨效昭带领。由于我们迷了路，杨先生的胃病又犯了，只好暂回天津。经过这次挫折，杨先生并未灰心，他一面在家养病，一面叫我们四出打听消息。过了一个多月，李楚离和杨效昭也回到天津，他俩在杨先生的主持下结了婚。十一月，杨先生和其他几个同志来到我的老家深县白家村，想让冀中八路军帮助去平西。听说吕正操同志就住在离我们村不远的张骞寺，杨先生让我去找，但没有找到。他又叫侄子杨介仁去找杨秀峰。杨秀峰也是先生的侄子，他当时领导冀西抗日游击队。和杨秀峰同志联系上后，我们就到了冀西，准备从冀西去平西斋堂村。朱总司令知道杨十三在冀西，便电召他去八路军总部。同去的还有马溪山、冯于九、杨效昭和我。我们到了"前总"，住在招待所里。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很快就接见了杨十三并同他亲切交谈。杨先生在谈到冀东抗日暴动遭受严重挫折和谈到群众对"抗联"的大力支持时，竟激

动得哭了。他当时表示，要回平西，以便重返冀东，东山再起。朱总、彭总安慰了杨先生，对冀东暴动和杨先生的义举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彭总还讲到：部队发展很快，统一战线搞得很好，受一次挫折没有什么，吃一堑长一智。

在招待所住下以后，我和冯于九同志留在杨先生身边，马溪山、杨效昭等进“抗大”学习。一九三九年夏天，敌人分九路围攻八路军，我们也经常随军转移，不料杨先生的胃病复发，而且比历次都重。我们用担架抬着他，风餐露宿，来回蹚漳河。这样，杨先生的病日益加重。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在敌情紧急之时，还来看望杨先生的病情。杨先生病重时还念念不忘回冀东。朱总说：不要回去了，在哪儿都是抗战。准备让杨先生搞工业部。

八路军首长的关怀，使杨先生感动至极，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外国人对我们的轻视和凌辱，我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八路军艰苦奋斗，英勇顽强，值得我们很好很好地学习。过去我们说跟着八路军走是对了。过去我们没见过，现在见到了，要很好地学习。”他还嘱咐我们几个人：“咱们是来学习的，不要让人优待，咱要和战士一样。”他虽在病中，但从不肯接受特殊照顾，这使我们深受感动。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杨先生病危，医治无效，于当日六时逝世。临终前他反复嘱咐我和冯于九：“你们两个人就跟八路军这边工作吧，也告诉上‘抗大’的那几个人，在这边好好工作。”他在临终前说的这些话我记得清清楚楚，一辈子也忘不了。

杨先生逝世后，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麓召开了追悼大会，追念他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朱总司令写了挽词，在挽词中对杨先生的一生作了最好的评价。而杨先生一生所盼望的民族复兴也已实现，杨先生可以含笑长眠了。

难忘的岁月 珍贵的友谊

张 珍

周文彬烈士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来，每当我想起他的时候，心情总是不能平静。时代的变迁，割不断我与文彬同志的珍贵友谊；岁月的流逝，磨不掉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一九二三年，我在通州潞河中学初中二年级读书时，曾听同学们说，上年级有个朝鲜族学生，名叫金成镐（周文彬同志的原名）。他的父亲因为参加朝鲜独立革命运动，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追捕，被迫逃亡到中国。他们全家入了中国国籍，住在通州（现为通县）。到了高中二年级时，文彬因病休学，病好后便插到我们班。他到班里不久，就组织了“社会主义科学学习小组”。起初，为了防止学校的干涉，他请了教“社会学”的关先生做过短期的辅导。以后，小组的组织和辅导工作都由文彬一个人负责。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如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等。

由于学习内容的新鲜和丰富，以及文彬同志引导得法，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都很高。小组的成员，最多时曾达到三十人。经过学习，大家都认识到：只有走“俄国人的道路”，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铲除军阀势力；才能解放四万万劳苦大众，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为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中国。因此，大家对北伐战争寄予很大的希望。我是这个小组热心的成员，通过学习，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立下了献身中国革命的志愿。那

时，文彬只有十九岁，但同学们都觉得他思想敏锐，懂得很多革命道理，而且谦虚谨慎，待人诚恳，所以，大家都自然而然地团结在他的周围。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文彬同志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一边，顶着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就在这一年秋季，他在学校里发展康景新、洪庆隆、张树棣、金祥镐（文彬的弟弟）和我加入共产党，并成立了党支部，由文彬任党支部书记。

党支部成立后，立即开展了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叛卖革命的罪行；第二，宣传党的革命主张；第三，开办夜校，组织全校的工人学文化，给他们讲革命的道理；第四，打击校内暗藏的国民党反动分子；第五，联合通州男师和女师两个学校的革命学生，共同斗争。

在同国民党反动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中，文彬同志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例如，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当时，北京和通州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统治下），校内一些暗藏的国民党分子阴谋篡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他们在精心策划后，抛出了一个“候选人名单”，预谋在改选执委时，控制会场，骗取选票。在投票以前，文彬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发言，揭露了这些家伙出身豪门，满身恶习，崇洋媚外，搞阴谋诡计的卑劣行径，号召同学们擦亮眼睛，决不要上这些坏人的当。文彬的揭露，激起了同学们对这些坏人的义愤。有的同学立刻站起来追问：“候选人名单里都是些什么人？”一些知情的同学干脆指名道姓地点出，某人是军阀家里的阔少爷，某人是土豪劣绅的孝子贤孙……。在一片揭露和申斥声中，那些妄想篡权的坏家伙个个面如土色，灰溜溜地逃出了会场。从这次斗争以后，同学们更加拥护文彬了；而被揭露的那些人却更加嫉恨他，总想寻衅报复。

一九二八年七月初，同学们相约在学校毕业仪式以后，到文彬家搞一次分别前的“茶话会”。这天午饭前，通州驻军突然包围了文彬的家，逮捕了文彬和正在帮助他制羊奶冰糕的康景新等几位同学，并在屋里乱搜乱翻。午后，我们三三两两地到文彬家来，却被荷枪实弹的大兵们挡在门外。同学们愤怒地质问：“为什么不让我们开‘茶话会’？”“凭什么理由随便抓人？”大兵们气势汹汹地骂道：“什么他妈的‘茶话会’，明明是共产党在金成镐家开秘密会！”“快躲开，不准看热闹！”我们再三追问捕人的原因，才知道是学校里那些嫉恨文彬的坏家伙存心报复，诬告了文彬等同学。文彬等几位同学被抓到军营里，但谁也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而且一再质问驻军：“说我们是共产党，有什么凭据？”“你们占领通州不到一个月，怎么知道学校的内部情况？”“到底是谁诬告我们？”反动军队抓不住一点把柄，又搪不住文彬等人的质问和老师、同学们的抗议，不得不释放全部被捕同学。从军营里出来以后，文彬同志对这次事件作了总结。他对我们说：“反动派靠着枪杆子就能随便抓人，我们也一定要有军权，才能保护自己，才能夺取政权！”他怀着无限向往的心情，激动地说：“现在，南方各省都在闹红军，是毛泽东等同志领导的，这就有了大希望啊！”

一九二八年秋，我考入燕京大学理学院。半年以后，文彬全家搬到燕大附近的海淀居住。大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他常到我的宿舍阅读书报，来的时候，总要带一些党内文件叫我学习，并让我给考入辅仁大学的洪庆隆、张树棣等同志送这些文件。

一九三〇年夏，因家庭困难，我不得不转到辅仁大学当了“工读生”。说是“工读生”，实际上是个清洁工，要管化学系的小图书馆和两个试验室，又要学习，又要干活，每天都要到半夜十二点以后，才能休息。有时文彬来看我，我就跟他诉苦。这时，文彬便鼓励我说：“边做工，边学习，比失业和失学都要强一

点。再说，人只有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才能学到真本领！”

就在这年冬天，有一次，他来告诉我，便衣特务经常在他家门口转，有时还闯进去找麻烦，可能党内出了叛徒，他必须离开北平。临走时，他一再嘱咐我，千万不要再去他家，免遭敌人暗算，如果将来回到北平，他会到学校找我。从那以后，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每年都到学校看我两、三次。有时为了谈话方便，我们就睡在小图书馆里的桌子上。夜深人静，同“床”共枕，真有唠不完的知心话。他兴致勃勃地跟我讲中央苏区的红色政权怎样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怎样粉碎蒋介石一次次的疯狂“围剿”；“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如何高涨，等等。他热情地鼓励我刻苦学习，积蓄革命资本，并让我利用化学试验室试制炸药、干电池和军用药品，取得经验，将来好用于革命战争。在文彬的热情鼓励下，我在一九三二年任大学助教期间，组织了“科学社”(后叫“科学生活社”)，试制了炸药、防毒面具和电台等，一方面支援了当时的革命斗争，一方面也为党培养了一批军工人才。

在这几年里，我和文彬同志的友谊更加深厚了。他每次来看我，都给我带来许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使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鼓舞。我在经济上则尽力帮助他。文彬是很耿直的。他当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但宁肯自己勒紧裤带，饿着肚皮，也不愿去增加同志们的负担。因此，每次他来时，我总要硬往他手里塞钱。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我在工读期间（工资四至六元)，每月支援他一、两元；一九三二年，我任大学助教后，每月支援他五至十元。文彬就是靠着这点钱，维持着艰苦的生活。他每次来北平，一日三餐，总是买一、两个窝窝头，在繁华喧嚷的大街上边走边吃，连一毛钱一碗的热汤面也舍不得买！

抗战期间，我在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工作。一九四二年春，文彬同志带领冀东的一些同志参加军区的会议。会后，他来看我，

老友重逢，真是亲热极了！我们把手都握疼了，还是谁也舍不得撒开。接着，文彬便要我带他去参观兵工厂。谁想到，他一“参观”就是十来天！他每到一个工厂，就深入车间，拜老工人为师，刨根问底地打听子弹、手榴弹、地雷、炮弹和烈性炸药等产品的生产过程。为了真正弄懂、学会，他还亲自动手操作。那时，我们的工厂都是三班作业，他总是打连班，从早晨一直干到深夜。我和同志们几番劝他休息，他却意味深长地说：“不加班加点不行呵，我们冀东是天津和东北三省的要冲，敌人经常‘扫荡’，我们几乎天天打仗，弹药消耗大得很哪！如果能够就地生产，就地补充，就可以更多地消灭敌人。冀东需要军火，需要自己的兵工厂，我哪里休息得下去呢?!”文彬在参观实习中，处处以小学生的面目出现，详细地了解工人同志的发明创造，学习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和高贵品质。他见到边区工人用土设备、土机器制造出那么多军火，十分激动。他说：“我在这里上了一次工人政治大学，真是一生中难得的学习机会呵！在敌后这么困难的条件下，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能造出大批军火，这是我们党的奇迹，是工人阶级的奇迹！”

文彬同志当时是冀东区东部地委书记，在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参观过程中，我曾要求他给工人们讲讲话。他十分诚恳地说：“我有什么可讲的呢！工人同志们才是伟大的，他们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创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人。我只有老老实实地做他们的小学生才对呀！”通过参观学习，文彬对抗战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更加坚定了信心。他说：“人民是无敌的！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去做，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有了斯大林和毛主席的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一定会得到解放，德、意、日法西斯灭亡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文彬回到冀东以后，我听说他立即着手抓军工生产，制造出不少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弹药。后来，根据他的请示，聂荣臻同志

指示晋察冀工业部派黄锡川等十几个同志组成一个小组到冀东，帮助搞起了军工厂，实现了文彬同志的夙愿。

一九四四年冬，刘仁同志把文彬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告诉了我。我痛哭失声，心如刀绞！那熟悉的面庞依然在我眼前闪现，那亲切的话语依然在我耳边回响，文彬呵，你的心脏难道真的停止了跳动？你没能看到抗日战争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你没能看到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你谦虚谨慎、朝气蓬勃、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将万古流芳！

（圣洁　书明　整理）

国际主义战士周文彬

金信正　李春光

周文彬同志原名金成镐，一九〇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出生在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红南洞。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朝鲜后，他父亲金基昌因参加朝鲜的独立解放运动而被追捕，于一九一四年逃亡来到中国，在北京通县侨居，以养鸡、养奶羊、种葡萄等维持生活。后来，全家都迁来，加入了中国国籍。

周文彬同志是在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长大的，家庭和学校都给了他很好的影响，所以在他上小学时，民族自尊心就很强了。那时，整个朝鲜半岛都在日寇的铁蹄蹂躏之下。日寇为了长期霸占朝鲜，除扶植伪政权外，还对朝鲜人民进行奴化教育。他们开办了学校，强迫学生到他们办的学校里去上学，所以，原来新义州公立小学的学生越来越少。在周文彬他们学校里，只剩下他和二哥金永镐两个人了。老师含着眼泪为他俩上课，讲朝鲜三千里大好河山……那时，周文彬才八、九岁。一天，日本人趾高气扬地来接管这座学校。周文彬跑到门口，伸开胳膊叉开腿，堵住门口，截住日本鬼子，不让进。这个举动虽然是幼稚的，但却轰动了整个新义州。

在中国，周文彬从一九一六年起在通县潞河小学和潞河中学读书。潞河学校是教会办的，外国人在这里掌管一切。有一次，一个美国人在学校里搞了一个摄影展览，其中有不少照片是侮辱朝鲜的。周文彬看到后，非常气愤，便约二哥金永镐一起行动：他们等到中午，人们都去吃饭了，就用棍子把所有侮辱朝鲜的照片

一张一张都捅坏了。晚上，他俩回到家里，妹妹金信正问他们中午为什么不回家吃饭。他俩怒气未消，大骂那些歧视朝鲜的外国人，向小妹妹讲了中午做的事，还解释了这件事的意义。

周文彬同志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民族，尽管他很小就背井离乡，来到中国，但从未忘怀自己的民族。所以，他坚持自学朝语，在家里数他的朝语最好。正因为他从小是个爱国主义者，所以在中朝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他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周文彬毅然投身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并由二哥金永镐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潞河中学，周文彬曾在班上组织了"社会主义科学学习小组"，经常学习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对世界革命的影响等等。

一九二七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残酷镇压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下，周文彬不顾个人安危，继续进行革命活动。这一年的秋天，他先后发展康景新、张学渊（张珍）、洪庆隆、张树棣、金祥镐（周文彬的弟弟）等几位同学入党，他任支部书记兼党小组长。学生党支部成立以后，立即进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办工人夜校等方面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当地驻军把周文彬、康景新抓走了。在军营里，周文彬与敌人斗争坚决，经过一周左右的斗争，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声援下，驻军只好把周文彬他们放了出来。

周文彬出来后，对大家说："国民党反动派凭着他们有军权，就可以随意逮捕好人。我们也得有军权，然后夺取政权！目前，南方各省正在组织工农红军，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这就有了希望……"

从潞河中学毕业以后，周文彬开始专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去辽宁抚顺煤矿工作）。一九三六年，他奉命来到冀东，在开

滦煤矿搞工人运动，任唐山市工委书记。一九三八年，他领导了煤矿工人罢工和武装暴动。暴动胜利后，他与节振国一起率领由矿工组成的冀东抗日联军特务大队，同日伪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一九三九年，周文彬担任冀东东部地委书记。一九四三年担任冀热边区特委组织部长，直至牺牲。

许多接触过周文彬的同志都知道：他艰苦朴素、虚心好学、关心群众，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并为之努力奋斗。确实，周文彬同志从来都把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当成自己份内的事。他常说："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都是生死相关、血肉相连的一家人，任何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死对头。"他多次引导身边的人，要他们顾全大局，严格要求自己，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周文彬同志自己首先模范地实践了这些话。

当年，冀东的斗争环境是极其恶劣的。为了坚持抗日，周文彬总是带头艰苦奋斗。他经常把发给自己的衣服让给别人，自己却穿补丁罗补丁的衣服。春夏秋三季，他穿的是很短的上衣，冬天穿一身较肥大的黑粗布中式棉衣。他的木盒枪套和黑绒布子弹袋都掩在棉袄里。头上戴一顶破旧的黑礼帽，脚上经常穿一双黑布圆口便鞋，袜子破得不象样子，看上去象个穷苦工人。

有一回，警卫员和周文彬一起住进一户老乡家，警卫员穿得较整齐，进门后就去收拾房间，周文彬进门后坐在一块石头上，垫着木制的手枪盒批阅文件。房东大爷看到后感到奇怪，就同邻居讲："你瞧，首长穿得干净整齐，他的警卫员却这么邋遢，真配不上。"一听这话，邻居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一面笑，一面说："大哥，你老的眼睛不灵，正好看拧了。在外边坐着的那个才是大首长，听说咱们这边的干部都归他管呢！"房东大爷听罢，感动得不得了。他逢人便讲："八路军的干部，越大越不象'官'，真叫好哇！"

周文彬虚心好学的事也是人所共知的。在校读书时就不用说

了，就是当了冀热边区党委组织部长以后，他的学习精神也是为众口称赞的。

一九四二年，他向晋察冀中央局报告工作期间，曾到晋察冀军区工业部直属工厂参观学习十来天，由张珍同志陪他。下厂后，他谢绝工厂的照顾，坚持自己到伙房打饭，坚持同工人一起劳动，每天一干就干到夜间十二点以后。他说："冀东区地处天津和东北三省的要冲，是敌我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日伪经常扫荡，几乎天天打仗，弹药消耗很大。如果能就地生产，就地补充，就能更多地消灭敌人！"因此，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军工技术，特别是对制造无烟火药、烈性炸药、子弹、手榴弹、地雷、炮弹等，兴趣更浓。在学习过程中，他不懂就问，不怕劳累，亲自操作，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技术都学到手，好带回冀东去。

回冀东后，周文彬立即着手抓军工生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经常带着警卫员试制武器。他把火柴碾成粉面，用水调成浆糊状，然后一点一点地涂在钨丝上（把手电泡打碎，取用里面的钨丝），晾干，再焊接上细铜丝，制成引爆装置，造出电发火地雷，用来炸敌人的火车和部队，曾发挥了很大的威力。另外，他还亲自制造掷弹筒。他造的掷弹筒比日本的掷弹筒射程远，命中率高，很受欢迎。所有这些，都是他虚心学习、刻苦钻研的结果。

讲到平易近人，关心群众，周文彬同志的感人事迹就更多了。

孔宪捷同志刚给他当警卫员时，非常喜欢枪，总想得到一支好枪。周文彬就象知道大孔的心事似的，很快就调来一支意大利造的手枪。这种枪比三号德国手枪小点，威力差不多。枪调来后，周文彬郑重地发给大孔，并耐心地教给他顶子弹、退子弹、瞄准、射击等。因为枪没有套，没法背，周文彬就叫姚品一买了块黑土布，找了块纳鞋底用的布夹子，然后蹲在炕上，精心为大

孔做了个枪套，还缝上了布背带。当他看到大孔背上枪，蹦蹦跳跳跑出去的时候，满意地笑了。

首长关怀战士，战士更热爱首长。一天，大孔和小刘在一起议论起首长来。大孔说："周部长光知道关心别人，对自己的身体总也不知道在意，你看他这阵子瘦成什么样子了！"

"是呀！"小刘满怀同感地说，"又是检查减租减息工作，又是动员参军、写材料、批文件，只要他一拿起笔来，非干到天亮不可，他已经三天没怎么睡觉了。白天还得行军，怎么受得了呢？瘦得颧骨都突出来了！"

"咱们给他补充补充营养吧。"

"那不是'不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啦？他准炸了箦儿！"

"咱不会随机应变……"大孔伏在小刘的耳边嘀咕着，小刘听着连连点头。

晚上，小刘问大孔："咱们给周部长炒的鸡蛋送上去了吗？"

"送上去了。"

"他没说啥？"

"我悄悄走进门，他正在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抽烟。我说：'部长，吃饭吧。'他'嗯'了一声，还是聚精会神地看地图。我趁机把炒的鸡蛋和饭放在他跟前，心想，趁他不注意，吃了就中了。谁知我刚要往外溜，就听他叫了声：'大孔！'……"

"他看出问题来了吧？"

"没有，部长说：'快叫小刘来吃饭！'这不，我就来找你了。现在他八成已经吃上鸡蛋了。怎么样？我这个见机行事不错吧？"

"嘿，你真行！"小刘拍了大孔一巴掌，两人就高高兴兴回屋吃饭去了。

一进屋，两人都愣了。原来桌上摆着两碗热腾腾的小米干饭，每碗干饭上都放着一小堆焦黄的鸡蛋。房东的小胖坐在炕头

上抱着一碗饭，上面也有一小堆鸡蛋。桌上还有一张条子。大孔抓起来，大声念道："鸡蛋分成四份吃了，以后不准再给我炒鸡蛋，别忘了明天给老乡留下用油的钱。"

大孔和小刘伸着舌头互相看了一眼，又看了看小胖，会心地笑了起来……

周文彬同志在生活上不搞特殊，但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他的这一高贵品质，在著名的杨家铺突围战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冀热边区特委机关进驻丰润县张庄子。那天敌情十分紧张，同志们把文件收拾好，随时准备转移。有些同志在街上匆匆忙忙地走着，互相打问确实的情况；也有的走到周文彬的房间去，再走出来，焦虑不安地等待着命令。周文彬却稳如泰山，盘腿坐在炕上，嘴里叼着他那个"不熄灭"的大烟斗，两眼注视着窗外。

派出去的侦察员陆续回来了。他们每人手里都提着两把盒子枪，脸上带着汗和尘土。他们跑进院子，喊声："报告！"就急速跨进周文彬同志的办公室。

"怎么样？"

"北面十五里的铁厂有二百鬼子，早晨来的，下午没走，大概要住下；东面杨店子增加了五百敌人；南面丰润城也增加了五、六百，上午到城北杨家营，下午又回城了；榛子镇的敌人也有增加，数目不清。"

周文彬听了，凝神思索着，把烟灰磕在手心儿里，再倒在地上。然后，又随手装满一锅碎烟末，点着火，抽一口，吐一股青烟。……沉默了一会儿，他招呼冀东区党委宣传部长吕光、秘书长李杉，共同商量对策。

按当时的情况，西渡还乡河，或从铁厂以东插到敌人背后较为安全。但大家考虑到，丰润、滦县、迁安的干部都集中在这里

开会，而会议即将结束，不便中止远去。所以，决定尽快开完，把任务布置下去，然后化整为零，分散转移。于是，周文彬同志决定："立即集合到南边的李庄子去。"

太阳下山了，天色暗了下来，队伍很快就集合好了。前面是二连的战士，尖兵们把刺刀也上好了。后面是干部和偶然碰到一起的卫生处的同志们，约四百多人。经过简单动员，队伍就出发了。

晚上十点钟左右，他们住在李庄子。可巧，十七地委书记丁振军同志，率领一区队第四连住在紧挨着李庄子的下庄子，南面三十里就是丰润县城。

第二天拂晓，浓雾笼罩山野，白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二连战士从街心下操回来，正沿着街道跑步。突然，"哒哒，哒哒……"，西面一阵枪响，原来是敌人趁浓雾接近了李庄子，正向我哨兵射击。村子里的战士们向街西冲去，激烈的枪声顿时响作一团。

周文彬同志听见枪声，立即派出特务员去侦察情况。不一会儿，特务员回来报告：西面已经与敌人接触，东面、南面、北面平静无事。周文彬同志在地下走动着，看到走进来的丁振军同志，就站住了，望着他。丁振军同志也很沉着，他说："老周，传命令集合吧！"

周文彬点了点头，果断地命令特务员："通知二连，扼守阵地，掩护机关干部转移到杨家铺去，一小时之内，不许敌人前进一步；一区队四连占据北山，给敌人来一个侧击。"特务员打了个敬礼，转身跑了出去。

"通讯员！"

"有！"原来通讯员和许多同志都在门口等待命令。

"通知各单位集合，马上转移到杨家铺！"

不到五分钟，干部和勤杂人员就集合在一起，向杨家铺出发了。村西的枪声越来越激烈，子弹尖叫着，"嗖嗖"地从人们的头

上飞过。

杨家铺在李庄子北三里。连长刘景余同志听到枪声，立即在杨家铺周围布置了警戒，他自己火速赶到西部前线，指挥作战。

队伍赶到杨家铺，周文彬同志站在一块大石头旁边，他那高大而魁梧的身体，沉着而坚定的目光，给每个人带来了信心和力量。他望着西南方向，听着枪声，判断着情况的变化。机关人员散坐在山坡下，眼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周文彬的身上。

“大家到北山上去，在山坳里隐蔽，不要慌。只是一面敌人，我们一定能胜利。”周文彬同志沉着镇定的情绪，感染着大家，大家都按照他的命令上了山。山的阴坡有一个坳处，长着几架葡萄，葡萄架下，坐满了人。

吕光同志是云南人，个子比较矮。他站在山石上，望着战火纷飞的西南，又看着沉寂的山下。周文彬和丁振军在山下研究着敌情和作战部署。马伕找不到周文彬，拉着马在山上走来走去，非常焦急。不一会儿，周文彬走上山来，一个同志给他让出一块平滑的石板。他没有坐，望着四周。这时，云雾退去，红日东升，西南方向传来“砰、砰……”的枪声，间或有几声手榴弹爆炸的巨响。

一个通讯员跑来，由于突然停下来，站立不稳。周文彬扶住他，听他一边喘气，一边报告：“敌人太多了，一区队四连三面受敌，打算撤到前面这个山头。”周文彬点了点头说：“可是，在干部们没有撤走之前，第二个山头无论如何要坚持住！”随后，他让大伙向北转移，但刚走不远，北面也隐约发现了敌人，所以，又都折回原处。

不一会儿，东面也传来稀疏的枪声。

丁振军同志大声命令一个班长说：“带上你的一班人，跟我来，上马头山！”跑上山，他叫战士们卧倒，他却不顾个人安危，站在高处，手持望远镜，观察敌人的行动。

情况越来越紧张，四面都发现了敌人，估计在五千人以上。枪声从一面扩大到四面，子弹象飞蝗一样从头顶掠过。

周文彬根据敌情的变化，改变了向北突围的想法。他发出命令："向南冲！北面地势不好，南面的干河沟可以隐蔽一些，从来路的山口冲出去！"他还派通讯员去联络丁振军同志。

不大一会儿，通讯员气喘嘘嘘地跑回来，沉痛地说："丁振军同志，牺牲了！"

这个意外的消息，象晴天一声霹雳。

周文彬同志忍住悲痛，坚定地说："同志们，为了复仇，为了胜利，向南冲！"

大家冲下去了，进入了一条又浅又宽的干河沟。沟里满是鹅卵石，走起来一跌一滑。吕光和他的爱人俞芬同志中弹牺牲了，其他的同志有的倒下了，鲜血染红了鹅卵石。

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战士们面对超过自己几十倍的敌人，沉着应战。他们为了保卫首长，掩护干部突围，坚持在田头和田垄里杀伤敌人。

周文彬同志见情况十分危急，命令立即烧掉文件。他坚定地号召大家："同志们，我们要打到最后一颗子弹！我们一定要冲出去！"

"响应周文彬同志的号召！"

"坚决打到最后一颗子弹！"

二百多人一齐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

周文彬从牺牲的战士手中拿过一支三八枪，用那燃烧着复仇火焰的眼睛，瞄准敌人射击，掩护同志们突围。李涛同志也在不远的地方端枪射击。

"李涛，你打东面，我打北面！"周文彬同志一边说一边把子弹推上膛，"砰！"一个鬼子应声倒下去了。"砰！"又一个倒下去了。周文彬决心多杀伤敌人，好保护同志们脱险。但就在他打得起劲

时，敌人的一颗子弹打进周文彬同志的头部。

“周文彬同志，周……”

李涛大声喊着，但没有回声。他抬起头，看见周文彬同志满身是血，头枕在一个战士的怀里，那个战士已经泣不成声了……朝鲜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的好干部周文彬同志，就这样壮烈牺牲了。

周文彬、丁振军、吕光、李杉还有冀东军区卫生部长兼政委王少奇等领导干部虽然牺牲了，但是，在他们的带动和掩护下，许多同志冲出了重围，并打死了不少敌人。傍晚，当冲出去的同志们在迁西马蹄峪集合时，一个个含着泪悼念壮烈牺牲的首长和战友，“报仇！”“报仇！”的呼喊声响成一片。不久，他们就和兄弟部队一起，在离杨家铺不远的地方，包围了血洗杨家铺的日寇独立第八旅团，并一举歼敌三百多名。报告传来，群情振奋。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中权同志，立即在报告上面写下“为烈士复仇，给日寇独八旅团以严惩”的标题。便将报告登在报纸上了。

周文彬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对党对人民忠贞不渝、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体贴入微的崇高品德和他那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国际主义精神，形同日月，光照千古。

国际主义战士——周文彬同志永垂不朽！

（星城　书明　整理）

永生的战士

李一夫

丰润县北部有一座腰带山，山并不高，从山脚走到山顶，不过十里左右。相传唐太宗李世民东征时，曾勒马山巅，南望大海。这一下不得了，讲风水迷信的人就称这山为“来龙之祖”。苏林燕同志的家乡——苏庄，就在这“来龙之祖”的背后。

林燕原名连庚，号麟彦。他的家，我去过多次，仅三间平房，锅台连着炕，家境并不富裕。我与林燕一九二五年至二八年在县师范讲习所同学。那年头，有钱人是上中学或大学；家境较贫寒的，才上管饭不要学费的师范学校，为的是以后当个小学教员，混碗饭吃。

林燕在师范讲习所学习，颇为引人注目。这倒不是因为他功课特别好，而是因为他粗壮有力，年龄还不到二十岁，就长得活象个中年农民。他似乎练过武术，可以两手撑地，两脚朝天，在校院中转上几圈，又能不费劲儿地举起一、二百斤的大石头，在空中舞弄，是同学中的“大力士”。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两只大大的眼睛，总是露着憨厚的微笑，说起话来，声音不高，不紧不慢的。在与同学相处中，他从不尖酸、刻薄，也从没耍过脾气，是学校里出名的老实人，所以，同学们都喜欢他。

我与林燕同窗三年，互相都比较了解，这就成为我们一起走上革命道路的社会因素之一。

一九二八年，讲习所的同学毕业后，都当了小学教员。我记得林燕是在胡各庄小学任教。在丰润当“孩子王”是不容易的，

每月只有十二、三元的微薄收入，所在村的封建校董和县教育局的视学委员，是主宰教员命运的上司，哪一面巴结不到，都可能砸了饭碗。因此，我们都感到生活动荡不安，前途渺茫。“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致使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进而侵入华北。一九三三年春，喜峰口、滦河一役之后，日寇进驻唐山。冀东各县都出现了半国民党半伪政权的县政府（全部变成汉奸政府，则是一九三五年国民党县党部撤出，殷汝耕“防共自治”之后）。阶级的压迫，日寇的蹂躏，象磐石一样压在冀东人民的心上。贫苦的小知识分子，思想上起了急剧的变化，抗日救国成了普遍的要求。

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党的领导。丰润原来没有独立的县委，是在以玉田为中心的丰、玉、遵中心县委统一领导下进行活动的。一九三〇年立三路线统治时期，丰润县围城暴动失败，县内党的组织随之垮掉了。一九三三年初，李颉伯同志由北平回丰润重新建党，我是他发展的第一个党员。那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党组织。上半年，只发展了四个党员。下半年，只发展彭来一人入党。这以后，党组织迅速地扩大，党员发展到数十人。其中有许多人是同学中的盟兄弟，平时以义气相尚、任侠自负，而且忠实可靠，不至于因被捕而出卖同志。我开玩笑，名之曰“三十六友”。林燕就是在这时候经我和彭来介绍入党的。记得我们介绍他入党前后，他几次对我说过，他最早是从迁安的一个党员那里受到党的影响的，从那时起，他就接受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渴望参加革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三四年上半年，丰润县委正式成立，我任县委书记。从这一年起，丰润县党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农民斗争。因为小学教员分处农村，可以利用与学生家长接触和办农民夜校的机会影响农民，所以，我们首先组织“小学教员联合会”，打算由教联逐步过渡到农民工作上去。丰润县共有六个区，北东区负责教联活动的是彭

来、杨立三和林燕。由于各区党员的积极活动，教联的发展很迅速。全县三百多所小学、九百六十个教职员中，加入教联的就有二百六十八人，而以彭、杨、苏负责的北东区为最好。林燕是北半部的"台柱子"，他在那里群众威望很高，相当多的教联成员是他发展的。教联属于赤色职工会的系统，活动方式是分散的、隐蔽的（今天看来，群众组织应采取公开、合法的活动方式，才更容易接近大多数群众；赤色、隐蔽，客观上成为狭小的"关门主义"），和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挂钩。

在发展教联的同时，县委在玉田鸦鸿桥一带组织了拥有一千二百余人的、装备齐整的抗日自卫武装，在与汉奸石友三部下米春霖师交战中，三战三捷。我们将情况报告省委后，省委派来一位代表。我原打算向他汇报发展教联并由教联过渡到农民协会的想法，但这位代表却说："有这么多力量，为什么不斗争？"并以"在斗争中求巩固、求发展"为名，订出计划，交给彭来，让他领导教员罢教。然后，拉着我去玉田，准备联合遵化的二百多人举行武装起义。

三五年一月十一日，在彭来、林燕、徐志等人领导下，罢教正式开始。小学教员一涌进城，包围了教育局，提出了复教的七个条件。前六条都是有关福利待遇方面的，第七条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样一来，惊动了伪县政府。他们派出全县的团警，分头把守各路口，见到教员模样的便抓起来。由于敌人的疯狂镇压，这次罢教斗争失败了。教联受到沉重打击，七名同志被捕。林燕因事先有警觉，没被敌人抓走。

事后，伪政府把参加罢教的骨干分子分别调开，以防他们继续联系。我记得林燕被调到爽坨镇小学。不久，他又与我取得了联系。

这一年，我被调到省委受训，结束后，被任命为全国总工会驻唐山市特派员，领导市工联。三五年四月，彭来接任县委书

记，杨志三任组织部长，徐志任宣传部长，林燕任农运委员。因为京东特委遭到破坏，我直接与省委发生关系，丰润县委通过我与省委联系。

三六年一月，丰润县委改组。由于林燕在斗争中最积极、最勇敢、最坚定，所以，被任命为县委书记。新县委成立后，工作上很快有了起色。原来基础较好的北半部，工作搞得更有生气。在苏庄周围，形势发展得很不错。我们有一批党员，打入民团内部，掌握了一部分枪杆子。在南半部，斗争环境很艰苦。林燕一面在民团中找穷苦出身的团丁发展党员，一面搞起以党员为骨干的游击小组。高小安（十七岁）是发展的第一个游击小组组长。这些游击小组是在县委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的，比起我党在民团中掌握的武装力量来，具有独立、集中、稳定、灵活、战斗力强等特点。游击小组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对打开南部抗战的局面，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以后冀东的抗日武装暴动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活动越搞越大，经费发生了严重困难。原来，在我们毕业同学中，算我工资最高（每月三十元），所以党的活动经费主要由我负担。我脱产到市工联后，工资收入没有了。这时，林燕便勒紧裤带，开始为党的活动提供经费。一次，我对林燕提起，经费实在紧张，连出门的路费都没有了。林燕略微沉思了一下，然后坚决地说："不怕，我卖地！家里有二十亩地，先卖它十亩再说！"我一怔，马上劝他："可以先想别的办法嘛！地是根本，怎么能轻易卖掉呢？"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而庄重，斩钉截铁地说："不能让这几个钱把党的手脚捆住！什么是'根本'？革命才是根本！为革命，我连脑袋都不打算要了，还在乎这几亩地？卖！"

一九三六年五月，经李葆华同志提议，我参加了冀热边特委。李运昌同志任特委书记，王大中同志任宣传部长，我任组织部长。特委在滦县榛子镇大中同志的学校里开了一次会，谈到丰

润县范围太大（长二百二十里，宽七十余里），不便于领导。于是决定将丰润县划开，滦县一部、丰南一部、加上丰润一部，成立丰滦边委，由林燕任边委书记，丰润县委书记由冯义民同志接任。

按特委分工，运昌同志侧重抓昌黎、乐亭、抚宁一带；大中同志侧重抓滦县；丰润县和丰滦边区主要由我负责。从这时起，冀东党组织的工作路线对头，策略也好，党组织和群众抗日组织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为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积蓄了力量，准备了组织基础。

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日伪心惊胆战。他们派出大批特务，千方百计地搜集我们的活动情报，妄图破坏我党组织。

三六年十二月的一天，地下党员温立三同志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是丰润县左家坞的一个日本特务，名叫金立忠。信里说：我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暂不告发你们，兄弟我缺钱花，先"借"三十块。温立三把信拿给我看，我心想，麻烦了，准是党内出了奸细，不然的话，日特怎么会敲诈到我们地下党的头上呢？究竟谁是奸细？有多少地下党员暴露了身份？这些问题必须马上搞清楚，如果下手晚了，很可能使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我马上写信将林燕找来，把情况告诉了他。林燕听了以后，微微一笑，说道："这好办。我与金立忠过去是朋友，他当了日特以后，才断了来往。今天正好在福升旅馆见到他。我想办法掏出这小子的实底来。"我说："你请他喝酒，灌得差不多时，用老朋友的面子套他，看他说不说。"林燕说："这小子的秉性我了解，你放心吧！"

回到旅馆，他把金立忠请来，叫了几个菜，然后，一边喝酒，一边拉起"交情"来。林燕劝酒"亲亲热热"，金立忠喝得昏昏沉沉。喝完酒，林燕说："咱哥儿俩到外面转转去吧。"一转转到警察局门口。林燕停住脚步，叫着金立忠的号，然后一把攥住他

的腕子，笑眯眯地说道："你看，这是啥地方？干脆把我送进去吧，省事儿！"这突如其来的将"军"，使金立忠一下子怔住了。他心虚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咱可是顾命的朋友呵！"说着，把林燕从警察局的门口拽到一边，献媚地说："讲心里话，我知道你们是干啥的，要不是冲着你，我什么事儿都干出来了！"林燕说："我是干什么的？你说呀！"金立忠"嘿嘿"一乐，诡密地说道："我这儿有七个人的名单，什么李一夫、彭来、温立三……，还有你。就为你一个人，我还想等一等，先不下手。怎么样，还是跟着我干吧，票子有的是，吃香的，喝辣的，不比你那个赔本儿的买卖强得多呵！"

林燕默默地记下金立忠说的名字，然后用严峻的目光盯住他说："我说话冷一点儿，你是中国人，祖坟在咱国，却帮着日本鬼子办坏事，对得起咱老祖宗吗？你也不想想，日本鬼子把坏事都做绝了，我们共产党和老百姓能饶过他们吗？你干的是汉奸差使，能落得下好结果吗？"几句话问得金立忠张口结舌，脸色煞白。林燕略停了停，口气稍微缓和一点儿，接着说道："我一是冲着咱们的老交情，二是冲着你刚上贼船，还没有什么大罪恶，这才来找找你。咱是近人不说远话，实话告诉你，我们早就有准备，你就是把名单交给日本人，也伤不着我们的一根汗毛，只不过你给自己的脖子上多套了一条绳子，脚底下多挖了个坑！冲着老交情，我劝你从今以后洗手别干了！"金立忠摸不到苏林燕的虚实，听着这一席软中有硬的话，心里直打小鼓儿。便咧着嘴，苦笑着说："你说的理儿，我也不是没想过。兄弟就是好抽一口，又找不到事儿做，才上了这条船。好吧，我听你的，马兰峪那边，我有熟人，我到那里开金矿去，再不干这份差使了。"林燕趁机鼓励他说："好，够朋友，今后有困难，只管张嘴！"

接着，林燕便追问金立忠名单的来路。金开始时不说，林燕连哄带吓地说："其实，谁捅给你名单，我们早攥在手心里了。不

过，我们共产党办事，讲究有根有据，八面砸实，所以再找你对对号。你不说倒也没啥，就是到时候有人要连你‘一锅烩’了，我可没法帮你说话呀！好吧，咱哥儿俩后会有期！”说完，转身便走。这一下，金立忠可慌了神，忙往前蹿了一步，一把抓住苏林燕的胳膊，结结巴巴地说："你，你别，别急嘛！我告诉你倒可以，可你得打保条儿，别去报复人家。”苏林燕知道金立忠在找“台阶”下，便微微一笑道："你就说吧！”这样，金立忠便一五一十地把经过告诉了苏林燕。

原来，给金立忠提供名单的，是在特委和县委之间跑交通的一个家伙。这个家伙生活腐化堕落，我曾多次严肃地批评过他，可他阳奉阴违，照样跑唐山、逛“窑子”、吸白面儿，而且还背着党组织，当上了唐山日伪小报的通讯记者。我们见他屡教不改，丧失立场，便内定开除了他的党籍（不通知他本人）。有一次，他又跑到唐山，碰上了金立忠。当时，日本特务机关给金立忠的任务，是搜集丰润县小学教员中党的活动情报。在谈话中，这个家伙露出小学教员的身份。金立忠便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捞到情报，于是，投其所好，给了他三十块钱的料面（即大烟）。这个家伙立刻就出卖了灵魂，供出了丰润县党的七个主要负责人。金立忠见名单里有苏林燕，有点犹豫不决，又不甘心白搭这三十块钱，于是，演出了这场写信诈钱的丑剧。

把情况全部捞到手后，林燕急忙找到我，详细地作了汇报。我们决定立刻杀掉叛徒，刻不容缓。于是，拟订了一份周密的计划，由高小安出面，在一个集日，把这个叛徒诱骗到离胥各庄四、五十里远的一个苇塘里，处决了。

这一场斗争，前后没用上十来天。由于林燕同志的坚决和机智，终于化险为夷，挽救了丰润县党的组织。不然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的。

杀叛徒事件过后，我以杀人凶手嫌疑被扣十二小时，后起用

两个连环铺保，保外候讯。运昌同志指示我立即离开丰润，于是，经他联系，我与温立三同志取道北平、西安，转赴延安。林燕同志仍留在冀东坚持斗争。

从那以后，我与林燕有十来年没有见面。"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虽然遥隔几千里，但心是连在一起的。从到延安来的冀东干部嘴里，我常常打听到林燕坚持斗争的英勇事迹。我盼望有一天重返冀东，再和这位无比坚强的战友并肩战斗。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四六年底，我从延安回到冀东，和林燕同志一起在区党委工作。林燕当时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这时的林燕，已经锻炼成为十分成熟的党政干部了。

不幸的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他率冀东代表团赴冀察热辽分局参加党代表大会，返回途中，在赤峰以西的柴火栏子被国民党匪徒包围，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噩耗传来，我涕泪直流，悲痛欲绝。

林燕同志，你是一位多么坚强的战士呵！在十几年的艰苦岁月里，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你从没有动摇过；无论面对多么凶恶的敌人，你从没有畏惧过；就是碰到再大的困难和危险，你也从没有退缩过；总是那么沉着、镇定，那么坚韧不拔，那么勇往直前！

林燕同志，你又是一位多么忠诚的战士！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你就把一切——全部家产、全副精力、火热的青春、乃至宝贵的生命——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林燕同志，你没有死！历史的丰碑上，永远镌刻着你战斗的业绩和卓越的贡献；人民的心中，永远铭记着你光辉的名字和高贵的品质！你是一位永生的战士！你永远活在我们的事业里，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圣洁　整理）

滦县三烈士

张振宇

在滦县，最早影响我，帮助我，把我引上革命道路的那三位同志早已牺牲了。此刻，追忆往事，我怎不沉浸在对这三位烈士的深深怀念之中！这三位同志是：丁振军、张鹤鸣、刘建民。

党的好儿子丁振军

丁振军同志，原名丁凯，河北省滦县西坨子头人，一九一三年生。一九三四年以前，他曾在滦县汇文中学读书，毕业后，在本村教书。在学校读书期间，他就参加了冀东的秘密革命工作，并于一九三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家住在大门庄，与丁振军家相隔七、八里路。我的妹妹张瑞珍与振军在汇文中学是同学。那时，振军、瑞珍、赵玉清、李光宇（已牺牲）等人经常在我家开秘密会议，我为他们站岗。

当时，滦县驻有伪保安队，大队长叫刘佐周，是一个很坏的家伙。为了培训反共武装头目，一九三三年，他开办了一个军官学校，对外名为“速成中学”。地下党决定派毛树德、丁振军、张鹤鸣和王红忱等同志打进这个学校，学习军事，目的是将来掌握军权，进而瓦解敌军。但入校后没几天，除鹤鸣外，其他的同志都暴露了。振军被迫离校，回村后，继续教书，同时，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秘密发展党员，组织抗日小组。我就是在这个时期

参加革命的。在振军的领导下，我们组织群众拒交伪军摊派的粮、款，发动雇农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并与刘佐周的伪保安队进行斗争。

刘佐周到处搜捕共产党，屠杀革命群众，气焰十分嚣张。他还恬不知耻地在滦县城北的紫金山上，为自己树了块"德政碑"，并铸了一个全身铜像。滦县人民对刘佐周恨得咬牙切齿，为了煞这家伙的威风，长革命人民的志气，振军同志派秘密游击小组半夜上山，推倒了"德政碑"，还把刘佐周的铜像头锯下来，倒放在大路上，写上"尿憋子一个"。第二天。消息传开，刘佐周又气又怕，而革命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由于丁振军等同志的艰苦努力，滦县共发展了十来个党支部，建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九三六年，他组织了滦县县委会，后被冀热边区特委派往丰润、蓟县一带进行秘密工作，恢复党的组织。由于他具有顽强的革命毅力，密切联系群众，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打开了局面。在这一个时期内，丁振军同志表现了出色的地下工作才能和巧妙的斗争艺术。

一九三八年七月冀东大暴动时，振军同志任冀东抗日联军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部队西进后，他留在丰润、遵化、迁安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组织青年救国会。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振军同志任冀东专区东部行政办事处（辖四个联合县）主任，我任迁滦卢联合县县长。在这段时间里，我对振军同志的工作作风有了更深的了解：他看问题看得准，想问题想得细，处理问题很果断，深受干部和群众的爱戴。

一九四二年打治安军战役以后，人民抗日情绪高涨。这时，振军同志被派到北宁路南开展新区工作，任工委书记。仅一年多的时间，在党政建设和军队发展方面，就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十月，丁振军同志担任第十七地委书记兼专员和军分区政委，我任副专员兼民政科长。这两年，是

我和丁振军同志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两年。在这两年里，在他带领下，我们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记得在一九四四年春季，我们在滦县青龙山开会，因汉奸告密，日伪军四千余人突然将我们四面包围。当时，我专署驻在高家峪，身边只有一个警卫班。警卫连的另两个排驻守在高家峪山南的井儿峪。等到我们发现敌人时，驻井儿峪的部队已与我们断了联系。西面青龙山主峰和北面横山均被敌伪军占领；南面也被卑家店的敌伪军截住；从高家峪直到东面九百户村的一条大路，也被敌人堵住。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我和丁振军同志碰头研究对策。我说："如果在这儿死守，肯定会全军覆没，不如冲出去！"振军同志目光深沉地盯住我，稍加思索，便果断地说："好，听你的，往外冲！"我通过望远镜已经观察到，正东九百户村据点的大部分敌人都出动来包围我们，分析据点内部已经空虚。敌人自恃有据点，料定我们不敢从这里突围，因此，放松了戒备，为我们留出了空隙。于是，我们便决定留区小队断后，丁振军同志与地委警卫班居中，我带一个排打头阵，先从高家峪往南登庞庄子南山，然后顺山的阳坡折向东，直向九百户村冲去。据点里留守的少数敌人龟缩着，不敢出来。我想来个"顺手牵羊"，把九百户村据点"端"了。这一回，振军可不听我的了。他说："不行，再呆二十分钟，想冲也冲不出去啦！快走！"振军同志是那样严肃，他的命令里饱含着不可抗拒的力量。我不得不丢下这块嘴边的"肥肉"，带队继续往前冲去。

冲出包围后，我想折向东北部平原地带，将部队带回根据地去，和敌人打游击；而丁振军同志则考虑，在平原地带白日行军，目标明显，敌人还会很快追来，不如穿过铁道，迅速甩开敌人，然后，再做打算。

当时，敌人为防止我军民"破交"，在铁道两侧各挖了一条丈余宽、丈把深的封锁沟（又名"反共沟"）。我军平常活动，都随

身带着用麻袋片联缀成的“布桥”。碰到封锁沟，只须用搭“人梯”的办法，先顶过一个人去，拽住“布桥”两侧的绳子，部队便可以踏着“布桥”很快过沟。而敌军没有“布桥”，众多人马想全部过沟，重新包围我们，没有几个小时是办不到的。毫无疑问，振军同志“穿过铁道，甩开敌人”的想法是正确的。按振军同志的命令，我们刚刚过了沟，日本鬼子的装甲车就“轰隆隆”地开过来。鬼子望着我们远去的背影，干瞪着眼，无可奈何地空放了一顿机枪，想重新包围我们的阴谋破产了。

甩开敌人以后，战士们兴奋地凑过来，指着我和振军七嘴八舌地说：“一个赵云，一个孔明，就把敌人给算计了！”振军同志赶忙接过话茬儿说：“我算得了什么？还不是靠大家勇敢嘛！还有咱这位猛张飞专员！”一句话，把大家说得都笑了起来。

略停了一停，振军同志把头缓缓转向青龙山方向。那边，枪声平息了……他脸上露出了沉痛而肃穆的表情。战士们望着振军同志那涌出泪花的双眼，一齐脱帽肃立……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振军同志刻苦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掌握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仗越打越精。

一九四四年十月，冀热边区特委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振军同志奉命带一区队四连开赴杨家营。为了蒙蔽敌人，他让全连化装成日军，隐蔽在西坨子头村，准备休息一天，第二天夜间过铁路。西坨子头南三里有个张庄子，这个村有个地主叫王铭，是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他在本村组织了反共“伙会”，会员多是反动会道门“大佛教”的信徒，自吹念起佛来就“刀枪不入”。这一天，王铭带着一百多个“伙会”，从张庄子出发，沿大路往西坨子头“串庄”。振军同志得到情报后，立即命令队伍向坨子头西山迂回，抢占有利地形；同时，又派出一个排埋伏在西坨子头庄东的“庵子”附近，监视东坨子头据点，准备阻击可能增援的日本鬼子。王铭看到对面来了全副武装的“皇军”，远远地就打招呼，

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队？""翻译"高声喊道："我们是一四一四部队（日寇驻唐山的宪兵队）。"王铭一听，又是鞠躬，又是作揖，并让"伙会"会员们举起小旗，喊道："欢迎！欢迎！……"

振军看着这群家伙令人作呕的奴才相，气炸了肺。他悄悄命令部队作好战斗准备，然后，提着手枪向这群家伙走来。没承想，双方刚一靠近，王铭就认出了丁振军。王铭这个狗汉奸吓出一身冷汗，大声嚷道："快、快开枪，是丁振军！快、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振军同志甩手一枪，结束了王铭的狗命。随着枪声，战士们迅速分散，一顿机枪扫射，这些自吹"刀枪不入"的汉奸就见了"阎王"。

听到枪声，埋伏在庵子附近的那个排立刻做好战斗准备。但是，东坨子头据点的鬼子只是用望远镜了望了一下，并没有出来。大概他们看到的是"皇军"已将"土八路"全部消灭，用不着再去增援吧！

趁鬼子还没醒过梦来时，振军同志带着部队，迅速地穿过了铁道。

可是，万没想到，几天以后，在杨家铺突围时，振军同志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那次战斗中，为了保卫特委机关，振军同志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冲上山头，顽强地阻击敌人，不幸牺牲。当时，他仅三十一岁。

噩耗传来，我长时间地陷入深沉的怀念和痛苦的回忆之中。……记得有一次，他爱人向他问起自己的入党日期，他曾嗔怪地反问："你妈妈啥时生的你，你记得吗？"她爱人不解地回答说："我的生日，怎么记不得！"振军十分严肃地说："入党，就是得到第二次生命，党就是我们的母亲呀！你的生日忘不掉，那入党的日子怎么能忘掉呢！"振军同志，就因为把党看作自己的母亲，就因为时刻不忘党的教导，才那样坚毅、勇敢，那样奋不顾身、视死如归，才成了誓死捍卫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呵！

机智勇敢的指挥员张鹤鸣

张鹤鸣是河北省滦县大门庄人，我俩一起长大，又一起参加革命，所以，他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聪明、才智，他的直爽、刚正，都是我所崇敬的。特别是他在指挥作战时的机智、勇敢，更使我佩服。

鹤鸣生于一九一一年。他父亲是清朝的秀才，在村子里当教师，思想很保守。鹤鸣小时候，家境虽不宽裕，但父亲坚持让他念书，一直念到初中二年级，家里实在供不起了，才被迫停学。失学后，他在本村教过一段书。因为受到本村有钱有势人的排挤、打击，加上他眼见地主老财横行乡里，剥削压迫穷人，所以对旧社会极端不满，对革命胜利的苏联非常向往。那时，李运昌等同志经常以游学为名，四处串联，发展革命，很快就同鹤鸣联系上了。一九三五年，鹤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革命的秘密工作。后来，组织上派他打入敌人内部，上了刘佐周办的军官学校。毕业后，在敌保安队里当过一段中队长，后来又提升为敌宁宇师的参谋长。本来他想策动一个旅起义，但不慎暴露，他只身逃出虎口。

一九三八年七月，我俩一起参加了冀东农民武装大暴动。暴动成功后，他任第五总队的副总队长兼参谋长。总队长是李润民，我也在这个总队。第五总队一成立，就在滦县杨家院打了一个大胜仗。

当时，被轰轰烈烈的武装大暴动吓慌了手脚的反动政府，急忙派滦县保安队三百多人前来镇压。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我们召开了紧急会议，进行了研究和部署。会上，鹤鸣同志指出：我军未受过正式训练，装备又差（很多战士使用的还是扎

枪、锄头），所以，只宜巧取，不能硬拚。他建议，把队伍分成三部：一部正面迎敌，鸣枪呐喊，诱敌深入；另外两部埋伏在敌之两侧，等敌人路过，出其不意，给以痛击。后来，我们总队按着鹤鸣的意见，由李润民、张鹤鸣和我分别带队，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战斗打响后，敌人一味前冲，不料突然被我两面夹击。一下子，枪声、喊声响成一片，闹得他们懵头转向，丢魂落魄，莫名其妙地当了俘虏。他们的中队长刘涛也乖乖地举起了双手。这一仗，共吃掉二百多个敌人，缴获两挺轻机枪和其它长短枪二百多支。这不仅极大地鼓舞了我抗日军民，还震慑了敌人，使敌人不敢出城，为我军进一步扩大发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鹤鸣同志指挥打仗，常常坚持一个“巧”字，始终避免硬拚。这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战法。从三八年大暴动开始，他沉着、镇定，指挥过多次战斗，差不多每战必胜，原因之一就是他机动、灵活，善于用兵，善于调动敌人。

例如，在一九四三年清明节前后，我们攻打驻扎在大庄河的敌人。这部分敌人非常狡猾，他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坐船下海。所以，当地老百姓管他们叫“水上漂”。鹤鸣指挥部队打了几次都打不着他们。后来鹤鸣想了个办法，他让我带一部分战士从远处坐船，绕到敌人背后去抢占敌船，然后两下夹攻。我按照他的意图，连夜带着战士们化装成打鱼的，绕到敌船附近。守船的伪军看见我们后，大声喝道：“干什么的？”我们七嘴八舌地说：“打鱼的，刚回来。”伪军一听说是打鱼的，就连蒙带吓唬，非让我们给他们送鱼吃不可。当时，我觉得挺好笑，本来嘛，老子巴不得上你们跟前去呢！于是，嘴里答应着，心里骂着：“他妈的，还想吃鱼，等一会儿把你们一齐喂了鱼！”等战士们提着鱼一上敌船，我就发出了暗号。大伙一块下手，转眼的工夫，就把那几个看船的伪军绑了起来。知道我们得手后，鹤鸣带着部队从正面一打，村子里的伪军一看我军来势凶猛，照旧退守海岸，还想坐船逃之

天天呢！不料，船里也向他们射出密集的子弹，伪军立刻乱了阵脚。他们一个个抱着脑袋，拖着枪，哭爹喊娘，四散奔逃。

那天夜里，许多老百姓也跑出来助威。县委书记杨远同志也来了，他正好碰见四个伪军。杨远操着南方口音大声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伪军一听，吓坏了，互相捅了捅说："这回可是老八路到了！"于是，乖乖地缴了枪。

还有一次，我们决定攻打杨庄子据点。这个据点里的队长叫杜连绪，是一个恶贯满盈、狡猾透顶的大汉奸。他的据点设防很严，易守难攻，所以，鹤鸣同志决定智取。怎么智取呢？他深入群众，寻找杜连绪的破绽。后来，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杜连绪有个干儿子当警卫员，霸占着村子里的一个姑娘。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又叫杜连绪看中了。他哪管什么干爹干儿之情，把干儿子踢开，由自己一人独占。由于杜连绪势大，手段毒，他干儿子干生气，不敢言声。鹤鸣知道这件事后，觉得这个矛盾可以利用。跟大伙一合计，都觉得可以搞个"连环计"，就通过那村子里的保长（我党地下工作者）暗中说服杜的干儿子。开始，杜的干儿子什么也不肯说，后来保长问他："你还要不要那个姑娘？你还有没有男子气？"

杜的干儿子说："没办法，只好忍下这口气。"

保长说："村子里对这件事都看不公，哪儿有当干爹的霸占儿媳妇的！你要是有意，我们大伙帮助你。"经这样做工作，杜的干儿子终于点头了。

我们同他约好了时间，部署了战斗。次日，鹤鸣带着队伍在外面一打，杜连绪赶紧登上岗楼去指挥。双方打得正热闹时，杜的干儿子从背后给了他一枪，他一个倒栽葱就掉下去了。伪军见队长完蛋了，慌作一团。在我强大攻势下，这个顽固的据点很快就被敲掉了。

在与鹤鸣共同工作、共同战斗中，我感到，他所以能机智、

勇敢地指挥部队打击敌人，首先在于他对党、对人民的忠诚、热爱和对旧社会、对敌人的痛恨。有了这一条，他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就能带着很少一部分战士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在他父亲、妻子和四个孩子受到敌人的迫害，不得不隐姓埋名、背井离乡、四处流浪的时候，他全不以家庭为念，想的依然是如何打败敌人。他想方设法，制造出杀伤力很大的木筒炮（里面装上药和碎锅片）和枪榴弹。他主持搞过小兵工厂，制造武器，装备自己，打击敌人。在他的带动下，他的三个弟弟都参加了革命，其中有两个弟弟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一个弟弟负了重伤，成了残废。所有这些，更坚定了他同敌人血战到底的信念。因此，在十多年的战斗生活里，他不论是当区队长、旅长，还是当军分区副司令员、东北护路军副司令员，始终保持着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始终尽心尽力地为党工作。他不愧是我党的一个好干部，不愧是我军的一个好指挥员。可惜，多年的艰苦斗争把他的身体累垮了，所以战争一结束，他就病倒了。一九五二年秋天，经治疗无效，鹤鸣同志和我们永世长辞了。

坚贞不屈的刘建民

刘建民原名张瑞珍，是我的妹妹。她出生在一九一三年，从小热爱劳动，喜欢学习文化，到七、八岁上，她就闹着去上学念书，但我父亲一直不答应。他认为姑娘早晚得嫁人，上学念书是白搭，不如多帮家里干点活儿。因此，瑞珍九岁那年秋天，就开始帮家里放猪了。猪多，她一个女孩子家照管不过来，有时猪跑散了，她急得直哭。有时，猪吃了人家的庄稼，她还得挨人家的骂。一天，猪跑到财主家的地里，拱了花生，被财主看见，打了她一顿。她哭着跑回家，说什么也不肯在家放猪了，非闹着上

学。父亲不答应，她赌气一连几天不吃饭。父母慌了，轮流来劝，但不论怎么劝，她也不吃。我也劝她，说："妹妹，听哥哥劝，吃点饭吧，别饿坏了身子。"她说："宁可死，也不在家受这份窝囊气。你跟爸爸说说，让我去念书，要是不让我念书，我就把头发剪了，去当尼姑！"我知道劝不过来，就跟父亲说："瑞珍铁了心了，快让她上学去吧，家里又不是供不起。"父亲也怕有个好歹，只好送妹妹去上学。妹妹就是这样一个倔强的孩子，她认准一个道儿，非走到底不可。

妹妹小学毕业后，执意要上中学。父亲不给学费，她就考进滦县汇文中学。汇文中学是教会办的，免费。外国人办这样的学校是为了传教，毒害和奴化青年学生。但人是有思想的，在汇文中学就有许多人不信教会那一套，象毛树德、丁振军就是这样。

妹妹到了汇文中学以后，先结识了丁振军。他们通过谈话，交流思想，发现彼此的看法比较接近，于是，就交往起来，互相鼓励，互相推荐进步书籍，共同寻求翻身解放的真理。后来，他们又认识了毛树德同学。毛树德当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他经过观察了解，知道振军和瑞珍有革命的要求，就进一步帮助他们，常借给他们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看。到一九三三年，振军和瑞珍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便于隐蔽，党组织批准他们加入教会，让他们借传教为名，传播救国、救民的道理，揭露旧社会的罪恶，发展党的组织。

妹妹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在校内外积极开展工作。她一回家，就给我讲为什么劳苦大众受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地主、资本家怎样压迫和剥削。她常说："要想不受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就得革命，推翻他们的政权，象苏联那样，用枪打出咱们自己的天下。"她讲的道理，我听着入耳。后来，在她和丁振军等同志的影响下，我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日寇的操纵下，大汉奸殷汝耕出面搞了个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个傀儡政府一成立，就加紧了对人民的控制，谁抗日就镇压谁。妹妹眼见这种情况，非常愤慨，便毅然离开学校，回到农村。在党的领导下，他在大门庄一带活动，进行地下工作，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党组织还先后派她到唐山、滦县县城、榛子镇、昌黎县和北戴河去工作。她每到一地，便以代课教书或传教为名进行革命宣传。在学校代课时，她利用新民会，暗中组织抗日学生会，团结教职员工和青年学生，并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员；在农村，她积极组织穷苦农民同地主进行合法斗争，要求增资减租，抗缴伪政府的粮款等等。她的这些工作为日后组织农民暴动做了准备。

一九三八年夏天，党发动冀东大暴动，妹妹参加了暴动并在冀东抗日联军第五总队里担任宣传工作。这年秋后，"抗联"西撤受挫，日伪军乘机对冀东进行一次"大扫荡"。他们到处捕杀革命者及其家属，对人民群众进行了灭绝人性的镇压和摧残，使革命遭受惨重的损失。我父亲被敌人抓去杀害了，我母亲被毒打，连腿都打折了。我家的房子被敌人烧光了。在革命遭到失败、家庭遭到洗劫的情况下，妹妹毫不动摇，她对敌人恨得更深了，对同志们更亲了。她跟我说："哥哥，不能灰心，要报仇！日本鬼子是蹦跶不长的，咱们宁可死，也得革命到底！"这使我想起她小时候闹着上学、不吃饭的情形。她已经从一个倔强的女孩子变成一个坚强的革命者了。

在环境最艰苦的时候，妹妹坚持活动在丰润、滦县、迁安一带。发展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建立抗联会、妇联会等等。为了配合这些工作的开展，她经常帮助妇女学文化，宣传男女平等，经常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因此，赢得了群众的拥护。

一九四〇年，她担任了中共丰、滦、迁联合县委宣传部长、县妇救会主任以后，工作更紧张、学习也更努力了。她特别能联

系群众，到哪里就能和哪里的群众打成一片。在老乡家里，不是帮助大娘烧火做饭，就是帮助大嫂子抱孩子，亲热得象一家人。

一九四一年春，敌人又来“大扫荡”，当时，瑞珍正在迁、滦、卢联合县开会。为了使群众早做准备，减少损失，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她就带着五位同志返回丰、滦、迁地区，立即组织群众进行反“扫荡”斗争。一天晚上，她和另外五位同志住在丰润县杨家营村。第二天，天还没亮，敌人就把村子包围了，进行挨门搜索。她和同志们商量：为了保护群众，立即冲出去。房东大爷说什么也不让，他说：“你们六个人，只有一个男的，冲不出去，还是进地洞吧！”然后，不由分说，将他们六人藏在地洞里。

敌人搜查了半天，连一个“八路”的影子也没搜到，但还不甘心，就把老百姓聚到一起，先是威胁利诱，然后进行拷打，非让大伙儿交出“八路”不可。乡亲们不屈服，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一个汉奸发现了瑞珍她们藏身的地洞，就带着鬼子把地洞包围起来。敌人向洞里喊话，叫她们出来，说出来以后保证不打不杀。但回答敌人的是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瑞珍她们一面打枪，一面往外扔手榴弹，坚守洞口。敌人想活捉他们，但又不敢进洞，就往洞里放火、灌水、放毒，迫使他们出来。这六位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没有一个动摇的。他们烧了文件，砸毁了枪支，最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壮烈牺牲了。

妹妹牺牲前跟另外五位同志说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她在死亡面前想了些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但是，她的信念我是知道的，那就是：“宁可死，也要坚持到底！”

（星城　圣洁　整理）

“盘山乡长”李子光

李运昌　李楚离

李子光同志是河北蓟县二区山北头村人，原名贾一中。他中学毕业后因家庭生活困难，未能再升学，被迫去绥远谋生。在绥远《西北实业日报》当校对和编辑时，结识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在这些同志的影响、帮助下，他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找到一条光明的道路，于是，毅然向地下党组织提出入党的请求。一九二六年七月，他在绥远加入共产党。不久，便被派到《中山日报》(即原来的《西北日报》)任校对和编辑，在党内任支部书记。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子光同志在白色恐怖下，九死一生，逃出虎口，几经周折，回到蓟县老家。

子光回到蓟县后，虽一时未能同党组织接上关系，但他依然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曾秘密发展党员三十多人，建立起临时县委，不久便同京东特委接上关系。在特委统一布置下，他积极领导蓟县一带的农民运动。因在蓟县城里的集市上搞“飞行集会”，受到伪警局的通缉，所以他只得离开蓟县。一九三一年，京东特委派他任迁（安）、遵（化）、蓟中心县委书记。从那以后，他一直在迁安、遵化、蓟县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发动农民、金矿工人进行斗争。

一九三八年，他同蓟县县委书记王崇实同志一起，发动并领导了蓟县农民武装大暴动。暴动成功后，他任抗联第十六总队的政治部主任。在这个部队的鼓舞推动下，随后又发展了十七、十八、东十七等三个总队和第三、第六两个区队，共五千余人。这

支部队曾与洪麟阁部共同攻克玉田县城，配合我八路军宋、邓纵队解放蓟县县城。八路军西撤以后，他带队随八路军撤到平西。一个月后，冀察热区党委又派他返回冀东，担任蓟县、遵化工委书记，由他重新组建那一带的地下党和群众团体。王崇实同志一九三八年牺牲以后，子光同志是蓟县党的实际负责人。在革命受到严重挫折、环境十分恶劣、斗争十分残酷的情况下，子光同志不仅没有灰心丧气，反而迎难而上。他团结群众，发展党组织，同敌人展开巧妙的斗争。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又在蓟县建立起革命的坚实基础，为一九四〇年冀东游击战争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三九年，王少奇、夏斗元、王文等同志带领蓟县游击队从平西返回冀东，在子光的领导下，建立了隐蔽的蓟、遵边境抗日根据地（马伸桥东、堡子店北）。

一九四〇年一月，冀东党组织为了开辟盘山，在遵化召开了阎老湾会议，子光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把盘山建成抗日根据地，由包森同志亲自带二支队主力开赴盘山，肃清土匪，建立抗日政权。会后，就按计划行动。在子光、王少奇等同志的积极协助下，很快消灭、收编了二十多股土匪，共六百多人，把一个土匪遍地、混乱不堪的盘山变成了有良好革命秩序的根据地。这就形成了以盘山为支撑点，东到遵化，北到平谷、密云，南到蓟县平原的游击区。当时子光是地方党、政的主要负责人，他配合包森同志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他十分注意保护群众的利益，关心群众的疾苦，走到哪里，就同哪里的人民打成一片。有一次，他在盘山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工作，正好碰上了日军围攻。他没能躲开，就迎着日军走了上去，假装殷勤地同鬼子军官打招呼，说自己是乡长。日军信以为真，就让他给安排住宿。因为他对那个村子很熟，村子里的群众又都齐心保护他，所以他就吆吆喝喝地分配住房。等鬼子按他的指派分散以后，他冲着乡亲们点

头笑了笑，迅速离开了村子，安全转移了。从那以后，当地群众就亲切地称他为“老乡长”或“盘山乡长”。

在子光同志领导的地方政权的积极动员下，盘山一带的青壮年踊跃参军参战，使包森同志得以在短期内，组织并扩大了坚持冀东抗战有功的十三团。

一九四二年九月，冀东西部地委书记田野同志牺牲以后，由子光同志继任。在他的领导下，蓟县一带很多接近敌占区的村庄建立了“两面政权”。在斗争极其残酷的日子里，他灵活地掌握对敌斗争策略，积蓄革命力量，保护群众，粉碎了敌人挖空心思搞起来的“人力电线杆子”和“锣鼓队”。“人力电线杆子”和“锣鼓队”是敌人推行“以华治华”反动政策的一部分。在他们的强制下，各村的老百姓都必须出来站岗，连成一条封锁线。敌人规定，一发现八路或地方工作人员，立即敲锣打鼓报告。子光同志为避免群众受摧残，就允许各村群众站岗，在站岗中制造假象，应付敌人，掩护部队和干部活动。他针对敌人的反动策略，搞了“树木电讯网”，在上、下白洋和大、小黄岩一带，组织群众在山头上秘密监视敌人，用树作传消息的信号。敌人从据点一出动，往哪个方向去，山头上的“消息树”就往哪个方向倒。这样来报告消息，传递情报很快，所以，敌人一动，我方就知道了，或转移，或伏击，闹得日伪军莫名其妙。因为人民在我们一边，所以敌之“人力电线杆子”不仅没有成功，反而为我所用；而我之“树木电讯网”，敌人一直破不了。除此以外，子光同志还集中群众智慧，想了许多有效的办法，应付敌人、打击敌人，巩固发展蓟、平（谷）、密（云）、三（河）一带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二年二月，包森同志牺牲之后，子光就成了这一带的主要领导者。

一九四二年，日伪对我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围剿”，蚕食了大片根据地。一九四三年，冀东军分区进行了一次恢复基本区战役，粉碎了敌人的沟壕堡垒政策，使根据地扩大为冀热边地区，

成立了冀热边特委，下设五个地区委，子光任第一地区委书记兼十三团政委。这期间，我军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在一九四四年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把玉田、蓟县平原基本恢复，我抗日游击队日益活跃。华北日军兵力严重不足，就调来十万满洲军驻防在冀热边区周围，企图围困、封锁并阻止我军向东北方向发展，但其未能得逞。

一九四四年秋后，十三团派出部队，由师军、王文、李越之三同志带领，挺进热河西北部。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对日宣战。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冀热辽军区抽调部队和地方干部，挺进东北，解放热河。舒行、子光同志率十四分区的部队经兴隆直赴承德，配合苏军解放了承德及热河西部，受降伪讨伐队七个大队共两千多人，受降伪满洲军两个旅（以后跑掉一部分）。承德解放以后，子光同志任冀热辽区党委热河区分委书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热河全境解放后，热河人民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省政府。子光同志任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直到一九四七年。当时，工作是十分繁忙的，但子光同志尽心尽力，不知疲倦，取得可喜的工作成绩。

子光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老干部，经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考验，在发展冀东地方党组织等方面，有着不少的贡献，尤其是在创立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子光同志一生按照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平易近人，有高尚的品德和革命情操，他在人民群众中有相当高的威信。他的一生，是英勇奋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的功绩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这批反革命丑类抹煞不了的。他的动人事迹至今还在冀东西部人民中间传颂着。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星城　整理）

从愤世到暴动

高敬之

对于我这样一个人，能够自发地起来革命，许多人感到奇怪。因为我当过旧卢龙县政府的教育局长，当过卢龙师范的校长，在卢龙一带，也算是个"知名人士"。这样一个"知名人士"，在没有党的领导的情况下，竟发动几百人起义、造反，而且是"骂下卢龙城"，确实令人奇怪。加上一些经过渲染的传说，什么"高局长白日挑灯进县衙"、什么"高司令骂开卢龙城"、什么"高县长遇险除敌特"等等，有人就说我是个怪人、是个传奇人物。其实，我参加革命是很自然的。我干过的一些事也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应该干的。何况由于自己聚众起事时，没有党的领导，还闹出不少笑话呢。

我是滦县沈官营人（沈官营解放前属卢龙县），因为家境贫寒，祖祖辈辈没有读书人，我大伯看我行，就跟我父亲核计，让我上学，以后好有个"出息"，于是让我在本村上"冬学"。十二岁那年，又送我到离滦县老车站不到半里地的姥姥家上"洋学"。我姥姥家那个村子叫雷家坟，是一个只有七个门口的小村。我上的那"洋学"，校名是"直隶省第三师范附属小学"。当时，在学校里数我功课好，年年考第一，所以跳了一次班，六年读完小学七年的课程，考上了"滦师"。在"滦师"，赶上两次军阀战争，闹了一次学潮，所以，没学多少功课。

我从小就淘气、好干冒险的事。当我看到日本浪人开的吗啡馆赚钱害人，非常气愤，曾多次约同学去砸吗啡馆。我们都是在

晚上去，每人装两兜石头子，悄悄地喊："一、二！"就一齐把石头冲着亮着灯的玻璃窗砸去。砸了，撒丫子就跑。因为恨日本帝国主义，有时碰见日本小孩也打几下子，打完就跑。上师范时，我就更爱管闲事、爱打抱不平。

"五卅"惨案发生以后，我们学校闹起学潮来了。领头的是刘作垣，我是纠察队长。刘作垣能说，我能打。闹了一年罢课，凡是给校长通气的学生，我们就打。我们对外国人杀中国人，愤慨极了，认为是国耻、是莫大的羞辱。那时，在我的头脑里，虽然没装多少革命道理，但总觉得中国人是黄帝的子孙，是最尊严、最高贵的，所以，不能忍受任何外来凌辱。一九二五年，我们闹了一年罢课，校方无法，只好发了毕业证。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毕业了。

毕业后，我在迁安县张督庄教学，到一九二七年，庄里来了革命军，据说是共产党领导的。人们管这部分北伐军叫"蛮子兵"，因为都是南方人。在张督庄住的是一个团部，他们的一举一动同旧军阀的部队有天壤之别。他们公买公卖，不打骂人，还帮老乡干活。他们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的歌子，贴"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这对我们触动很大，我认为这个部队太好了，从心眼里佩服。不久，这支部队就开走了，听说他们在唐山起义了。

这一年，我接受了"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对于共产党、国民党还分不清、弄不明白。有一次我要给学生印学习材料，油印机被邻近的"国民党临时登记处"借去了。这个登记处设在卢龙县的油榨镇，离张督庄二十几里地，我就跑去要。走进登记处的门，一看，有好几个人我都认识，其中还有我的三个同学——张春圃、刘化南、薛汇五。刘化南问我现在干什么。我说在张督庄教书。他们说："我们前两天还从你们那儿借来一台油印机呢。"我说："我就是为要油印机来的。"接下去刘化南问我："你教

书一个月挣多少钱？”我说：“二十二块。”他说：“别干了，上我们这儿来吧。教书怪拴得慌的，还受气。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上我们这儿来每月还能多挣三块。”我说：“到你们这儿来干什么？”他说：“打土豪劣绅！组织农民协会！”我说：“中！我回去辞了职就来。”

第二天，我就来登记处报了到。这个登记处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卢龙县临时登记处”。我去后，他们让我填了个表，算是加入了国民党，并告诉我，这是临时的，等进卢龙城再说。就这样，我当上了登记处的干事，东跑西颠，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搞所谓的农民协会。

一九二八年，东北军向蒋介石投降了，南北统一了。原来属于东北军管辖的卢龙县城，才准许我们进去。我随登记处进城后，对张春圃他们越来越看不惯。张春圃一进城，便从县衙门里借一匹大马，骑在上面摇摇摆摆，耀武扬威地在大街上兜风，很不象样。不仅如此，他们还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勾结在一起，欺压百姓，所以，我对他们非常反感。到后来实在看不惯了，我就同他们干起架来。

那年县里选举教育局长，把我和张春圃都选上了。张春圃比我票多，但后来上头却公布由我出任教育局长。这件事，引起人们的议论。许多人都怀疑我上头有人，连县长也这么看。我暗自好笑，我穷人家出身，只有几门比我还穷的穷亲戚，上头有个屁人！只不过在选举以后，我向上头写了揭发控告张春圃的材料，才得到了张春圃他们意想不到的结果。

我当上教育局长以后，同张春圃及他们那个登记处越来越对立，对他们的丑恶行为越来越气愤。我就组织了一帮子人跟他们斗，先是贴标语骂他们，后来干脆把登记处的门给封了，还写了一副对联贴在登记处门口。上联是：“民为鱼肉党作护符得意洋洋新土劣”，下联记不清了，好象是：“官是亲爹钱当命根大名鼎鼎旧

豪绅”，横批是：“祸国殃民”。后来，国民党一清理，把我们这一帮子人全开除了。我听说后，觉得挺可笑，跟朋友们说：“不开除我也不干那个了，这算什么党?!不干好事，……”

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一当上局长，就点了几把火。首先是整顿学校，因为学校都有庙产，这些庙产都被土豪劣绅把持着。他们以此放债、吃利钱，得四分利，给校方一分，他们自己得三分。这象什么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下令，把庙产全部收回。

县城里有一个姓傅的大劣绅，他当过县议长，他弟弟在外县当过县长，人称傅五老爷。这位傅五老爷知道收庙产后，大发雷霆，以为我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就气势汹汹带几十个人来打我。那天天已经很晚了，他一进屋，就粗声大气地问：“你们谁是局长?”我一看来者不善，要动武，就抢上前去说：“我是，怎么样?”冷不防先打了他一个大嘴巴，接着将桌子一踯，把他弄个大跟头，然后，我抽身跑进县衙门。我找到县长刘鹤汀，告诉他有人来砸教育局，赶紧下捕票去捉暴徒。县长即刻下了捕票。衙役带着捕票到教育局一看是傅五老爷，没敢吆声就溜回来了，报告县长说没人砸教育局。我一追问，瞒不过去，他们才悄悄地告诉刘鹤汀，是傅五老爷到教育局来。那年头确实是“官官相护”。刘鹤汀不愿惹傅五老爷和县议长，想息事宁人，我不干，执意要抓人。刘鹤汀就托人说合。后来又硬把我叫到他家去吃饭，让我和他换帖子，拜把子，才算把这件事了下来。

后来，换了个叫卢宗吕的来当县长，这个人和国民党临时登记处的头头们勾结在一起，所以，我有气，经常跟他干仗。因为我是全县选举的教育局长，他也怎样不了我。有一天上午，我去县衙门还“灯笼”，有人问我：“高局长，大白天还打着灯笼进衙门?”我当时对县衙门一点好感也没有，便随口说道：“你们衙门口黑，不打灯笼，我进了衙门什么也看不见。”这就是传说中的

“高局长白日挑灯进衙门”。

由于我和全县的权贵作对，他们就联合起来，把我给反掉了。被罢了官，我又去当教员，还到外县当过科员，但是，总不能合时入世，最后干脆在家闲呆着。

一九三三年，日寇进攻长城各口，于是爆发了“长城抗战”。有一股东北军，进驻油榨镇一带。他们发现本地的县长、区长都穿了兔子鞋，逃之夭夭了。师长翁兆元就跟当地老百姓打听，问这一带谁最有威望，谁革命。老百姓说有个姓高的，反对土豪劣绅，在县里呆过，年轻、敢干。这个翁师长立即打发几个人来找我。那几个人穿着军服，骑着高头大马，一进村就打听我，可把家里人吓坏了。他们找到我，就说：“我们翁师长请您到望福台去一趟。”我心想，去就去吧，不去也不行呵。就跟着他们一起骑马来到油榨镇北的望福台。走进司令部，姓翁的师长迎了上来，寒暄几句后，他自我介绍说：“兄弟我是华侨，有买卖，有饭吃，有衣穿。但是，为了抗日救国，我回到大陆当师长，不杀败日寇誓不罢休！”停了一下他问我：“你爱不爱中国，想不想救人民出水火？”我说：“我爱，怎么爱法？我想救，怎么救法？我一个土老百姓，饿得牙干口瘦的，连自己的小命还顾不过来，还谈得上抗日救国？除非让我去当兵。”他说：“不然，不当兵一样抗日。你支援部队行不行？区长逃走了，你当区长，行不行？”我说：“当区长怎么抗日？”他说：“你帮助我们筹措粮草，支持我们，也是抗日嘛！”就这样，我当上了区长。

有一天，翁师长领着部队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日本的飞机把油榨镇给炸了，炸死二百多人，区上的人都跑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处理善后事宜。很快，翁师长也败下阵来，带部队跑了，我也急忙弃官而去。

几年后，我受聘当卢龙师范附小的教员，不久，当上主任。到一九三六年任师范学校的校长。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我

感到老教师守旧，就辞退了一些，换一部分青年教员，希望能从他们当中找到共产党。那个时候，我对共产党已经有所耳闻，感到共产党行，就公开打听共产党，找共产党，可就是找不到，我很苦闷。加上有个叫高桥的日本人在学校里监视，心里更不痛快。有一天夜里，我听见高桥的屋里传出“呀——呀——”的喊声，心中纳闷，便从门缝往里看，只见那个日本人正端着一根木棍当枪，“呀——呀——”地扎枕头呢。我气坏了：“兔崽子，夜里还练习杀中国人呢！”从此，我就同他干起仗来，越干越凶。有的教员害怕，辞职躲开了。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跟一个叫刘兰香的女同事闲谈，问起共产党。她说：“我兄弟有个同学，在山海关田氏私立中学教书，他认识一个叫阮务德的，是共产党。”听她这么一说，我高兴极了，让她赶紧找她兄弟，给我介绍，好去找阮务德。这一年的暑假，刘兰香带我到滦县，见到了阮务德。

阮务德，看上去还很年轻，他长得很精神，也很健谈。记得当时，他手里拿着一张合法报纸，不紧不慢地讲着团结抗日的道理。我性子急，问他“怎么抗法？”他答道：“目前主要是团结人，学本事，作好准备。”

同阮务德见面以后，我回到学校又招了两班新生。有一天，家里派人接我，说是老爷子病重。回去后，我就到唐山等地抓药，给父亲治病，但是没有治好，死了。在这期间，我听到河北省中部人民起义抗日的消息，又听说我们村西南方向也有人在闹暴动。我心里琢磨：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也闹起来。我一闹起来，共产党就会来找我。我那时的思想动机很简单：凡是黄帝的子孙，凡是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抗日，都应该救国。

我们村子里有个叫王殿的雇工，他个子大，胆子也大，曾在外面当过两年兵，回来后没有固定职业，四处流浪。我看见他，便说：“大王殿，你也是条汉子，就这么呆着？”他反问我：“高校长，

您说，这年头我不呆着干什么？”我说：“组织人，抗日！”他说：“您领头，我干！”我说：“中！”接着，我还发了一通议论。我说：“人家陈胜、吴广能造反，人家洪秀全能起义，不信咱们就不行！朱洪武放羊出身照样得了天下！咱们不干就得当亡国奴，要干就得豁出去，死不回头。”说着，我掏出半盒“名片”递给他：“用我的名义，你去拉人吧！”

王殿带着我的“名片”，在无税庄一带挨门挨户地游说。他讲抗日道理，说很多地方都干起来了。问熟识我的人：“高校长的司令，你们干不干？”因为我在那一带也当过校长，有点威望，所以很快就拉起四百多人。人拉起来后，王殿便打发人接我去，还送我一把美国橹子。我为了表示决心，就闹着要把家里的房子烧了，好专心专意，无牵无挂地去暴动。我母亲死死拉着我，说你烧了咱家不要紧，左右街坊也跟着挨烧，你出去抗日，我不管，只是不要害巴好人。我心软了，没有放火，就动身去无税庄了。

到了无税庄天已黑了，第二天，我叫王殿把人拉到村外的孙家坟地。我就站在孙家坟地的祖坟头上讲话。我大声喊：“弟兄们！你们今天都扛起枪，跟我高某抗日来了，你们都是好样的。咱们宁死不当亡国奴，不把日本强盗打出中国去，咱们誓不罢休！跟我出去就得准备吃苦受罪、流血牺牲，谁也别想升官发财。抗日嘛，就得豁出去。现在，真心抗日救国的站在东面，想发洋财的站在西面，枪是你们自己带来的，我一支也不要。”话音未落，大家“呼啦”一下都站到东面去了。我激动地冲大家深深地鞠了个躬，然后下命令：“出发！先打马各庄联庄会。”

我们把马各庄包围起来，枪一响，联庄会的人就跑了，一个人影也没抓到，只得了几条枪。进村后，我把司令部设在一个姓任的大地主家。部队安顿下来后，我就吩咐姓任的这家地主给做饭。我说不用做好吃的，小米饭，大葱蘸酱就行。他们回说：“东

家不在，没有粮食。”我把眼一瞪：“什么？这么大的财主没粮食？翻！”战士们一翻，好家伙，整屋子的大米、洋面、小米、豆子……什么都有。我说：“还是做小米水饭，从他家后院拔葱。”就这样，我们起义后的头一顿饭总算凑合下来了。当时我也不懂什么政策，一怒之下，命令部队开仓济贫。让没吃没喝的穷人来领粮。开始谁也不敢来，我说完全由我负责，领粮的也不记名，不上册。很快，人就来了，热热闹闹地把老任家三间库房里的粮食都分光了。分完后，一个老太太找我，说她来晚了，什么也没闹着。我一看门后头还有两袋面，就让她找个半大小伙子一块抬走了一袋。不一会儿又进来个老头儿，也说没分到粮食，我说：“好，这一袋给你，这回就一干二净了。”老头儿谢天谢地，扛着面走了。

旗开得胜，我又把队伍拉回油榨镇一带。我懂一些“武是关防文是印”的知识，就花了五元钱，刻了一个“华北人民抗日军司令部关防”，“关防”是长方形的，印是正方形的。队伍拉起来了，还干点什么呢？当时老百姓找我们来告石崖村的土匪。我想，历史上谁得人心谁得胜。现在如果能为人民除恶安良，就一定要受拥护。于是就决定打这股土匪。

石崖离油榨镇二里，是个大村子。土匪的大头子姓邵，二头子姓瓮。他们为非做歹、强奸幼女，老百姓恨他们恨得牙根疼。我象打马各庄一样，把石崖包围住。土匪比联庄会可厉害得多，他们扼守村庄，一步不退。我们打了半天也冲不进去。后来，我叫人把一户地主的房子点了，大火一起，土匪乱了阵脚，最后他们夺路而逃。我们又带人把他们包围在韩寨子。我们人多势众，老百姓又拥护。土匪只有百十号人，一离开老窝，他们心就虚了。我们抓住他们的心理，说服他们，让他们投降。那时我也没有多少理论，就给他们举一些例子，我说：“当土匪，没出路也没有好结果，从古至今哪个当土匪的得好了？吃喝嫖赌赵匡胤，人家

回头，当了皇帝，治国安邦。你们应该早点回头，改邪归正，咱们共同打日本鬼子。打日寇死了也光荣，以身报国，是中华好儿男。打跑日本子还愁没饭吃？”姓邵的本来已走投无路，经我这么一劝，就带队投降了。我把他们编为第三大队，任命姓邵的当大队长。

听到我们暴动的消息后，伪县政府里的老爷们惊慌失措，他们把全县的军警都调进卢龙城，以防万一。我们呢？也确实准备攻打县城。我选出七十人的敢死队，跟我去打县城，把其他人都留在滦河西的石梯子村，等候消息。临走我嘱咐他们："如果前面得手，你们就随后进城；如果失利，你们就回家。"我想：成败在此一举，不是攻下县城，就是自己阵亡。

到卢龙城外，举目一看，军警和保卫团早站在城墙上了，他们持枪荷弹，准备应战。我先派人把县城周围的电话线割断，然后我走到城东南角外面的娘娘庙前，登上庙台，冲着城墙上的军警喊话："弟兄们听着，咱们都是中国人，都不想当亡国奴。我们起义是为了抗日。现在我们要进城捉拿日本顾问。你们快叫'牛犊子'出来讲话！"当时的县长姓牛，"牛犊子"是我们送给他的绰号。城上有一个人也大声喊道："牛县长不在这儿，他在西城等着高校长呢。"我说："我现在是抗日军司令，你们快去传我的命令，让'牛犊子'来东城听话，如不来，我攻进城去，'鸡犬'不留！"过了好一会儿，"牛犊子"才冒出头来，在东城墙上点头哈腰地招呼："高校长，你辛苦了，辛苦了！这回剿匪有功，剿匪有功……。"我说："你放屁！我是华北抗日军司令，抗日的，给你剿什么匪？！"他说："你现在缺什么？缺钱？缺粮？兄弟给。"我说："用你给？现在我命令你开城。你要愿意跟我们抗日，你还当你的官。反对抗日，我进城后先扒你的皮！"他皮笑肉不笑地连连说："等兄弟跟大伙商量一下，等兄弟跟大伙商量一下。"就缩了回去。过了一会儿，城上系下六个人来。我估计是来跟我谈判的，其中还有"忠盛馆"的跑堂王老巨。这个王老巨跟我很熟。"牛犊子"想让他来劝我。我心

想："哼！休想软化我！"于是我用枪指着他们："是朋友帮助我进城，是冤家就劝我别进城，冤家路窄，我高某认人，我这枪子儿不认人？"他们一听这话，知道没有回旋的余地，大眼瞪小眼地站在原地不敢动弹。还是王老巨来得快，他说："我们来看看你嘛，跟我们别生这么大的气嘛，大热的天，弟兄们都辛苦了。缺什么，短什么，我们帮你办办。"我说："我啥也不缺，就是要进城。这城不能让日本、汉奸占着。"这六个人没敢说别的，赶忙让城上的兵士把他们拽上去了。

城上黑压压站满了人，其中有不少是我的朋友、同事和学生。我冲着他们说："中国人都应该起来抗日救国，谁也别帮助'牛犊子'。我高某在城里只有两个仇人，一个是日本顾问，一个就是汉奸'牛犊子'，剩下的都是好弟兄……"我见城上没有什么举动，估计"牛犊子"不会乖乖交城，就告诉王殿，让他带着队伍，在太阳落山前，从东南角集中火力攻城。我还嘱咐王殿："就说是我说的，谁先冲上城墙，有赏！"说了之后，我就带着一个护兵从东南角开始边走边冲着城墙骂"牛犊子"。我不停地大骂："'牛犊子'是吃里爬外的汉奸，他不是黄帝的子孙，不是中国种，是我们共同的仇人。有种的，起来抗日，打死日本鬼，活捉'牛犊子'。我高某人，要是干过缺德事，你们就冲我开枪！"就这样，一直骂到北门。骂得口焦唇燥，实在没劲了，就躺在北门外歇着。城上的人往下给我扔仁丹、扔西瓜，西瓜落地摔得稀烂。

太阳落山时，东边枪响了，我马上跳起来，跑到城门底下，这样，上面就是打枪也打不着我了。我想起兵书上说的"兵不厌诈"，就冲着庄稼地大声喊："传我的命令，不准开炮，不准打机关枪，城里都是自家弟兄，别打了老百姓！"然后，又冲城上喊："东门已经打开了，立了头功。你们还不立第二功！立功者有赏！"就听上边嚷："接着！"扔下了枪和军帽。我冲上喊："别扔啦，快把门打开！"等了足有一袋烟功夫，门才开了一条缝，我生气地问："怎么

这么慢！”挤进去一看，原来，整个城门洞都是用沙袋子堵死的。我和护兵挤进去后，让所有的军警都站好队，把枪倒背着。我下令：“向右转！开步走！”我和护兵跟在后头，大摇大摆地进了县城。东面王殿他们也攻进来了。这就是所谓“高敬之骂城”。我所以能把城门喊开，一是由于抗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一是我有武装作后盾，有朋友作内应。敌人也摸不清我们有多大兵力，所以被我连骂带诈，乖乖地开了城门。

进城后，我把俘虏的枪都缴了，给他们讲了讲话，让他们先去吃饭，愿意抗日的改天再来。然后我带人到警察局。警察局里的人提心吊胆地迎接我，他们心里紧张，脸上还是装出笑模样，看上去别扭透了。我冲着姓张的分局长说：“张秃子，你不用怕。你转告李局长，你们两个没大罪，又都是外乡人，就是官迷。你们愿意走就走，我给你们拿盘缠，可有一节，到别处混事，别坑害老百姓。”我还派人捉拿日本人和“牛犊子”，这俩家伙都跑了。后来我们打下双望镇，我听镇上的一个医生说，“牛犊子”是从西边城墙上跳下去的，腿摔断了，还是他给“牛犊子”上药、包扎好，送走的。我问：“你怎么能救‘牛犊子’？”他说：“我也不知道是老师您攻城呵！”

原来我以为城里没多少好人，一个个游手好闲，加上几个大劣绅经常横行乡里，就想把卢龙城付之一炬，把官僚、劣绅斩尽杀绝。我命令人准备下煤油，打算从姓傅的大劣绅家开刀。动手前，城里的一群朋友把我请到商会会长、布商邱聚峰的商店。随我去的除护兵高歪脖子外，还有我收编的土匪二头子老瓮。护兵高歪脖子是山东大汉，曾在东北军里干过。据他自己说，谋杀张作霖的两个凶手杨宇庭、常印怀被张学良捉住后，是他枪毙的。这个人双手使枪，双手使筷子。有一次吃好饭，小伙子们抢起来了。高歪脖子说：“好！看谁能抢！”双手举筷，左右开弓，同桌的小伙子们都傻了眼。

朋友们远接近迎，把我让进屋，落座后，就开始捧我。什么“雄才大略”，什么“肝胆照人”，什么“旗开得胜，出手不凡”……王老巨说：“听说你还要把傅、哈两家大绅士烧了，好是好，烧这两家没人心疼，就是还得连累别人。你抗日，我们拥护，众人捧柴火焰高。听说是你进城，平民百姓没有害怕的，大伙儿信得过你，拥戴你，你来了能安居乐业……”这个王老巨！真是能说会道，说得我回肠九转，想了想，决定不烧不杀了。正谈着，老鲝忽然和一个人口角起来，还要起威风。我劝他：“算啦！过去的事情了，一笔勾销它吧。”他不听，还是横眉立眼地吵个没完。我气急了，在灯影底下扣扳机，打他一枪，心想把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干掉算了。谁知枪上着保险，没响。高歪脖子眼尖，他见我没打响，就凑上去，用右手轻轻拉老鲝的衣襟：“鲝队长，司令劝你呢，少说几句呗，少说几句……”“啪！”他扬起左手照老鲝左脸就是一枪。姓鲝的正好倒在我腿上，我乘势把他踩在脚下，把他的枪拿了过来。登时，屋里的人被吓得魂飞魄散，有的惊叫一声倒在炕上，有的张着大嘴坐在地下……外面的战士吆喝着，枪栓拉得劈啪乱响。我大喊一声：“谁也不准动！枪走火了，没事儿！”然后，一边擦我身上的血，一边命令护兵：“拉出去！这个狗东西，不识抬举！”

第二天有人报告说：“邵队长带着十几个人，都提着枪，找你呢。”我一听来了气：“妈的，还不学好，给我把他抓来！”

战士们在理发馆找到了他，他正理发呢，就不由分说，下了他的枪，给我拉来了。我瞪了他一眼：“让你学好，你恶习不改。去！让你那把子人把枪都交出来！”我又吩咐押送他的人：“带上机枪，不老实，把他们全给我‘嘟嘟’了！”到门口，姓邵的就跪下了：“弟兄们，我惹恼了司令，司令怪罪下来了。咱们在一起干了一场，看在我的面上，你们都把枪交出来吧，听司令处置。你们不交枪就先把我打死……”那帮土匪一看这阵势，把枪抱了出来。

战士们把他们都捆起来，送到司令部。当时有人提议，把他们都杀了，这些不干好事的土匪，留下早晚是祸害。我自有主张，先下令把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老邵推出去正法，然后回过头来正告其他土匪："你们都是穷人，没法子，才走上这条路。现在你们光想发洋财，哪有心思抗日！好吧，我今天放了你们，还当你们的土匪去吧，只是不准害好人。谁干坏事，让我逮住，就跟老邵一个下场！你们要绑票就绑土豪、劣绅、日本、汉奸，绑得越多越好。"

为了稳定城内局势，我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把劣绅们也叫去了。我把枪往桌子上一放，就大讲抗日道理。最后我说："旧仇、旧怨，烟散雾散，咱们从今天划界，凡是抗日的都是好同胞，凡是通敌的，帮敌人办坏事的都是汉奸。我高某人跟日本、汉奸不共戴天！谁通敌，我逮住就杀，别说我六亲不认，不讲交情。我今天只处决了两个人，一个是土匪头子老邵，一个是坏蛋刘督察长，其他的都没动。我能杀，不杀，'光棍回头，饿死马牛'。只要从今以后不再干坏事，咱们就是朋友……"这以后，市面上秩序井然，人心也很稳定。

当我正在发愁下一步棋怎么走法的时候，有人送来一封"冀东抗日联军"第五总队李润民总队长的信，信中表彰我的抗日义举，希望和我取得联系，以便互相配合。我问："李润民是不是共产党？"送信的人挺自豪地说："是！还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呢，在红军里就当过团政委！"我说："那好，是共产党我就欢迎。你回去报信，就说我高某欢迎李总队长，如蒙光临，我将出城相迎。"在一个晚间，第五总队开来了，我迎到城外河沿，见面后紧紧握手。李润民操着南方口音高兴地说："老高唉，你真行！"我也兴奋地说："可把你们盼来了，进城吧！"我又和他的政治部主任高培之握了握手，就牵着马，亲亲热热地进了城，并把他们安置好。第二天我在大街上碰见一个人，看着面熟，一问，闹半天

就是在滦县见过面的阮务德。我拉着他，让他到我这边来。他说："我在五总队，是有组织的，不能随便到你处去，得请示李司令。"我说，"好，咱们一起去见李司令。"我见到李润民，说："找你们这么多年了，今天总算找到了，精神上有依托了。我是一棵没根的蓬，现在好了。我把队伍交给你，我给你们抄抄写写也行，铡草喂马也行，就是不会带兵打仗。"李润民说："老高唉，你打仗打得挺好嘛！连县城都打下来了嘛，怎么不会打?!别客气哟……现在咱们队伍多了，得编编号。"我说："我是磨道的驴子——听喝，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李润民把我的人编为"冀东抗日联军"第二十三总队，由我任总队长。他还给我一捆票子，作为活动经费。我不要，说："我不缺钱，你给我金山银山我也不稀罕。我缺干部，你把阮务德给我吧！"经研究，李润民就把阮务德同志派到我们总队当政治部主任。老阮虽然年轻，但知识丰富，理论水平也高，是一个非常能干又非常谦虚的好同志，战士们都很喜欢他。

编队后，我们打的第一仗是在双望镇。我牺牲一个战士，缴获一部分枪支弹药，百、八十人的伪保卫团，俘虏一部分，溃逃一部分。这仗打下来，连夜又把抚宁县的卢凤口攻了下来。第二天，李润民那边来了命令，让我回师配合他打台头营，那时我手下已有三千多人。当我们离开卢凤口时，发现从秦皇岛方面开来八、九百鬼子。他们分成两股，一股扑向台头营，一股截击我们。我们的人虽然多，但都没见过大阵势，鬼子一打炮，飞机又一轰炸，就懵了，第五大队长王子良同志当场牺牲。我们顶不住，被迫撤到滦河西。撤出战斗后，部队还有一千多人。不久，我们配合兄弟部队打下乐亭县城，从乐亭县城出来，又同糯米庄的日本子打了整整一夜。这一仗打赢后，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请我吃饭。这个人总爱低着头，偷眼看人，贼眉鼠眼的。他说："要不是大哥你，兄弟我就砢碜了。"我说："怎么呢？"他说："你不把日本

子打跑，我司令部还得搬家，不就丢人了吗？”我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他眨着眼挺诡秘地接着说：“大哥，眼下咱们同共产党联合抗日，得小心着点，别让他们‘赤化’了。”我不解地问：“‘赤化’了怕什么？我想‘赤化’还‘赤化’不了呢！”他说：“不好，不好！兄弟不骗你，还是小心着点好。”我心想这小子不地道，是想拉拢我呀。事后，我见到李运昌同志，问他：“你怎么不当总司令？非让地主民团头子高志远干？高志远这个人不好，他还警告我，让我别‘赤化’了。”李司令说：“统一战线嘛，凡是抗日的，我们就联合。至于职务，是组织上的决定，是为了联合抗日。……”我当时对“统一战线”是何物还闹不清，但对共产党的组织决定可有点体会，我拉阮务德时，他不是也说“我是有组织的，不能随便”吗？因此，我更佩服共产党了。在我的眼里，共产党员就是“完人”！

打下乐亭，我们分了许多白布。我把这些白布送到染坊里，一律染成灰色，然后让老乡给做成军装。没几天，干部战士就都穿上崭新的灰布军装了，看上去精神多了。有一天早饭后，省领导姚依林同志来冀东检查工作路经我军驻地大贺庄子。他穿着大褂，戴着礼帽，到村口，突然被我们的哨兵拦住。哨兵一看他这身打扮，就粗声大气地问：“干什么的？”姚依林同志一看，误以为是伪军，没有精神准备，急切中说自己是买卖人，哨兵一个劲儿追问。姚依林同志又改口说自己是教书的。哨兵看他“可疑”，就送到司令部。我正和阮务德同志聊天，见送进一个人，就站起来。老阮把来人仔细打量一番：“哟，老姚，你这是从哪来呀？”姚依林同志没有回答，反问：“你不是阮务德吗？”阮说：“是啊，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不认自家人了！这是我们高司令，这是姚先生。”姚依林同志问：“你们是啥队伍？”我答：“抗日的队伍。”姚说：“我还当是伪军呢！你们怎么搞的这么整齐，那儿的布啊？”我说：“打乐亭分的。”说着，大伙乐了一回。然后，我们把工作向姚

依林同志作了汇报。

到秋后，上级调我们西进。在司令部，我见到李运昌、胡锡奎等领导同志。李司令让我们走南路。当我们走到密云潮白河时，遭到敌人的截击。我们打了一下，因为长途行军，十分疲惫，又无准备，仓促应战，所以受到很大损失。在那种情况下，阮务德同志仍保持乐观情绪。有一天，老阮在队前讲话。他背着手问战士们："同志们饿不饿？"战士回答："不饿！"阮务德同志说："你们不饿，我饿。不过，饿也不能扒老乡的小白薯吃，听见没有？"大家回答："听见了！"说着，老阮把手从背后拿过来，攥着一块大白薯，大口大口地咬起来。战士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有个挑皮的战士问："你说不让我们吃，你干么吃呀？"老阮认真地说："这是小白薯吗？你们说我这是小白薯吗？我不让你们吃小白薯，让你们吃大的。"说罢，大伙又是一阵笑。老阮接着说："我已经和老乡说好了，钱也付给人家了。这块地的白薯，咱们捡大的吃。"

我喜欢老阮，还因为他打仗勇敢。只要是向敌人进攻，我们几个当头的，全都冲在最前头。老阮虽是政治干部，一次也没有落后。不幸的是，在一次遭遇战中，他英勇牺牲了。那是在西撤受挫后不久，我们进驻卢龙县的安河。滦县的鬼子中队一早儿就坐着汽车前来偷袭，同我们在安河村外相遇。我带着队伍冲了上去。我打头，参谋长第二，阮务德第三，后面是杨参谋和战士。我忽然发现鬼子正冲着我们支起机枪，就连忙喊了声："机枪！卧倒！"同时，我卧倒在地，奋力一滚，脱离了险区。参谋长也趴下了。老阮和杨参谋躲闪不及，被机枪的火舌扫倒了。战士们都被打散了。我跑进一片坟地，并往远处移动。事后，我回去找老阮，他已经被老乡掩埋了。听老乡们说，老阮尸体下有一堆撕得碎碎的纸，那一定是他在临死前，忍着剧痛把身上的文件、名册等毁掉了。当时，我是多么悲痛呵！老阮！我的好兄弟，我的好老

师！你的模范行动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安河一战，我的队伍被打散了，我最亲密的战友阵亡了，我的心情十分沉痛，但我不肯就此罢休。要是在几个月前，我也许会冲到敌人枪口上去，以身报国。现在我要学习老阮的样子，乐观！再乐观！坚定信心，给同志们报仇，把鬼子打出去！

当我提着枪一个人孤零零地走进油榨镇，老乡们的眼里流露出同情、惋惜的目光。他们闭口不问打仗的情况，只是往家里让我。我理解乡亲们的心情，执意不吃饭，只要了点热水，喝了两口，就去收拢失散的战士。我挨村挨户整整找了两天两宿，找回三百多人。鉴于以往的教训，这次我把队伍拉进了山。在山里，正好碰上李润民、高培之他们。进屋后，玩了一回。李润民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说："老高唉！快布置队伍吧，敌人已到杨柳庄了。"

我们刚把队伍拉上山去，敌人的追击炮就响了。没经过训练的农民就是怕炮，炮一响就稳不住阵脚了。真是兵败如山倒啊！部队往下一撤，流水似地向东奔泻。我大喊："不能往平地跑！进山！"但无济于事。当时跟在我身边的还有九名战士。我下令："快去抢马，咱们骑马进山！"我们每个人从小坡上抢了一匹马，骑上就往山里飞奔。跑到一座山下，上面突然一声大喊："站住！再跑开枪啦！"我心里话："这才叫'走麦城'呢！就死在这儿吧。"于是，我对战士们说："你们都把马头掉回去，我一个人上去。如果是自己人，你们再上；不是，我就跟他们拼了，你们就往外跑。"

我提着枪走上去，一边走一边喊："我是高敬之！抗日的！你们要是汉奸就开枪吧！"上边也有人喊："上来吧！我们也是抗日的！"原来是周文彬主任带的队伍。我们会合在一块儿，下山后，住在迁西洼子地。在洼子地，房子不够住，周文彬主任就带着人住牛棚，把房子让出来给我们住。我寻思："到底是共产党的队伍！天这么冷，让我们睡热乎炕！"

次日，我们继续往北走。又过了一天，周主任兴奋地告诉

我："找到关系了，李司令在陈家铺头。"我说："这个庄名真别扭，四个字！"于是，我们就赶到陈家铺头。见到李司令，我开口便说："高敬之只有十几个人了，你要不要？"李司令握着我的手说："要！怎么不要？"从此，我就跟着司令部活动。后来，司令部在迁西柳沟峪开会，决定重整旗鼓、恢复地方工作，坚持冀东游击战。在会后编队时，才一百多人。司令部带着这一百多人到潘家峪、黄昏峪，又拉到洼子地。

一天，天下着小雪，李运昌、周文彬、陈获等同志找我谈话。李运昌同志说："经过党委研究，决定吸收你入党。"我一听这话，又激动又着急，忙说："我不行！"他说："怎么不行？"我说："我不够格，什么也不懂，脾气又暴躁，别给共产党减色！我听党的指挥，保证党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领导同志们听我这么一说，都笑了。最后，李司令说："共产党员也是人嘛，党的知识慢慢学。经过这一段斗争的考验，你完全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到啥时候都不灰心，要革命到底！"

当时，我心里一热，眼里就开了泪花。最亲、最了解我的还是党呵！我从愤世到暴动，走的是一段多么不平坦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多少人帮我、扶我呵！乡亲们、朋友们、战士们……于是，我又想起了倒在我身边的战友阮务德……

（星城　整理）

从拼命到革命

曹致福

许多同志是由于接受了革命思想才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不是，我是被逼上梁山后才逐渐懂得革命道理的。

我十六、七岁的时候，父亲把我送到迁西县三屯营上学，托一个朋友照管着。那时，父亲望子成龙，盼着我念好了书闹个好前程。我自己也想多学点本事，好有所作为。这样，我就远离故土，去三屯营求学。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到三屯营不久，就碰上一件倒霉的事：我上学那年月，到处都是土匪。有一天，半夜里一股土匪“光临”我们学校，把我们三十二名住宿生一齐绑走，带到一座山上。我听说过土匪绑票的事，但土匪绑票都是绑财主、股东什么的，好让这些有钱人家去赎。绑我们这么多学生干什么呢？原来，这股土匪认为凡是念得起书的家里都有钱，把念书的绑走家里必定来赎。所以，他们限定时间让家长拿钱赎人。由于抓走这么多人，家长们就闹着让官府出面解决。那时的官们搜刮民财的劲头大，为老百姓办事就找不到他们了。所以，尽管校方和家长一再催促，官府还是只答应，不办事。我们在山上呆了一个月，挨饿受冻，挨打受骂，可受了大罪，有一个同学还被土匪活活打死。这样一来，事情闹得更大了，家长们不干了。迁西县政府只好派出县自卫团把山围住，然后设计捕了土匪，我们才算脱了险。

回到学校，我前思后想，觉得书再念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弄不好还可能把小命搭上，就退了学，回到滦南喑牛淀老家。一

进家门，又碰上一件丧气的事：母亲被地主民团打伤，正在炕上躺着。我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便把挨打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原来，我的叔伯姐姐在婆家总挨打受气，便跑回家来。她公公来要人，我们家不给，跟她公公辩理。她公公就回去勾地主民团来我们家行凶抓人。他们打死我的一个叔伯哥哥，把我母亲也打伤了，还砸了我家的锅碗瓢盆……我一听，气得火冒三丈，发誓要和他们干一场。我说："告他们，太无法无天了！"当时，有人劝我："算了吧，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不听，说："这是明摆着的理，到哪儿也讲得出去，打死人还能不偿命吗？"于是就到滦县县衙门里去告状。跑了几趟，毫无结果，气得我两眼冒火星，我就把衙门、地主、民团统统骂了个够。心想，有朝一日我要得了势，非把他们千刀万剐不可！那时，我四大伯在东北做事，父亲就劝我去找他，也谋个事做，省得在家里"惹事生非"，弄不好，还会大祸临头。我跟父亲说："你去吧，我不去，高低得闹个水落石出！"父亲见劝不动我，他只好一个人去东北了。

开始，我听说红军好，他们专门杀富济贫，便想去找红军。可那时红军还没过来呢，到哪去找呵？后来，听说滦河东"土匪"（即义勇军）闹得挺凶。我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找"土匪"去。我就离开家，过了滦河，去找"土匪"。找了几趟，连个"土匪"影儿也没找到。因为滦河东是"匪区"，谁去那里也被注意，我来回过滦河，就被特务盯上了。结果，想借"土匪"的力量报仇雪恨的愿望没实现，反被特务抓住了。母亲只好托人帮助卖地，用卖地的钱把我赎了出来。我出来四、五天，母亲连病带急，离开了人间。母亲死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便用卖地剩下的钱买了一支手枪，决心跟地主拼了。我带着枪在倴城大街上转来转去，寻找拼命的机会。我还没有寻到仇人，大地主刘兰田就指使特务把我再次抓进监狱。

在狱中，我认识了一个叫于从杰的难友。他是我们滦南后曲

荒店村人，从十几岁起就给本村财主于从肖、于从祥扛小活。他对财主的残酷盘剥愤恨已极，不断斗争，因而也经常挨打受骂，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逃出家乡，另谋生路。一九三四年，他到滦县伪保安队当兵，不久，被送到教导队受训。在那里，他得以接触共产党派去的张鹤鸣等同志，受到抗日救国、革命求解放等思想的影响，就秘密参加革命活动，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发生刺杀刘佐周案后，他同我一样，也是被当做谋杀刘佐周的嫌疑犯抓进监狱。

刘佐周是个有名的大汉奸，他来到滦县后，一手把持伪保安总队的大权。他横行无忌，排斥异己，除了日本鬼子外，他谁也不放在眼里。这就惹恼了滦县的民团头目高志远。刘佐周、高志远两个实力派明争暗斗，互相倾轧，矛盾越来越尖锐。地下党组织分析了这种情况，决定争取高志远，除掉刘佐周。那时，高志远怕刘佐周把自己干掉，已经深感不安，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后，他胆子壮了起来，就先下了手，在滦县车站把刘佐周打死了。高志远刺杀了刘佐周，安然无事，而于从杰我们与此案根本无关的人却被抓进监狱！

在跟于从杰的接触中，听他讲了不少关于抗日救国的道理。由于他是从伪保安队来的，我对他讲的那些道理，只是哼哼哈哈，生怕他是来试探我的特务。

过了三个月，我俩先后出狱，于从杰出狱后就搞到一支枪，亲手打死一个作恶多端的汉奸。我这才相信他，跟他一起联络人，活动在滦县的南傣城、胡各庄、喑牛淀一带。当时，我寄宿在甜井村。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我和于从杰趁喑牛淀伪自卫团酗酒作乐、猜拳行令之机，摸进院子，扛出两支步枪。有了枪，胆子就大了，决定先打喑牛淀的洋行。

喑牛淀镇上只有三个洋行，一个叫丰中洋行，一个叫中礼洋

行，还有一个叫大安洋行。办洋行的日鲜浪人，欺压坑害老百姓，坏透了。所以，在一天夜里，于从杰我俩带十来个弟兄悄悄摸进村，把丰中洋行砸了。丰中洋行的经理很顽固，他不走，继续办洋行，我们又去砸了一回，这回我们索性把那个经理活埋了，把另外两个洋行也砸了。由于洋行用鸦片、吗啡等毒品害了不少人，所以我们砸了它，是很得人心的。

一九三七年六月，我假装赶集，潜入喑牛店去侦察。在集上，有个人正吆喝着卖枪。我凑过去，把他的枪拿过来看了看。他问我要不要，我说："你这也叫枪？还卖呢？这种'本地造'根本打不响。"他说："打不响不要钱！"我好奇，当时试了一枪。结果无意中伤了他，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死在我家。为这件事，我再次入狱，被判了三个月的徒刑。在这三个月，我目睹了反动统治阶级残害革命者的惨状，自己也尝到了各种苦头，所以一出狱，我便暗暗立下誓言：今后，就是掉脑袋，我也不再进监狱。

一九三八年，王仲华同志来滦县组织抗日暴动。他看上了于从杰我们这些"穷小子"，就找我们联络。记得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龙王庄的刘运太家。当时，他热情地跟我握手，说他了解我的经历，希望我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抗日。他很健谈，几句话就点明了抗战的形势，提出了眼前的任务。我听了，觉得有了奔头，眼睛也亮堂了，就说："没别的，我干，死不回头！"仲华同志很高兴，他简要地传达了在冀东组织抗日暴动的计划和注意事项，要我们抓紧时间做准备。这以后，我、于从杰，还有王仲杰等就开始在他的指导下，进行抗日的宣传鼓动及联络等方面的工作。那时，我什么都不怕了。为了搞枪，我曾单枪匹马闯进五里坨据点，对民团说："我们要抗日，你们把枪交出来吧！"民团也不知我有多大来头，就乖乖把枪交了，人也散了。那次我一共缴了他们二十五条枪。

到七月，我们带起一千多人参加冀东大暴动。暴动后不久，

我们就和兄弟部队一起攻打乐亭县城。我和于从杰带人攻东关。拿下东关派出所后，我们迅速登城。城上的敌人顶不住了，便打出白旗，请求投降。我们奉命把队伍撤下来，等着受降。等了好一会儿，敌人不仅不开门投降，反而加强了守城力量。原来他们用的是缓兵计！当我们准备再次攻城时，滦县的敌人赶来增援。起义部队只好转战打下了倴城。在倴城，王仲华同志安排我当督察处长。

在"抗联"内部，高志远闹宗派，排挤王仲华同志和我们这些贫雇农出身的干部、战士。在王仲华去铁厂开会时，高志远委任他的亲信、地主孙善交当警备司令，打击异己，镇压革命者。他们首先解除了我的武装，撤销了我的职务，把我关押起来。同时他们枪毙了七名雇农出身的抗联战士。在于从杰等许多干部战士的压力下，高志远没敢把我杀掉，七天后将我放出。

王仲华同志开会回来后，仍以大局为重，一面与错误倾向斗争，一面说服高志远，还帮助我分析问题，讲争取大多数人共同抗日的道理。为了抓一支靠得住的人民武装，他让我组织了一个独立总队，作为一只拳头，以防万一。

在二打乐亭县城以后三、五天，上面传下命令，让我们立即撤到平西去整训。西撤时，我们走到蓟县马伸桥北的赵各庄，又冷又乏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就停下来休息，准备吃早饭。一小时后，开饭了。我端起粥，刚喝了一口，哨兵就跑来报告，说马伸桥的敌人出动了。马伸桥离赵各庄仅五里路，所以形势非常紧迫。我撂下饭碗就集合部队。这时，王仲华同志走过来，命令我立即带队去阻击，掩护随军的省委机关转移。他当时很冷静，严肃地对我说："一定要把敌人顶住！等领导同志转移到安全地带以后你们再撤。"我答应了一声"是"，就带队抢占了村南的坡地。敌人已发现我们，一个劲儿往我们这边打炮。我回头看了看随军的领导同志，他们走来走去，一点儿也不慌乱，我也镇定下来了。

我带的这个大队共二百多名战士，都是刚从乡下出来的农民。他们没打过仗，也没遇到过这么危险的情况，所以有些慌。但在正副大队长于从杰、王仲杰的带动下，很快就进入了阵地，开始向敌人的马队射击。

首长们开始往北撤退，突然，一发炮弹落在副司令员陈宇寰的身边，他当即阵亡……

我咬着嘴唇与战士们坚守坡地，阻击敌人。那时候我们连手榴弹都没有，所以打得很吃力，而敌人的炮却越打越凶。我们坚持着，从八点钟一直打到十点多钟。许多战士倒在我的身边，于从杰同志也中弹牺牲了。我急了，紧紧握住手枪，指挥战士们猛揍敌人。忽然，有人嚷了一声："队长！敌人围上来了！"我一看，可不是，敌人分两路包抄过来，再不走就要全军覆灭了。我把枪一举，吼了一声："往北撤！"战士们就跟我往北突围。王仲杰同志在战斗中，被打断了左腿，头部也被子弹打穿。同志们背着他往下撤，他怕连累战友，执意让同志们把他放下。当时，大家都抱定生死与共的决心，怎么肯把他丢下！王仲杰同志掏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打了一枪，为革命、为战友们的安全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同志们含着热泪把他平放在地上……

第二天，丁振军同志带人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后来他告诉我，一共有一百一十多名同志壮烈牺牲。敌人的伤亡也很大，据老乡说，他们连夜运走好多车尸体。

一些刚刚离开庄稼地的农民，在战斗中能打得这么勇敢顽强，是很不简单的。特别是于从杰、王仲杰两位战友，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和倒在他们身边的一百多名战士是永垂不朽的！

我第一次看到牺牲这么多可爱的同志，沉痛极了，决心报仇雪恨。我下定决心：再也不离开枪，再也不进监狱，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就学王仲杰……所以，当我找到司令部、见到李运昌

司令员时，就表示了革命到死的决心。李司令员鼓励了我，安排我担任司令部的通讯科长兼骑兵大队长。不久，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后来的冀东游击战争中，由于斗争的残酷和环境的恶劣，有时，打散了，只剩下我孤身一人，但从没灰过心。因为我一直记着倒在我身边的那些战友，我要为他们报仇，我要把他们的理想变成现实，将革命进行到底！

（星城　整理）

出　　路

张振宇

我是滦县大门庄人。原来家里很穷，父亲闯关东，做小买卖，正赶上日俄交战，被俄国人抓去当了劳工。俄国人让他给喂马、养牛。父亲为了脱身，假意殷勤，取得了俄国人的信任。后来他主动提出帮助俄国人买牛。他买的牛又省钱又肥，所以进一步讨得俄国人的欢心。于是，俄国人就让他当了"买办"，放心大胆地让他单独外出买牛。他得到这么个机会，就拐了一笔买牛的钱跑回家来。他到家，头一件事就是置地，一次就置了四十亩。

我父亲置地、买牲口，一心想发家，我也这样想。但怎样才能发家呢？我找了很多门路。开始学织布，织布挣不了几个钱，改学裁缝，裁缝也不行，又改学打铁。俗话说："木匠干一天，不如铁匠冒冒烟。"我以为打铁能赚大钱，就在唐山南厂打铁，可到头来大钱没赚上，每天倒赚一身大汗。我泄了气，便回到家里混日子。我小时就是村里有名的"嘎子"，好打架，大点了好打抱不平。看财主们有钱，胡作非为，我生气，专跟他们作对。那时日本人在冀东搞了个伪防共自治政府。这个鬼政府，为了防共产党"暴乱"，为了镇压穷人造反，规定每五十亩地买一条枪，还要求成立地主武装——民团或联庄会。我们家超过五十亩地，应该买一条枪，但我父亲不愿意买。我说："咱光挨财主家欺负，发家又发不了，就豁出去吧，买了枪好不挨欺负。"父亲说："你看着办吧。"勉强同意了。那年头，买一条枪要百十块钱，一亩地才值二十多块钱。我卖了十来亩地，买了两支枪：一支是本地造的冲锋枪，一

支是三号德造盒子枪。我父亲见我买回两条枪，便责备我："按地亩咱买一支就中了，你买两支干什么？"我说："光我一个人？还有一个伙计（雇的长工）呢，看家不得两个人两条枪呵。"父亲虽不高兴，也没法儿。

一九三三年，李运昌他们来，成立农会，搞农民运动。我们庄也成立了，分大会、小会。小会是"穷人会"。我家是中等户，穷人选我当"穷会"会长。有了穷人的支持，我更放开胆子同地主闹别扭了。那时，乡村的政权都把持在地主手里，我们就跟他们唱对台戏。他们要公粮，我们不交；要地亩捐，我们也不交。后来一个地主出面诬告我偷枪，通"共党"。结果狗政府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抓了起来。我不服，他们又弄不到证据，关了些日子，就把我放了。我出来后，就组织一帮人，找机会，打算收拾那个地主一顿。没想到还是人家财大气粗有手段，没等我们下手，就又把我们弄到监狱里，关了六个月。这六个月实在难熬，敌人用尽各种酷刑，逼我招供。他们用洋钉子钉我的核桃骨；用子弹壳别我的肋条；把我的两个大拇指和两个大脚指拴住，吊起来，再往脊梁上压砖，这叫"上大挂"；还有坐"老虎凳"什么的。我什么刑都受了，被整得死去活来，就是不招。后来，我也不打算活了，谁审问，我就咬谁。一天，一个家伙问我："你偷枪没有？"我说："偷了，是你让我偷的！"问我："你窝藏土匪没有？"我说："是你让我窝藏的！"闹得敌人没办法，再过堂时，他们谁也不审问了，打一顿了事，目的是让家里用钱来赎。当时，村子里要出两千块钱赎我，我不让，说："我在这儿顶两千块钱，看他们怎么办！"到第六个月头上，滦县伪保安总队队长、大汉奸刘佐周的叔叔"三阎王"见我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就指使我反告那个地主"偷枪"，把那个地主抓起来，诈了几万块钱才算了事。

虽然我利用"三阎王"想诈财的心理，整倒了地主，但我自己并没得到什么好处。我从监狱里出来不久，就又遭到刘佐周的

伪保安队的追捕，因为他们仍然怀疑我通共产党。我只好到唐家庄煤矿去做工，暂避一时。三五年秋，刘佐周被高志远打死了，抓我的人完蛋了，我才敢回家。在家里，也不知妹妹她们成天开什么会，总让我给站岗。有一回，我不干了，说："总叫我站岗，啥事也不跟我说，我不侍候了！"妹妹说："我们在研究抗日。"我说："你们抗日，我也抗日，你们是共产党，我也是共产党。不要我不行！"丁振军说："你想入党很好，但得守党的纪律，党里的事，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我说："我早就知道瑞珍你们是共产党，从没说过，还挨抓呢，蹲了六个月大狱。我要说了，更了不得了。你们放心，我谁也不告诉。"我妹妹张瑞珍，还是三三年上学时和丁振军同志一起入的党。

一九三五年冬天，瑞珍郑重地通知我说："组织上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了，从现在起，党叫你干啥你就得干啥。"我激动地说："叫我干啥我干啥，叫我死，我也死去！"这以后，我当上了秘密交通员，一干就是一年多。

一九三七年，王平路同志在迁西一带闹起义，打游击，我知道后说什么也不在家了。我说："我夏天卖凉粉，冬天卖干粉条，光给送送信什么的，敌人抓住我，受不完的罪，不如动刀动枪地干，死也痛快！"这样，我就和张鹤鸣同志一起去参加游击队。在口外，我们打过药王庙等伪满据点。后来，形势起了变化，我们又回到滦县老家。

在滦县，我想方设法，鼓捣着买枪。因为这时我认准了，穷人手里只有有了枪，才有出路。所以，我就粜粮买枪，这当然引起父亲的反对。为了防止我再卖粮食，他把粮食都过了秤。我呢，就和母亲、妹妹、伙计一起想法瞒着他，不仅卖粮，还偷偷把地卖掉，给人家写了"死契"，然后，再让买主写个租约给我。我对买主说："我父亲活着，地算你租给我种，我暗中给你拿租子。我父亲一死，地就归你。咱们两下保密。"用这种办法，我一共卖了

五十多亩地。后来舅舅把这件事告诉我父亲，并且劝他："算了，由着他性儿吧！就他哥儿一个，你死了还不全是他的！"父亲咳声叹气，骂我几句，也就不再管的那么严了。

有一次，我们的人摆弄枪，枪走了火，打伤了一个同志。因我父亲会点医术，就让他给治，我父亲追问我们到底是不是土匪。李润民同志操着外地口音解释说："大叔唉，要当土匪，我还在老家当哩，谁跑出这么远来当土匪？你老放心，我们是闹抗日哟。"父亲挨过俄国人的欺负，又亲眼见过外国人杀中国人，所以听了李润民同志的解释后，不仅不再怀疑，而且开始支持我们。在冀东大暴动时，他支持我和妹妹参加，并说："你们走后，我就到官府去报告，说你们学坏了，我管不了，与你们脱离关系"。但暴动后，敌人还是没有放过他，把他抓住杀害了。敌人还把我母亲的腿打断，把我家的房子烧毁。日本投降时，我母亲一乐，摔倒了，就再也没有起来。

一九三八年六月间，李润民同志在我家住着，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暴动用的旗帜、袖章和传单也放在我家。临起事时，我们把这些东西转移到港北。港北有个伪大乡长唐协尧和我们"通气儿"，放在那儿保险。

我们到了港北，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被伪军包围在村子里。李润民和高培之冲了出去，我没跑了，就装作"好人"出去看。一个伪军小队长认识我，他问："你干啥来了？"我说："我看你们来了。"那个小队长悄声说："看啥？抓你们来了，还不快跑！"我说："抓我，我还跑啥？你这不就抓住我了吗？"他说："你快走！我放两枪就得了。"我转身溜到村西，钻进高粱地。那个小队长冲村外放了两枪，咋呼了一通，就完事了。

我知道事情漏了，赶忙去通知有关的同志。糯米庄民团队长李景山是我们的人，我给他送信儿，叫他快跑。他自以为是民团队长，手里有队伍，敌人不敢抓他，没走。结果被敌人抓住杀

了。

我和张鹤鸣，还有一个叫二楞的小伙子，被伪保安队发现。我们一口气跑到柴各庄东面的翠花山上，当时手里只有一支“套筒皮”。这条枪还是二楞从他姥姥家“偷”来的。

伪军的马队追上来，把我们困在山上。怎么办呢？我们想起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在这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何不来个“空山计”呢！于是，把身上带着的一面红旗挂在树上，然后就躲进庙里，准备拚命。敌人摸上来了，我们打了几枪，打死两个。当时伪军闹不清我们有多少人，又怕天黑后出事，就灰溜溜地跑了。

夜里，我摸到干爹家。他是个伪乡长，有枪，我就跟他要枪。他问：“你小子要枪干啥？”我说：“抗日呵。”他说啥也不给。我说：“您要不给，我就带着队伍住在您家来。”他知道我说得出来也干得出来，只好把枪给我了。其实，我们哪儿来的队伍？连兵带官就三个人。

从乡长家出来，我们串联了二十多名青年，还打了不少高粱叶子，一捆一捆地绑成手枪模样，用布包好，插在腰间。这样，一支小小的抗日武装部队就算形成了。我们一面走，一面宣传，到了港北，发展到百八十号人了，由张鹤鸣、我和唐协尧负责。

暴动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搞枪。因为唐协尧原来是伪大乡长，我们就派他向敌人去报告。唐协尧假作惊慌地跑进警察局，喊着：“不好了！不好了！起便衣队了！”我们乘机跟了进去，一进去就把警察局长的枪下了。当时，盐务局长也在那里，我们顺便把他的枪也缴了。我说：“便衣队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便衣队！我们暴动了，要抗日，把枪交出来吧！”两个局长闹个措手不及，他们看着乌黑的枪口，吓得一个劲打战，结结巴巴地命令手下的人把枪交给我们。然后，我们便开仓济贫。凡是来赶集的穷人，每人发五斤盐、十斤面。那时，盐是很珍贵的，不好买。老乡们领

到这些东西，欢天喜地，一个劲地感谢我们。我们说："不要谢我们，共产党让我们拿起枪杆子抗日救国，打跑鬼子，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要想不受穷、不受气，就跟我们一块干！"这样边发东西，边宣传，效果很好，许多青年人跑来参军。

我们在港北起义的时间是七月六日。起义后，我们从港北出发，路上缴了张各庄民团的枪和扒齿港伪警察所的枪，然后越过北宁路。

在路北，李润民同志也领导了农民暴动，我们会师后，合编成抗日联军第五总队，下设三个大队。我们路南来的人编成第一、第二大队，路北的人编成第三大队。李润民任总队长，黎光宇、张鹤鸣和我任副总队长，高培之任政治部主任，县委书记赵玉清任监印官，唐协尧任军需处长，管财粮、衣服、弹药等。

黎光宇原来是京东特委委员，我和张鹤鸣都只当过党小组长，这回他和我们一起当副总队长，有点不服气。他就带着第三大队单独活动。他还是有办法的，也勇敢，所以，打了许多胜仗。曾打下安各庄伪军据点，劫过火车，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

七月十五日，我们驻扎在杨家院、糯米庄、甄庄，被滦县伪保安队发现了。队长刘涛带三百多伪军赶来镇压。出发前，有几个伪军到滦县"惠中饭店"去吃早饭。他们一进门就嚷嚷："跑堂的，快点上饭！"好象有什么大事业要马上干似的。有一个跑堂的叫肖生，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他看敌人急得这样儿，担心有什么意外情况，便凑上去问："啥事，这么急？"伪军说："抓便衣队去，闹暴动了！"肖生说："唉呀，这还了得！在哪儿呵？怎么一点信儿也不知道？"肖生故做惊讶，继续打听消息。因为肖生平时很注意跟伪军拉关系，所以伪军一点也不提防他，就有一搭没一搭地吹呼起来。

肖生把情况探听清楚，就从后门溜了出来，把消息告诉了我

们。

得到情报，李润民同志立即召集干部开会研究。他说："同志们，滦县保安队出动三百多人来围我们，我们怎么办？"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虽有四、五百人，但一半没枪，又没经验，许多人连枪都不会放，一打准乱套；另一种意见是打，因为不打，见着敌人就跑，太丢人。张鹤鸣上过军校，懂得战术。他说："打仗要巧，咱要打就打埋伏，打胜了是捡的，打不胜再走不迟。"接着，他提出了具体打法。因为他讲得有道理，大伙就都同意打了。

张鹤鸣我们是本地人，在家门口打仗，地形地物不用看，闭上眼睛都能说上来。所以，我们就按鹤鸣的意见，分头带兵去埋伏了。

杨家院东面有个"包神庙"，过了庙就是红眼沟，沟那边是平地。伪军来必然得过红眼沟，所以，我们就埋伏在沟的两侧。

敌人排着队，气势汹汹地向杨家院扑来，他们进入半拉山口，来到红眼沟。我们开枪从两面一挤，二、三百敌人就被我们挤到一个坟圈子里去了。

我们喊着、跳着，冲了过去，敌人当场被我军打死一百多名。马队跑了，其余步兵全部被俘。队长刘涛吓得缩在一个坟头旁，见我提着枪跑过去，赶紧给我跪下。我踢了他两脚，缴了他的枪。拿起枪一看，把我高兴坏了！这是一支德国造的大镜面枪，叫"十三特"，是一支难得的好枪，上面还刻着"京东第一"几个字呢！这支枪我一直用到抗日战争胜利。现在它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杨家院战斗，我们歼灭敌人二百多，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二百多支。

这一仗震动很大，滦县、乐亭的敌人闻讯，惊恐万状。他们四门紧闭，昼夜防守，龟缩在城里，一步也不敢出来了。

我们第五总队稍做休整后，就决定去打乐亭县城。部队出发了，战士们背着枪，打着红旗，雄赳赳气昂昂，大踏步向乐亭进军，受到群众的夹道欢迎。我背着“京东第一”字号的手枪，带着部队向前进。我想，在党的领导下，有了枪，就有了出路……

（星城　书明　整理）

党指引我战斗成长

周 治 国

一九一七年旧历四月初一，我出生在迁西县东寨村一个赤贫的雇工家庭里。父亲常年给地主扛活，母亲给人家纳鞋底、织布、被人使唤。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全家也吃不上饱饭。

为了活命，两个姐姐都是十三岁卖给人家当童养媳。

我从七岁起，就给地主家放猪、放羊，挨打挨骂，受尽凌辱。

我家几辈子就没有房子，从我记事起，年年“串房檐”，因为交不起房租，让人家撵得搬了十八次家。

我十岁那年，父亲给地主去看山，这样，全家才在九泉寺里的一间四面透风、摇摇欲倒的破厢房里安了身。

穷人家里，祸不单行。在我十三岁那年，二弟给史家峪北沟一家地主放牛，遇上山洪爆发，让大水冲走了；也是在这一年，大姐在婆家受不了虐待，仅十七岁，就服毒自杀了。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气得一头病倒在炕上。万般无奈，我咬着牙到龙湾去投奔姨兄，在他与人合伙开的金矿里下井背矿石。拼着命干了三个月，才挣了四块钱，我气得一跺脚，不干了。

到十五、六岁时，我更懂事了，常常呆呆地琢磨：我的命怎么这么穷？这牛马不如的苦日子，啥时候才能熬到头儿呢？

后来，与我同岁的伙伴樊同，经常来找我。他十分同情我的处境，便常常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在他的启发和引导下，我渐渐懂得了：我们的生活这么苦，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地主老

财们的剥削、压迫造成的。只有打倒地主老财，才能分房分地，有吃有穿，过上好日子。而要打倒地主老财，就必须跟共产党走，当红军，搞暴动。

以后，我才知道，樊同在他叔叔樊永春（王平路发展的党员）的影响和教育下，已参加了共产党，和冀东地下党的领导人李运昌经常联系。樊同把我的家庭状况和革命态度作了详细汇报。李运昌指示樊同，要好好帮助我提高觉悟，如果经得住考验，就可以发展入党。

一九三三年秋，经樊同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暴动的一天。

九月初九傍晚，樊同匆匆跑来，悄悄地告诉我说："红军来啦！要闹暴动啦！今天夜里就动手，你晚上到我家来吧！"

我高兴极了，天刚一黑，就一口气跑到下梨树峪。我到樊同家以后，他便把我领到迁安县委书记樊顺家。刚进院，便看到不少人出出进进的。到了屋里，又见樊顺大嫂正低着头，用缝纫机紧张地扎红袖标（樊顺原是缝鞋匠，家中有缝纫机）。在屋里，我见到了几个陌生人，后来才知道，有一个叫孙才，一个姓白（张盘石），是京东特委派来领导抗日暴动的。

到晚上十点来钟，院里吵吵嚷嚷地来了不少人，都穿着便衣，背着枪。人们争先恐后地把扎好的红袖标戴到胳膊上。队长樊永春、政委樊顺向我们郑重宣布，成立京东红军抗日游击队。于是，我们便整队出发了。

暴动队伍先后在下、上梨树峪和墙板峪地主家里起出一些枪支，然后转向二拨子村，到豪绅王子藩家起枪。王子藩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是教育界的头目，也是当地有名的地主豪绅。他紧闭大门，开枪抵抗。我们便包围了他家大院，甩进去几颗手榴弹，大枪也一齐开火，打伤了王子藩老婆的大腿。这时，他才被迫开门，交出大枪三支。门刚一打开，他家的长工便跑出来参加

了我们的队伍。

暴动队伍经米峪口、韩庄到达苇子峪。刘永丰率百十人与我们会合，队伍扩大到六百多人。

接着，队伍直奔东员庄。刚进村，大土豪王凤山就命令护院的民团开枪射击。这时，孙才立即下令，包围了王凤山的宅院，开枪猛攻一阵。王凤山抵挡不住，便跳墙逃跑了。我们砸开他家的大门，起出大枪十余支，还有一支冲锋枪。王凤山是附近几个村庄有名的大恶霸，群众早就恨透了他。起了枪以后，大家还是怒气难消，便把他家的房契、地契搜出来，堆到街上，一把火烧了。王家还有一匹膘壮肉肥、日行三百余里的大青骡子，是王凤山最心爱的"宝贝"，这次，也叫我们牵走了。

从东员庄出来，我们又开到庙岭头。攻下了伪警团局子的一个据点。

暴动后第三天的下午三、四点钟，队伍向青山口进发。次日上午，伪迁安县政府纠合各处民团一千余人，从东、北两面向我们扑来。我们的队伍立刻抢上了西大山。快晌午时，战斗打响了。我们居高临下，用火力死死地压住敌人，使他们不敢前进。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敌人又从太平寨等地调来伪警团。我们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最后被打散了。

我原来没有枪，队伍一被打散，我从庄稼地里拾到了一支"老洋炮"背在身上。突围出来，躲在山道边一间小房子里，天快黑时，我又渴又饿，实在受不了啦，便出来找水喝。冷不防，几个家伙将我拦腰抱住，下了我的枪。就这样，我被捕了。

敌人将我押到太平寨，吊到一间马棚的房梁上。旁边，樊同、董福生等人早已经吊在那里。

绳子深深地勒到肉里，汗珠叭嗒叭嗒地往下掉，我疼痛难忍，大声地喊道："你们凭什么捆我，吊我？快把我放下来！"团丁便破口大骂我是"穷党"。我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地质问他："'穷

党'犯了什么罪？你们好好想想，你们到底是为谁卖命，为什么坑害穷人?!"

这一下，可惹恼了敌人。他们发疯似地扑过来，用棍子、皮鞭轮着班儿打我。不一会儿，我就昏过去了。敌人们把我卸下来，向我脸上喷水。醒过来，我还是骂。他们便连我的两条腿也绑起来，四肢倒挂，接着打。我横下一条心，死也不求饶，骂得更起劲。就这样，整整折腾了一夜，我被打得死过去几次。第二天早上，绳子湿湿地，还紧紧地捆着我的四肢。

吃完早饭后，我们十四个人被敌人用一根绳串着，押送到迁安县城。在狱中，我和樊永春、樊同等同志被关在一个屋里。樊永春大叔趁看守不在跟前，悄悄地嘱咐我说，敌人审讯时，千万别承认参加了党和红军，就说是个要饭的，跟着看热闹；要问起枪来，就说是捡的，留着打兔子。他特意加重语气说："赏儿（我的乳名），一定要刚强，怎么打也别改口！"

几天后，一过堂，我照永春大叔教的办法跟审判官对付，连问两次也是这个话。敌人气得没有办法，再也不审我了。

在迁安狱中受了三个月残酷折磨之后，我和樊永春、李显荣、樊同、高永瑞等同志被押送到天津第三看守所。

李显荣因为当过"民众会"总会长，参与领导过迁安县反"旗地变民"的斗争，大闹过县衙门，所以，敌人先审他。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李显荣不但没有屈服，而且义正词严地痛斥敌人，充分表现了革命者的崇高气节和大无畏革命精神。最后，敌人将他处以绞刑。不久，我们也分别被判了刑，关进了天津第三监狱。

牢房的卫生条件很差，到了夏天，里面潮湿、肮脏，热得象蒸笼一样。虱子、臭虫到处乱爬，苍蝇、蚊子满屋乱飞。伙食更坏，每天七分钱，狱方还要克扣。一天两顿饭，吃的是用发霉的谷子煮的半生不熟的稀饭，喝的是半开的浑水。在敌人的摧残

下，许多“政治犯”得了传染病，有的甚至病死在牢中。不久，我也病倒了。狱方怕我传染别人，就把我和另一个病号监在一起。

那个病号化名叫“言午”，四十上下岁，是个律师模样的人。他打听了我的身世和被捕原因。当他听到我才十六岁，就被扣上“参加穷党、武装暴动、危害民国”的罪名时，气得眼里喷火。他叫我写状子上诉。我难过地说：“可我不会写字呵！”言午说：“等我病好一点儿，帮你写。你要想识字，我教你！”

就这样，言午替我和樊同写了上诉的状子，并耐心地教我认字。他还给我讲列宁在狱中刻苦学习的故事，鼓励我克服困难，学好文化。

我病好以后，又被押回原来的牢房。临别时，言午送给我一笔、一砚、一墨、一本，还在本儿上写了“愿得明诀必须勤学，寡言慎事宁死守志”的赠言。在这位启蒙老师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在狱中始终勤奋地学习文化。

狱中那种非人的待遇，我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间，狱中地下党发动了第一次绝食斗争，历时一天半，得到了胜利。

一九三五年春，在经过四个月的酝酿之后，我们又向狱方提出了七项要求，主要内容是：不准隔离“政治犯”，“政治犯”要住在一起；不准封锁消息，要看《大公报》；不准虐待“政治犯”，要改善卫生条件和生活待遇；不准愚弄“政治犯”，要给时间，安电灯，让“政治犯”自教自学文化知识……

对于这些条件，狱方不但粗暴地拒绝，还要花招侮辱革命者，并勾结了伪保安队前来镇压。我们便用碗筷、砖石痛击了伪保安队。

经过激烈的搏斗，我们十几名同志被戴上沉重的手铐、脚镣，推回牢房。狱中地下党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便组织了第二次

绝食斗争。

头一天，没有动静。第二天，看守长骂骂咧咧地让狱警抬来几桶大米饭，还有白菜熬肉。我们躺着，谁也不吭、不动。等看守长刚走，地下党的负责人便给各牢房传话："敌人害怕了，坚持就是胜利！"

第四天，一些体弱的同志饿得昏了过去。这时，狱警硬给大伙灌牛奶和稀饭，可是谁也不往下咽。看守长气得发狂，他叫狱警把我们一个个轮流抬到外面，用一只脚踩着我们的肚子，端着刺刀对准胸口，扬言不吃就扎死。但是，同志们紧紧闭着嘴，怒视着敌人，还是没有屈服。

高永瑞同志身患重病，饿得神志不清，浑身瘫痪，但他为了绝食斗争的胜利，一口饭也不肯吃，到第六天上，光荣地牺牲了！

第三监狱全体"政治犯"绝食的消息，很快在报纸上登出来了。新闻记者纷纷到监狱里来采访。就这样，在天津地下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一场强大的政治攻势。

反动当局慌了手脚，深怕事态再闹大，没法收拾，便在第七天头上，责令看守长，立即答应我们的全部条件。

斗争终于胜利了，狱中的生活暂时得到改善，同志们也能在一起开会、一起学习文化了。这以后，我们建立了狱中党的组织，清除了叛徒出党，选举了总书记和党小组长，订出了会议制度，开始过上了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当时，我任狱中党的秘密交通员，负责传递党内信件和通知。

我们名义上说是学文化，可教员讲的都是革命道理。每次讲完，大家都认真地讨论，共同分析革命的形势和中国的前途。新入狱的同志还带来红军长征北上的消息和遵义会议的精神。听到这些，大家都倍受鼓舞。

在狱中，新鲜的革命道理、严峻斗争的考验和烈士们的光辉

榜样，使我想了很多很多：李显荣为什么能视死如归，慷慨就义？高永瑞为什么能忍受饥饿的折磨，壮烈牺牲？战友们身受牢狱之苦，为什么还要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我渐渐地明白了：革命，不单是为了混上顿饱饭，分上几间房子、几亩地，而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实现共产主义！

思想上的飞跃产生了无穷的动力。我抓紧时间，拼命地看书学习，初步懂得了阶级、政党、路线……当我听到毛主席担任了全党领导职务的消息，更觉得有了盼头。我暗暗下定决心，要象烈士们那样，为了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后来，经过反复斗争，我和樊同的刑期由五年减为三年。

一九三六年冬，出狱前几天，樊永春告诉我和樊同，回去后马上找王平路接上关系，并把狱中的斗争情况向他详细汇报。

听说我们就要出狱了，战友们十分高兴，为我们开了一个热闹的欢送会。记得会上节目很多，有两个同志演了一个有趣的哑剧，还有的同志讲了革命志士刺杀军阀孙传芳的故事和鲁迅先生与反动派斗争的事迹，鼓励我们出狱后继续革命，坚持到最后胜利。会后，战友们掏干了口袋，这个三毛，那个两毛的，为我们凑了七、八块钱的路费，还送给我们几十本进步书籍，鼓励我们出狱后，一边斗争，一边学习……

站在车来人往的天津街头，回头再望望监狱那黑森森的大铁门，我禁不住心潮起伏！想想监狱那非人的待遇，我为自己能恢复自由而高兴；再想想那些关心我、爱护我、教我学习、教我革命的战友们，又觉得实在难舍难分！回首三年的监狱生活，我的心头充满了对敌人的鄙视和仇恨！愚蠢的反动派们，你们想用手铐和脚镣来折磨我的肉体，摧残我的意志，但是，你们的算盘打错了！正是在你们的铁牢里，我学到了文化，懂得了许多以前不明白的革命道理，变得更加坚定了！

现在想起来，那几年，与其说是蹲监狱，倒不如说是上了几

年“革命大学”。

出狱回家后，我很快找到了王平路同志。

原来，三三年秋武装暴动失败后，平路同志不但没有灰心丧气，反而更加坚强，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在迁西坚持斗争。他四处秘密活动，先是串连了刘永丰等同志，成立了一个四人游击小组，以后，又扩充到十几个人。

我向他详细地汇报了狱中的情况以后，他让我先在家等一等，以后有了任务，再到家里来找我。

三七年春，一天，平路和刘永丰一起来到我家，亲热地对我说：“经过了解，你和樊同在狱中表现不错，现在，正式给你们俩接上组织关系。眼下，你还不能出面工作，可以先在亲戚和可靠的穷朋友中搞些串连。另外，还要把东寨、马店子的地主做的坏事了解一下，掌握起来。”

这次，平路还跟我谈了“西安事变”以后抗战的大好形势和国共合作的意义，讲了党的抗日救国的政策和主张。他很健谈，讲得津津有味，我也听得入了迷。

平路这次来，看到我家的生活很困难，临走时，给留下了两块钱。

按照平路的指示，我先做了姐夫王德明的工作。王德明原来只知道教书挣钱、养家糊口，没有革命要求。我便常往他家去，一边帮他干活，一边给他讲革命道理，终于把他说通了，并通过他，又联络了几个人。

我把平路讲的那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党的政策和主张向穷哥们儿一宣传，他们一下子都乐了。

以后，每隔十天半个月，平路和永丰就到我家来一趟，每次来总要送一些匕首、标枪、黄药等，让我藏起来。记得有一次，他们带来二十几把一尺多长的杀猪刀。我知道，这都是为以后搞暴动作准备的，便和父亲把炸药放进坛子，藏到山洞里。把匕首

和杀猪刀装进铁筒里，洒上白灰，藏到隐蔽的地方。

这个时期，平路是京东特委的军事部长，我被任命为特委的特派员。平路常让我到上峪、尹庄、韩庄、吴家峪、黑洼、西庄、沙岭子等村与地下党员联络，转达特委指示，做暴动前的准备工作。

秋季的一个集日，平路和我一人背着一个钱褡子，扮成赶集的样子，早早地到了新集镇西头。他告诉我，一会儿要和老周（阎达开同志的化名）见面，我们坐在道边上等着。不一会儿，一个面庞清瘦、目光炯炯有神的中年人向我们走来。平路赶忙站起身，我猜出这准是达开同志，便也跟着站起来。达开同志一边热情地同平路握手，一边打量着我。平路低声地给我们介绍："噢，这是老周，这是小王（当时我的化名）。以后，你们要直接联系，见面的机会就多了。"阎达开同志冲我笑了笑，然后亲热地和我握了握手。

达开与平路简单地交换了情况，又商量了一些事情，然后开始和我谈话。记得他亲切地说："听平路介绍，你斗争很坚决，特别是在狱中，表现很好。坐监狱，没白坐，又学了理论，又学了文化，眼下咱们最需要这样的同志。老王事情多，以后咱们多联系，有事到黑洼万老三（即万国来）那儿找我。"说着，他掏出个纸包，塞到我的钱褡子里面，嘱咐我说："这几本书，来得不易呀，可别弄丢了！你拿回去，多读一读，着重领会精神。"

接着，平路又嘱咐我说："今后你要在老周领导下，加紧学习，好好工作！"

我当时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可早就翻腾开了：半年多来，平路待我就象亲兄弟一样；看到我家生活困难，几次给我父亲撂下钱；怕我工作不方便，还送给我一支手枪、一块怀表；在思想上、政治上，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就更大了。现在，就要离开他了，怎么舍得呢！但我懂得，这是组织决定，必须坚决服从。再

想想达开同志，刚一见面就这样热情地鼓励我，关心我的学习和进步，心里就稍微平静一些了。

与达开同志分手以后，我随平路到苇子峪去找刘永丰。

一进屋，我们就看见永丰大嫂病在炕上。四个孩子，一个个面黄肌瘦、破衣烂衫，十分可怜。平路的脸上露出十分难过的表情，默默地把自己外面套的青布夹袄脱下来，给那个裸露着肩膀和后背的大孩子披上，随后，又摸出仅有的两块银元，放在破柜上。刘永丰立即抓起钱塞给平路，噙着泪花说："老王，你……你家的地都快卖光了！这钱你留着，还有大用！"

"这就是大用！先给嫂子抓几副药，再买点吃的。"平路说着，一把抓起刘永丰的手，把钱又塞到他的手里。

望着这一幕动人的情景，我心头一颤：多深的阶级感情啊！多体贴同志的领导啊！我仿佛又看到狱中几十个战友给我和樊同在凑路费，又仿佛看到了平路同志撂在我家破席头上那两块亮亮的银元……

接着，平路和永丰商量了一下工作。临走时，他安慰着说："大嫂，别难过，都怪我关照不到。当下是苦，苦，咱也得往前熬！毛主席带着红军打到陕北啦！离咱这儿不远的平西也闹起了红军，好日子就要来啦！"

临出屋门，我悄悄地脱下自己的粗布褂子，给永丰的二小子披上。

时隔不久，王平路送来两个老红军，叫我和刘永丰到黑洼万国来家与他们见面。到万国来家后，平路指着两个陌生的人介绍说："这是李润民同志，原来是红军的团政委；这是孔庆同同志，原来是红军的一个营长。这次来，是领导抗日游击工作的。"平路还让我带着他们到各接头地点进行联系，筹建队伍，做暴动的准备工作。我高兴地答应了。谈了没几句话，李润民便告诉我们，不久，八路军要开过来，为了便于联系，要先订下接头暗语。然

后，他边比划着边说："见了面，总要先握手。谁先伸手，就说'还我河山'；后伸手的就回答'扩大民族解放战争'！"

我和刘永丰听到这种既有趣又有政治意义的暗语，都笑了。

按平路的指示，我领着李润民、孔庆同跑遍了全县的联络点。每到一处，他们总要讲一些长征中的小故事，对同志们的鼓舞很大。

这以后，孔庆同常常化装成卖拢梳、篦子的小贩，来往于各联络点之间，作暴动的筹备工作。

两个多月以后，平路带了十几个人来到黑洼。我和李、孔二人也奉命召齐地下党员，到万国来家与平路会合。平路带来的有史贞，还有一些人，看上去象是学生，都穿便衣，每人都有一支枪。

这是三七年十二月下旬。我们三十多人从黑洼出发，开往三屯营方向，在迁、遵交界的诸乐寺住下了。

第一夜，平路召集全队开会，宣布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支队正式成立，宣读了京东特委的任命：王平路同志兼任支队司令员；孔庆同、刘永丰任正、副支队长；史贞和李润民任正、副政委；我任特派员。

第二天夜间，十几个没有履行入党手续的党员，都补填了志愿书。然后，举行了入党宣誓大会。领誓的是王平路同志。誓词大致内容是：为了民族，为了人民，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以及宁死不屈，决不叛党等。

第三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们正在庙内休息，发现山下有两个伪警团丁，扛着两支大枪，摇摇摆摆地向诸乐寺爬来。我们不摸底细，立刻做好战斗准备。两个团丁刚进庙门，便被缴了械。我们把团丁带到平路同志跟前，平路问了问他们的来意和山下伪警团的情况，给他们讲了我党的抗日政策，便扣下两支枪，把他们放了回去。

目标暴露以后，我们便从诸乐寺转移到三屯营南面的一个小村子里。

第四天清早，平路命令我到三屯城里去侦察。下午，我发现几百名团丁扛着大枪，从城外杀气腾腾地开到城里。显然，敌人调来了援兵，我急忙回村做了汇报。这样，支队就连夜转移，步行五、六十里，赶到上梨树峪，在平路家里休息了半宿。

次日，支队开到上峪北十几里的团瓢峪，住了两天两夜。

当时，支队刚成立，没有多少活动经费，三十多人的吃饭问题都不好解决。因此，我们便准备在鬼子的海关税卡上打主意。经过了解，长城上的青河沿税卡是一块“肥肉”，从天津来作买卖的，都要在这里交税。据点里有二十来个团丁，十几支枪。

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偷袭青河沿。一来是想搞掉据点，扩大我党的影响；二来是想缴获一些枪支、弹药和钱财，来补充支队。

十二月三十日，我们连夜奔袭青河沿据点。但是，因为对敌情了解不清，又没有内应，加上战士们缺乏战斗经验，所以，这次战斗失利了。党的忠诚战士王平路同志在率队冲进据点后，不幸中弹，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光荣牺牲。

平路同志牺牲后，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将平路的全家都转移到苏庄，安排在苏林燕同志家中。剩下的同志在魏春波的领导下，批判了史贞等人的悲观情绪和可耻的逃跑主义，保存了革命的武装，坚持了对敌斗争。

春节以后，魏春波、苏林燕和孔庆同等同志率领我们先火烧了倒流水日本海关税局，紧接着，又打下了洪山口据点和半壁山据点，用坚决果敢的斗争和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迎来了一九三八年的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

暴动以后，我曾到苏庄去看望王平路的全家。半年没见面了，这回我一去，他们全家都亲热得不得了。一天吃过晚饭，我们在一起谈论着暴动的胜利消息，平路的妹妹赵平远突然地问我：“小

王大哥，你还叫‘周赏’这个名字啊？”我说：“父亲给起了个名儿叫周明，没叫开。蹲狱时，有个糊涂审判官叫我‘周赏呵’。叫来叫去，还是没有大号。”

她瞅了瞅我，兴致勃勃地笑着说：“根据你的志向，就叫周治国好不好？”

“中！就叫周治国，跟着毛主席，为劳苦大众夺权治国！”说完，我们俩人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圣洁　星城　整理）

在敌人心脏里战斗

朱欣陶

从一九三六年开始，直到全国解放，我和我爱人张子余同志一起，按照党的指示，一共在敌人的心脏里活动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我先后当过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秘书、伪冀东道警务科长、伪昌平县县长和国民党交通部公路总局第八区公路工程管理局人事室章制组组长。在地下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我利用工作之便，为党提供情报、掩护干部和电台。现在回想起那段危险、紧张而又有意义的斗争生活，和"四人帮"横行时，颠倒黑白把我打成汉奸、走资派的情景，真是感慨万千！

我本来是上海人（父亲是布店的"出店"），六岁那年，父亲患伤寒病死了，剩下母亲、妹妹和我，三口人相依为命，靠母亲给人家浆浆洗洗糊口过日子。

母亲为了给我找一条生路，拚死拚活地干，想多挣几个钱，供我念书，但我一共只念了私塾和不足三年的小学。十五岁时，老师看我实在可怜，就把我介绍到北洋军阀政府的交通部航政司姓胡的司长家里当佣工，并随他来到北平，干了两年有饭无工钱的杂活。后来经过恳求，姓胡的司长把我介绍到大理院（最高法院），当了一名工友，每月挣七块大洋，我给家里寄三元，母亲很欢喜。

大理院有几个好心人，看我年轻，记性好，人又勤快，就帮我补习文化，教我速记。我很快就学会了，当上大理院和旧国会的速记员。

在我二十岁那年，北洋军阀皖系的姚震当了大理院院长。他有一个侄子，叫姚依林，当时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清华大学读书。一九三五年，国民党的宪兵三团搜捕共产党，查抄清华大学，姚依林曾在我家暂住避难。就在那时，我和爱人受他的影响，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并参加了革命。

“七七”事变后，冀东伪组织下属的两个警防队哗变。为此，日寇撤掉殷汝耕的伪防共自治政府的政务长官职务，由殷汝耕的秘书长池宗墨接任。池上台后，聘请姚依林的五叔姚国桢给他当高级顾问。通过姚依林的母亲介绍，我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当秘书，开始为党提供情报。例如，我利用夜间，把冀东所属二十二个市、县的警察和保卫团的编制、驻地、武器装备、干部姓名等等填表并秘密送给姚依林同志。

后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改为冀东道。姚依林指示我，要乘机把冀东道警务科长的职务捞到手里。我便想方设法当上了伪冀东道的警务科长。

警务科表面上是管警务行政工作，实际上是负责收集我游击队活动情况，每天编一份秘密情报。这时姚国桢在天津养病。我就在送给姚国桢顾问的情报里多装一份，转给姚依林。有时遇到比较重要的情报，我就亲自打电话通知姚依林来唐山，我去接他，面谈后再送他走。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冀东大暴动前，我把冀东各县的详细地图通过胡科长的老婆带到天津。胡的老婆是个摩登女人，熟人很多，交际很广，我请她去天津为姚国桢送“东西”，她高兴得很，因为这正是她巴结权势的一个好机会。因此，她按我的嘱咐，亲手把装有军用地图的“东西”交给了姚国桢的儿子，由他转给了姚依林。

一九三八年六月底，我先后得到关于宋、邓支队挺进冀东，已打到长城边上和冀东党正在组织武装暴动的两份重要情报。随后又得知，日寇为防止暴动，就要收缴分散在冀东民间的二十三

万支枪的消息。因此很着急，就火速约见冀东地下党负责人李运昌同志，把这三件重要情报汇报给他。

冀东暴动本来预定在七月十六日举行，根据以上情况的变化，就提前到七月六、七、九日举行了。起义成功以后，各县纷纷告急，这里说“共匪”成千上万，遍地都是。那里说，八路军锐不可挡，得赶快派兵去“围剿”。这一件接着一件的消息，使日寇、汉奸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而一些不满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统治的人，有时也幸灾乐祸地说一些风凉话，嘲笑日伪的无能和虚弱。记得当时冀东道的职员天天到警务科来打听消息。有一天，大家听到迁安县城被我攻克，姓朱的县长（绰号“猪八戒”）狼狈逃走，藏在一个叫“三仙洞”的土娼家里。还有我军打下卢龙县城，一个姓牛的县长（人们叫他“牛魔王”）也仓惶逃命。听到这些后，建设科科长杨恩蔚就编了一个小说的回目，叫做“猪八戒避难三仙洞，牛魔王败走卢龙城”，逗得人们哈哈大笑。不过，也有人提出疑问说：李运昌是湖南人，卖篦子的（此系误传，李运昌是河北省乐亭县人），他怎么对冀东的情况知道得那么清楚，打保卫团，拿警察局，一搞一个准儿?!他们哪里知道，有我这个“里通外国”的警务科长给李运昌通风报信呢！那一段时间，天天都能听到我军得胜的消息，加上伪政府里议论纷纷，讲八路如何如何，李运昌如何如何，就象讲神话一般。我虽然不动声色，但打心眼儿里高兴。

在工作中，我虽然没露过什么破绽，但鬼子还是怀疑我。开始让人监视，后来干脆让我到昌平当县长。我请示姚依林同志，他说：“可以去昌平，因为昌平可以沟通北平和平西根据地的联系。”于是，我到了昌平。

当上伪昌平县长以后，姚依林同志因工作需要，到解放区去了。因此，我有一段时间没和组织接上关系，心里很苦闷。有一天傍晚，传达人员老徐来报告，说外面有位先生要见我。我出去一

看，原来是吴德同志，我忙让进里屋。吴德一进屋，就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欣陶同志，我身上带着重要文件，组织命令你，务必在今天把我送进北平。"一听"同志"两个字，我心里一热，泪水涌到了眼边，我又一次感受到党的温暖。于是，我一面为他安排茶饭，一面想怎么把他送进北平。当时路上关卡很多，盘查很严，就是我亲自去送，危险也是很大的。后来我想，还是在日本联络员高桥清四郎身上打主意。

高桥清四郎是驻昌平县的日本军队联络员，大家都管他叫顾问。这个高桥是个贪酒好色之徒。他常去北平，在窑子（妓院）里肆意纵酒，狂欢一宿，第二天早上再醉醺醺地滚回来。我心想，这一点正好可以利用。于是，我就去找他，当机提起："你好久没到北平去了，又该喝一顿去喽？"高桥一听，来了兴致，他说："怎么？县长的请客？"我说："好，我请客，我请客。"说着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五十元联营券（伪钞），他欣然接受，高兴得不得了。我就打电话给警务局，派车派人护送高桥去北平。等高桥一坐上县里的"福特"牌汽车，我就走上前去说道："顾问，我有个老朋友，来找事做，咱们这里安排不下，我想让他坐车跟你去北平，你看……"高桥马上说："好的，好的，县长的朋友，我的可以带去。"吴德同志上车后，我对他说："我们这里人多，安排不下。这儿有二十块钱，您带着零用，到城里找点事干吧。"吴德同志不要，一个劲儿推辞。我怕露出破绽，就把钱收起来了。车开走了，我一直放不下心来，一宿也没入睡。第二天早上在大门口转来转去，忽然，看见护送高桥的警察。我问："昨天还顺当吗？"他说："顺当。""我的那位朋友呢？""他进西直门后就下车了。"一听这话，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这以后，我又一度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一九四四年冬，我和张子余同志一起去解放区找党组织。找到后，我们要求留在解放区，但组织依然决定让我和张子余同志回到北平市里潜伏，并说

不久就有任务。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以后，我在国民党交通部公路总局第八公路工程管理局人事室工作。一天，组织派李才同志来交代任务，决定在我家设立秘密电台，并安排报务员张说明住在我家。

电台设立起来后，直接同我平西根据地联系。一天，李才同志在东四牌楼被一群国民党军警跟踪逮捕，抓到预先停在路旁的一辆军用卡车上。李才同志乘汽车发动之际，跳车逃走。但被军警拽下身上的皮夹克，同时，军警开枪射击，李才腹部中弹。可是，他想到自己的责任，想到皮夹克里还有文件和几个重要通讯地址，那关系到地下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危呵！所以，他忍着剧痛拼命跑。跑了一段路，跳上一辆三轮，让三轮车工人拉他钻小胡同，答应加倍付车钱。于是，三轮穿街过巷，飞也似地跑到我家。他踉踉跄跄地跨进门，扑到桌前，抓起电话，通知有关的人，立即转移。我二女儿学过救护，一看他腹部渗血，就赶忙为他包扎。

我接到电话，立即赶到家，马上安排报务员张说明转移，让张子余同志把李才送到西单石缸胡同另一工作关系处隐蔽起来，并设法请医生为他治疗。经医生检查，为贯通伤，未打断肠子，只要不化脓，就不需动手术。这样，我和张子余同志轮流护理，给他注射盘尼西林。两个月后，他养好伤，由张子余送他到天津，后转入解放区。另外，我当时就把电台转移到一个朋友家，说是古董玉器，托他代为保存。他爱人高高兴兴地把“古董箱子”放进地窖。直到解放后，张说明同志会同公安部派人去取，她才恍然大悟。

以上，是我在敌人心脏里活动的几件小事。现在想来，我所以能在敌人内部安全活动十三年之久，完全是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全力保护的结果。至于我个人，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尽了一点力，但同战场上的英雄们比，这一点力是微不足道的。如今，我

虽已年逾八旬，但仍要振作精神，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星城　整理）

父亲牺牲前后

高玉书

我的父亲王平路原名叫高永祥，早年曾在中苏合办的哈尔滨中东铁路上当伙夫，后来当路警。由于受苏联革命的影响，他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他愤而还乡，投身抗日斗争，不久，就在本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三年，父亲和叔叔参加了京东特委领导的迁西人民抗日暴动。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暴动队员没有经过基本训练，缺乏作战经验，所以，在敌人的围攻下，暴动失败了。

紧接着，敌人对暴动队员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大肆捕人和抄家。我家更不能幸免，民团不但抄了我家，而且还占去了前排三间房。叔叔高永瑞被抓到监狱里，爷爷跑到热河，父亲和李运昌同志转移了。妈妈、婶婶、姑姑和我也分住到亲戚家躲起来。家里只剩奶奶一人。直到一九三四年春天，民团撤走了，全家人才陆续回来。

暴动失败后，父亲一点儿也没有灰心丧气，还是继续搞革命活动。

记得三四年春天，我刚八岁，到附近镇上一座洋学堂里读书，住在罗屯的姑祖母家。当时父亲因工作需要，经常要看报纸，为了不惹人注意，就以我的名义订了一份报。这样，我就经常收到注有“高玉书先生启”字样的一卷报纸。每逢集日，爷爷便到姑祖母家，把报纸拿回去给我父亲看。因为环境恶劣，父亲白天总是躲在外面，只有到夜深人静时，才从后山绕回家。为了不

让敌人发现，他回来后不敢叫门，只能往院子里扔土块作为暗号。我爷爷、奶奶听到扔土块的声音便去开门。有时老人睡熟了，没给开门，我父亲就在后院的一个草棚子里过夜。但不管怎样艰苦，父亲从不悲观失望。他经常兴致勃勃地讲述他在路上怎样骗过敌人哨卡，又是怎样甩开敌人，只身囚渡滦河等等。他还教给我对付敌人的方法，有时还让我出去打探消息或站岗放哨。我每次回来都要跟他讲一讲完成任务的情况。他听了有时点头称好，有时又耐心纠正我的某些不足，告诉我今后怎样做。

有一次，父亲秘密回到家里，住在后排西屋，并告诉爷爷去买一瓶碘酒来，还说如果人家问，就说家里有人生了疮。碘酒买来后，我看见父亲拿出别人捎给他的用毛笔写的信来，在煤油灯下，用棉球蘸着碘酒，一点点地涂在信的背面，一会儿，就出现了一行行密密麻麻的小字。我当时十分奇怪，以为父亲在变什么洋戏法。后来才知道，这是上级党给他的指示，还有地下党员给他的汇报。

一九三六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一天晚上，我家里来了一些人。我听到父亲向大家讲什么"事变"、"从山洞里掏出坏蛋蒋介石"啦，还有什么"国共合作"啦，等等，大家听了都很高兴。父亲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带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张学良的东北军和红军打仗，红军在山上写了"山海关"几个大字，然后撤下山来。东北军的官兵追上山，看到这几个字，都很伤感，思念起家乡来，以后，谁也不愿对红军打仗了。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我当时刚满十一岁，虽然还不理解父亲讲的这些事情的深刻意义，但是我知道，父亲是在领着叔叔们打日本鬼子，救穷人；那些来我家的叔叔们，虽然我不认识，但从他们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上看，都是和父亲一样的好人。

"七七"事变以后，父亲的工作更忙了，常常是一、两个月

也不回家一次。

这年冬天，父亲率领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支队攻打青河沿日本海关税卡，在战斗中胸部中弹，负了重伤。同志们把父亲抢出来，用牲口连夜驮到马庄子一个亲戚家里，然后，就来给爷爷送信儿。爷爷立刻去罗屯买药，但是，父亲在药送到之前，就牺牲了。

三八年一月一日傍晚，爷爷带来父亲牺牲的消息，全家人悲痛欲绝。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全家人谁都不敢大声哭，只是呜呜咽咽，偷偷地抹泪。

我把眼泪咽到肚子里，照常赶着牛到河边饮水。想到我亲爱的父亲，望着那连绵不断的座座青山，我心中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暗暗地发誓：一定要为父亲报仇！

这一年，我只有十二岁！

父亲牺牲的消息，敌人很快就打探到了。于是，他们派出特务，四处搜寻父亲的遗体，同时，种种迹象表明，要对我家进行迫害。于是，党组织便决定把我们陆续转移出去。

旧历三月三日，地下党派来两位叔叔，把我先接出来，送到遵化县一个同志家里躲避。时隔不久，一天夜间，组织上又派人来帮我们搬家。由于时间紧迫，走得也很仓促，只带走了父亲的照片和大衣等东西。全家人扶老携幼，忍痛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家。就在这天天还没亮时，日本鬼子又来包围我村，直奔我家抓人。但是，他们扑空了！

这年七月份，我和姑姑高淑珍（即赵平远）一起，参加了冀东抗日的队伍，我被分配到宣传队工作。当时，苏林燕还领着我和姑姑去铁厂，见到了刚从五台山挺进冀东的八路军宋、邓支队的首长，把我家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宋时轮、邓华首长对我特别关心，开会、活动常把我带在身边，吃饭时，叫我和他们一块吃。宋时轮首长爱吃辣椒，我怕辣，他见我不伸筷子，就给我

挑出没沾上辣椒的肉菜。邓华首长见我穿的是便衣，就亲笔写了个条子，让支队随军的被服厂为我做了一套灰色的小军装。我穿上这套崭新的军装，高兴得不得了。这决不是一套普通的军装，它充分体现了党对我的关怀和爱护，寄托了革命前辈对我的无限希望。暴动队的全体同志也都为我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暴动队伍里第一套正式军装呵！

记得当时，许多曾和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如阎达开、李润民等，还高兴地跑来看我。

在宋、邓支队挺进关外时，宋时轮首长还边拉着我的手，边逗我说："跟我们走吧！走不动，就在马尾巴上拴个筐，拖着你！"

在冀东抗日联军宣传队工作时，担任抗联梯队长的孔庆同叔叔见我年龄小，怕我随部队经常行军吃不消，还亲自送给我一匹马骑。

有一次，行军过河，我把马让给别人，和姑姑俩人骑一匹马。过河后，我和姑姑都摔了下来。我的胳膊摔伤了。领导上很快就找来了医务主任。我们骑在马上，一边行军，他一边给我按摩。

入秋，暴动队伍开赴平西整训，在潮白河一带，遭到敌人的堵截，被打散。在撤退的路上，伪军又是打炮，又是追，情况十分危急。正在这时，孔叔叔带着部队赶上来，立刻组织还击，把伪军打退了。孔叔叔一边安慰我，一边让战士牵来一匹马，还送给我一支小手枪，然后，掩护我们回到冀东。

西进严重受挫后，冀东的形势很紧张。到一九三九年，日伪开始对我冀东区实行大"扫荡"。环境越残酷，党越关心我。在那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李运昌叔叔一直惦记着我这个烈士的后代。一九三九年夏，李叔叔曾委托魏春波同志带着我和姑姑，准备化装成一家人，经唐山、天津、北平，然后转送到晋察冀根据地去。因为有具体困难，没能去成。一九四〇年春天，李叔叔又一次准

备把我送走，又因实际困难太多，未能如愿。

一九四一年夏天，李叔叔让苏林燕同志把我送到鲁家峪司令部驻地。当时，李叔叔的工作十分紧张，但还是特意把我叫去，详细地询问我的情况，鼓励我好好学习，并送给我钢笔、本子等学习用具，嘱咐我天天坚持写日记。他还派特务连指导员单独给我上课，教我学习政治和文化。

秋天，李叔叔亲笔写信，介绍我到平西根据地去。一天夜里，在一位老交通员的护送下，我到了盘山，找到刚刚转战到这里的包森副司令员。进了屋，老交通员递上我的介绍信，说明了我的困难。包森叔叔看完信后，亲笔写了一张条子，让交通员带着我去领了路费。

几天以后，我们从盘山出发了。当时，敌人正从平北向冀东"扫荡"，为了躲过敌人的追击和堵截，常常一夜跑一百多里路。一天夜里，我们蹚过潮白河，裤子都湿了。后半夜，裤子上都冻了冰。护送我们的老同志怕磨破我的腿，赶紧解下自己的绑带，给我缠到腿上，使我深深感到，在革命的大家庭里，真是处处有亲人！

到了平西，我被分配到教导队学习，入校前，先住进了招待所。这个招待所的所长认识我父亲。经他介绍，许多父亲生前的战友都来看我，有的拽着我的手，有的拍着我的肩，有的抚摸我的头，亲热地打听我全家的近况，谆谆地嘱咐我努力学习，注意身体，完成父亲未完成的事业。大家回忆起我父亲生前的斗争事迹，不少人都掉了泪。记得有一位叔叔是从很远的地方特地赶来看我的。他怕我冻着，还送给我一件驼绒背心。我把它珍藏在身边，一直带到革命圣地延安。时至今日，当时的情景我记忆犹新。叔叔伯伯们的嘱咐，是那么周到、亲切，字字句句都分明是阶级的重托啊！

在平西教导队学习了三个月以后，一部分同志回到冀东坚持

斗争，我被组织上送到晋察冀边区。到边区后，住在北方分局招待所。开始找我谈话的，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女同志。她告诉我说，组织上决定让我到抗大二分校附中继续学习，并说这个学校要培养的是抗战胜利后的建国人材。她勉励我继承父亲的遗志，作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并要我努力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将来好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最后，她特别嘱咐我说："你不要改名字，以后，我们好找你！"事后，当同志们告诉我，找我谈话的，是聂荣臻司令员的爱人张瑞华同志时，我再一次沉浸在幸福之中。是呵，父亲为革命做了他应该做的事。牺牲后，从部队到地方，从冀东军分区到晋察冀边区，从父亲生前的战友到各级首长，给了我这个烈士的后代多少关怀、多少温暖、鼓励和希望呵！

当时，抗大二分校附中共有七个队，每队一百多名学生，主要学习政治、文化和外语，我那时学的是日语。

一九四三年，日寇对我晋察冀根据地大搞"铁壁合围"，疯狂进行"扫荡"，斗争十分残酷。为了保存这一批革命力量，中央决定将我们全部转移到延安去。记得是在春季，桃花开了的时候，我们编成八个队，分成三路，长途跋涉，来到延安。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在大砭沟八路军大礼堂开会。我幸福地见到了日夜想念的朱总司令和贺龙等首长。贺龙同志在大会上宣布，我们二分校和晋西北抗大七分校合并，并号召我们努力学习军事本领，准备打仗。朱总司令也讲了话。会后，我们还看了"鲁艺"演出的"兄妹开荒"等文艺节目。

这一年，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我们学校的师生开赴陇东的豹子川进行了开荒、打窑洞和冬季大练兵活动。后来，党组织又调我到延安新华总社工作。

四七年三月，我们随党中央机关最后一批撤出延安。从那时起，到四八年四月，我就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以

及任弼时等同志转战陕北（后到达河北平山），亲聆周总理的教导，在艰苦环境中经受锻炼和考验。

时间过去四十多年了。

想一想我的少年时代，我愈加思念父亲。是他老人家最早在我心里播下革命的种子，使我懂得爱什么、恨什么。

回顾父亲牺牲后的岁月，我更是心潮翻滚，思绪万千，愈加热爱我们伟大的党。父亲虽然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党就是我的父母，阶级的深情每时每刻都在温暖着我的心。是革命大家庭里的叔叔、伯伯们把我抚养成人；是党的雨露阳光，哺育我茁壮成长，逐渐锻炼成一个革命战士和光荣的共产党员。

现在，父亲为之奋斗献身的革命事业已是这样兴旺发达、前程似锦。作为一个烈士的后代，我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一定要继承先烈的遗志，把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四个现代化，献给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圣洁　整理）